

荣泽民 口述
张国强 编著

中美建交风雨路

见证历史：
共和国大使讲述

1949年以前，中美之间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美国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封锁、歧视、围堵。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国拒不承认。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解冻。随后双方互设联络处。1979年两国发表建交公报，1979年正式建交。在这长达二十年的美国建交过程中，荣泽民作为大使，亲历了这一切，主笔了一些重要外交文件。

上海辞书出版社

Jianzheng Lishi
Gongheguo Dashì Jianguhu



中美建交风雨路

柴泽民 口述

张国强 编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1975 年 12 月 2 日，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

年2月17日，
毛泽东主席和
周恩来总理会
见美国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
理亨利·基
辛格。



下图：1970
年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与
美国友好人士
埃德加·斯诺
在天安门城楼
上亲切交谈。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到达北京，开始对中国的访问。图为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在机场握手。



1979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白宫大草坪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欢迎仪式后，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卡特、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登上白宫接待厅的阳台，向草坪上的群众挥手致意。

目 录

我所知道的柴泽民（代序）	1
赴任美国	1
接受新任务 / 初到美国 /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美之间的神秘接触	5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引起毛泽东关注 / 燕京师生间的特殊对话 / 毛泽东为黄华与司徒雷登谈话再定基调 / 离境的司徒雷登感到丢脸了 / 外交史上独特的马拉松式会谈 / 要回钱学森也是一个胜利 /	
中美关系走向改善	23
想起了老朋友尼克松 / “东联孙吴、北拒曹操” / 中美互致改善关系信息 / 毛泽东让斯诺上了天安门 / 乒乓外交的邀请，震撼基辛格 / 华盛顿精心实施“波罗”绝密行动 / 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会谈 / 商定尼克松访华事宜 / 《七一五公告》震动了世界 /	
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	49
历史性的握手 / 中美领导人谈笑风生论天下 / 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 / 解决台湾问题是关键 / “长城也是人类和平的标志” / 周总理的外交风范叫人折服 / 世界外交舞台	

出现了“中国热” /

中美关系下一步怎么走 63

逐步迈向正常化 / 福特时期中美关系停滞不前 / 卡特政府举棋不定 / 美国确定了对中国问题的基调 / 卡特派员对华进行“探索性访问” /

建交谈判的前奏 73

中美关系是邓小平外交事务的重点 / 卡特派布热津斯基访华 / 邓小平会见布热津斯基 /

中美建交谈判正式开始了 81

正式开始谈判 / 双方同意加快谈判进程 / 邓小平一锤定音 / 中美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 台湾当局受到沉重打击 /

中美建交谈判的正式代表 99

中方代表、外交部长黄华 / 美方代表、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 /

关于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的工作 105

筹备联络处的先遣组 / 联络处成为中美高层之间联系的秘密渠道 / 门庭若市的侨务领事组和商务组 / 轰动美国的中国武术团访问演出 / 不平凡的1978年 /

邓小平的外交旋风 115

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安全问题考虑最多 / 美国政府用最高规格的礼遇欢迎邓小平 / 卡特为邓小平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 极其重要的会谈 / 与美国各界广泛接触接受美国记者采访 / 访美日程排得满满的 / 邓小平在美国掀起了“中国热” /

任驻美大使的日子 131

出任驻美大使 /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 / 1979年内中美两国来往越来越多 /

中美关系的复杂多变 139

他见证了那一段中美关系 / 中国反对《与台湾关系法》的斗争 / 台湾非法转移外交财产案 /

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 147

中美开始探讨军事合作的可能 / 中国军事代表团对美国的访问 / 美国放宽对华出口限制 /

中美经贸关系进展异常曲折 153

经贸谈判极其艰巨 / 科技、教育、文化关系获得突破 / 民间大使陈香梅 / 友谊之情感人之行 /

里根上台之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167
里根就职典礼的风波 / 《八一七公报》与售台武器问题上的艰苦斗争 / 关于“胡娜政治避难事件” / 关于“湖广铁路债券”问题 / 中美纺织品贸易之争 /	
中美关系相对平稳发展的阶段·····	177
全面发展经贸互利，战略安全关系升级 / 为伍德科克大使过生日 / 感人的离任活动 /	
附录：在匈牙利、几内亚、埃及和泰国当大使的岁月·····	187
在匈牙利任大使 / 转任驻几内亚大使 / 出使埃及 / 难忘的曼谷岁月 /	

我所知道的柴泽民

（代序）

初冬时节，笔者又一次登门拜访我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老人。柴老平时已经谢绝会客了，他年纪大了。我和他是老乡，我说要去看他，还不致于把我拒之门外。

他虽已年届九旬，但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思维敏捷，步履稳健，一点也不像九十高龄的老人。交谈起来，他平易随和，一点名人的架子也没有。还好他的记忆力尚可，回首六十多年的往事，时间、地点、主要情节都描述得比较清晰，仿佛历历在目。柴老的革命生涯，从战争岁月的风口浪尖，到国际舞台的波谲云诡；从十七岁（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到太岳区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再到建国后任北京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从四十四岁（1960年）步入外交领域，先后出任我国驻匈牙利、几内亚、埃及、泰国和美国大使，到1974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和1982年底从美国卸任回国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他的经历可谓丰富多采、波澜壮阔。

创造新中国同泰国外交史上的辉煌

作为一位大使，在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处理好国际事务，增进了解，广交朋友，沟通感情，促进友好，除了靠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之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外交官自身的政策水平、工作经验、人格魅力和公关能力。

50年代初，党中央成立了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柴泽民当时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兼任北京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这使他有机会很早就参加中央和北京市的一些外事活动，见识了接待外国首脑的一些场面。

柴泽民身材魁梧，语言朴实且不乏幽默，稳健中透出机智。在任驻外大使期间，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他始终把维护国家利益、发展与驻在国人民的友谊放在重要位置，在同所在国政要交往中折冲樽俎，不辱使命，即使开始“坐冷板凳”，也能扭转局势，逐步打开局面。

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次年柴泽民出任我国首任驻泰大使。1976年10月泰国发生了一次政变。政变后上台的新政府，镇压国内一切进步力量。当时泰国的八家华文报刊，被查封了七家，只保留一家台湾办的报纸。新政府口口声声要发展同台湾当局的关系，给了柴泽民大使一条“冷板凳”。当时有许多谣言：说中国大使在政变时被吓跑了！而泰国朝野中同中国友好的人士，都十分关心泰中关系的变化，使馆时常接到电话问：“柴大使还在泰国吗？”使馆人员回答说：“柴大使一直在使馆呀。”对方说：“那就好，那就好。”柴泽民从这些电话里揣摩出泰国华侨、华裔和泰国同中国友好的人士都担心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觉得应当到他们中间去亮相沟通，好让他们放心。于是，他让司机把国旗挂在汽车上，冒着危险，把车开进曼谷最繁华的市区，存心“招摇过市”一番。汽车驶入耀华里，他干脆弃车步行，逛商店、问货价，同侨胞、华裔打招呼问好。此番“现身说法”非常灵，在大街上目睹了中国大使风采、

在商店里同中国大使聊过天的人，把中国大使活动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问“大使在不在”的电话也随之逐渐消失。他还通过好朋友、泰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他威上将邀请中国足球队、篮球队访泰，并请泰国警察总监蒙猜上将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和羽毛球队访泰。一时曼谷中国人乘汽车来往频繁，报纸上刊登中泰球队比赛不断，两国关系变得活跃起来。泰方还邀请中国文化艺术团等到泰国表演，一些担心中泰关系破裂的人顾虑慢慢消失了。柴大使就是以他的那种平易亲和的作风，赢得了驻在国人民的信任，从而也打开了大使的工作局面。柴大使认为这还不够，泰国国王和军队在人民中影响很大，必须开展王室和军队的工作，于是通过各种关系拜访了王太后诗纳卡琳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江萨，为中泰关系的发展打开了一条道路。

一次，一个中国文化艺术团访泰，柴大使提出给王太后演出一场，王太后欢迎在她的王宫中表演，并请了王亲贵族及华人领袖百余人出席。演出后还举行了招待会。这次活动轰动了泰国，所有曼谷报纸都作了报道。

在一次招待会上，与柴泽民相熟的《曼谷邮报》的总编辑，主动介绍他与泰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江萨将军相识。交谈之中，江萨流露出对印度支那、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关注，也想了解中国对这一地区形势的看法。柴泽民不失时机地分析了这一地区乃至世界的形势，也谈到了中泰关系的重要意义。柴泽民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中泰应持之共同立场，江萨颇感兴趣，特别是坦诚告之中国与泰共的关系，使江萨久存心中的疑虑随之冰消。已很久不登柴大使活动消息的媒体记者，看见江萨同柴大使谈得那么起劲，都围了过来，你摄影，他记录，第二天曼谷所有大报都在主要版面登载了他们交谈的照片和谈话。几天以后，江萨请柴泽民到家中做客，柴大使如邀前来。这天，不仅江萨的夫人、儿子出来相迎，座上还有江萨请来的泰国外长、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江萨像招待老朋友那样对柴大使说：大使先生，请把咱们前几天谈话的内容，再给我们这几位部长讲讲，我去厨房做菜招待各位。柴大使便同几位部长

畅谈起来。此后，每过个把月，江萨就请柴泽民去他家畅谈一次，江萨一家同柴泽民夫妇也成了常相往来的好朋友。

1977年11月，江萨出任泰国总理，中泰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泰国的华侨、华人地位明显提高；两国贸易日趋活跃；被前政府封禁的华文报刊全部复刊。而柴泽民也成了新闻聚焦人物。乘此机会，柴大使代表中国政府邀请江萨访华，在泰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自此以后中泰友好关系一直发展顺利。后来柴泽民到美国任职，江萨访美时还特地到使馆看望他。

柴泽民任泰国大使的两年半时间里，泰国政局真可谓风云变幻莫测，但中泰友谊越变越好。这两年半里，柴泽民从王室、政府、军队到商界，交了许多朋友。柴泽民告别曼谷之前，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天天中午、晚上都有人为他饯行，王宫大臣、国会议员、各部部长、三军司令，华侨、华人，轮流不止。柴泽民每忆及此就有一种两国友谊如长江之水、川流不息的感受。他在泰国工作的两年半时间，经历了泰国两次大选、三次政变、四位总理、五届政府，在政治如此动荡的环境下开展外交工作，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不管政治气候如何变幻，他依然把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为中泰两国政府和人民架起了一座坚固的友谊桥梁。为表彰他的成绩，在他离开泰国去美国赴任时，泰国国王授予他最高荣誉——一等白象勋章。试想，从他到任初期受到的冷落，到离开时获此殊荣，这有多大的反差。

参加中美建交谈判和成为首任驻美大使

1978年夏天，酝酿已久的恢复中美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开始了。柴泽民出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参与了举世瞩目的建交谈判。经过半年的努力，1978年12月中旬，中美两国达成了建交协议。根据协议规定，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于3月1日互设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中美关系的

新纪元从此开始了。

在中美双方互设大使馆、互换大使的日子里，他的名字在世界上受人瞩目。柴大使在美国经历过“首航”的艰难，也品尝过“首航”的乐趣，作为新中国第一任驻美国大使，他的名字被载入了史册。

中美两国既同是世界大国，在国际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又各自具有截然不同的国家利益、社会制度、经济背景和意识形态。两国政府从原先的敌对走向现在的正常邦交，尚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研究和处理。外交问题十分敏感，难度极高，动辄就影响两国关系。作为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的责任十分重大。在他任大使期间，美国方面有两位总统（卡特和里根）任职。凭着多年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和处理外交难题的卓越能力，他在工作中既不失原则性，又有相当的灵活性，将所有的问题都处理得非常漂亮，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外交舞台上创造了辉煌。

为表示对柴泽民在发展美中关系中所作的贡献和对他的敬重，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特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州麦卡利斯特学院也分别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和名誉教授称号。

柴泽民
大使在美国
密歇根州立
大学获得名
誉法学博士
学位时讲话
(1981年11
月9日)。

柴泽民驻泰国和美国期间，改过两个规矩：一是在泰国期间，把只在上班间接见来访者，改为随来随见，后来把这个规矩带到美国；二是在美国改变了签证制度，把强调对等签证时间，改为一般争取一周或当日办毕。这



两项改革拉近了中国大使馆同驻在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加速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中泰两国是近邻，也有悠久的友好历史，但毕竟中断了多年的联系，许多华侨、华人希望了解故国、了解家乡的信息，对中国大使馆的官员也表现得非常亲近，总想同他们多聊聊。但有一些工作人员觉得他们晚上来，影响自己的休息，也改变了过去的常规，因而不愿接见。柴大使说：“你们不愿意见我来见”，“人家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见。”在美国时，他经常到各州去做报告，报告结束后接见留学生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但是接见台湾同胞则在深夜，因为当时台湾同胞不敢白天和中国大使接触，怕台湾当局把他们列入黑名单。他们往往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还言犹未尽。这种夜间工作的经历，是他在50年代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期间养成的。那十年他经常是工作到深夜1、2点钟，每天文件很多，必须当天批完，否则第二天又是一大批。忆起那段工作时，柴老说：彭真市长工作作风是雷厉风行的，经常中央夜晚开完会后，有需要向下传达的事，他总是连夜开会传达，这样，我们只好等着他开完会回来，到2点钟后他不召集开会了才睡觉。为此，柴老还学会了开汽车，晚上开会就不麻烦司机了。那十年中造就了他承上启下、左右兼顾，既当参谋、又当领导，协调灵活、纷而不乱的工作本领，完成了从戎马倥偬的军人向精明强干的行政长官的转化，这为他出任驻多国大使，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做了极好的铺垫和准备。

长期活跃在民间外交的舞台上

1982年底，柴泽民任期届满回国，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从1978年起，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曾任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此间，他多次率领政协和外交学会代表团访问欧、亚、美许多国家，为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新的贡献。

90年代后，柴泽民辞去了外交学会的工作。接着，又应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中国绿化基金会和中国世界语之友会等多个民间组织的邀请，担任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等职务。虽然每天公务依然繁忙，但他感到生活很充实。近几年，他以近九十岁的高龄到美国、英国和法国去考察债券、股份制，带书画家代表团去东南亚访问，同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进行文化交流，还赴韩国参加过东北亚形势研讨会；他也为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和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的发展奔波。可以说，在他能为改革开放效力的地方，他依然像过去那样不辞劳苦，不畏艰难地工作着、开拓着和奉献着。

1981年，为促进社会各界对世界语的了解，扩大世界语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推广世界语，在国际上为世界语运动增添一份道义上的力量，推动世界语运动更广泛的发展，由楚图南、胡愈之、巴金、夏衍等十位社会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世界语之友会。首任会长是楚图南，副会长为黄华、胡绳、柴泽民、罗俊和陈昊苏。1994年，楚图南会长在临终前说：“要继续办好世界语之友会，请柴泽民同志接我的班！”其实早在90年代初，柴老曾专门到楚图南家拜访，当时陪同柴老的还有北京世协的王彦京。在那次拜访中，楚老非常赞赏柴老对世界语工作的热情，他说柴老年纪还轻，身体也好，在外交界很有影响，希望柴老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推动世界语工作，他希望柴老能够接过世界语之友会会长的职务。1996年，世界语之友会换届选举时，柴泽民当选为第二届会长。十年来，对于中国世界语的活动，柴老一直倾尽全力支持，他曾经因为参加世界语的活动而错过重要的外交会见；他一直说：“我对世界语的感情很深、很远，我在30年代学习世界语，尽管学得不好，但世界语在我心中却种下了深厚的种籽……”

柴泽民自幼好学，在中学时读了许多进步书刊。中学毕业后家穷无力升学，只好在一所小学以教书糊口。在这里，他参与发起成立“反帝大同盟”。后因领导全县小学教员游行示威反对阎锡山限制进步思想的所谓“鉴定”失

败，失去教书的职位，也因为在这次斗争中的坚定和勇敢，于1933年被吸收参加了共产党。闻喜县委为了培养柴泽民，要他考入运城师范学校，在那里他接触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刊，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在这期间，他参与恢复组建党的外围组织教师联盟、社会科学联盟等。

1935年，由于闻喜县党组织被破坏，柴泽民不得不离开他的家乡到西安，在那里他为了糊口到杨虎城的部队当看护兵，后考入绥靖公署军医处学医。也在这段时间，柴泽民结识了懂得几种外语的前同盟会成员景梅九，从他那里知道了世界语，并了解到世界语是一种进步的人造语言，是为人类和平服务的语言，这使柴泽民对世界语产生了兴趣。他特别希望了解更多的知识，了解外面的世界。在了解到世界语简单易学后，柴泽民报名参加了当时景梅九成立的西安世界语学会的世界语培训班。除了参加世界语学习班，他还订阅了当时上海出版的《LA MONDO》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的世界语运动。那时和他同去学习世界语的还有他在医学班的同学。在那段时间，每天吃完晚饭后，柴泽民和他的一些同学就去世界语班学习世界语，可是不久他们的行动被军医处处长知道了，遭到了他的反对。那位不知世界语为何物的军医处处长把他们一班学生集合起来狠狠批评了一通，说：“你们只要学好医，就一辈子的饭碗都有了，还学什么世界语？难道你们还想当外交官不成？”没想到，这位处长当年一句不经意的假设，后来变为现实：外交官，成了柴泽民真正的职业。

同那个时代的进步世界语者一样，在接触了世界语以后，柴泽民一方面希望通过世界语拓展自己的眼界、增长知识；一方面也在考虑是否能够利用世界语为党做一些宣传工作。于是他撰写文章，利用一些进步报刊宣传世界语和新文字，他利用《工商日报》副刊开辟“我们的语言”专刊，每周一期，专门组织撰写稿件宣传世界语和新文字（即汉语的拉丁化）。至今柴老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一共出了八期。然而在那个年代，进步的东西总是要受到反动统治者的严密监控，由于柴泽民经常撰写和翻译世界语文章，所以他也被当时的西安军

警稽查处逮捕与审查。当被问及为什么学习和使用世界语时，柴泽民巧妙地解释说：“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是波兰的眼科医生，我是学医的，我学习世界语可以读他的医学原著。”巧妙的周旋使他得以安全度过那段危险的岁月。于此同时，党组织还指示他们办了一个刊物——《更生》，专门宣传抗日和进步思想，但只出了一期就被查封了。

柴老不仅亲自参加世界语活动，而且先后担负了国际和国内一些世界语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对争取各级政府的支持和世界语活动的成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89年12月15日，北京国际俱乐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世界语之友会、北京世界语协会等十六家单位联合举行柴门霍夫博士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会。其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联合国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单位都是柴老出面邀请的，使得纪念大会规格大大提高，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都在当晚进行了新闻报道。

1999年8月17日，第四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在桂林开幕。协会特别请柴老出席开幕式，以保证大会顺利召开。其实，那时柴老正在开会，他那几天的日程已经有了别的安排，但出于对世界语运动的关心，八十三岁高龄的柴老还是决定改变安排，参加世界语大会。日程的安排十分紧凑：16日晚，柴老到桂林，17日上午开幕式一结束，柴老就又乘飞机返回北京，出席下午在北京的另外的会议。在筹备2004年第八十九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中，柴老同样尽心尽力，在聘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担任大会最高监护人、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担任大会筹委会名誉主席并出席大会开幕式和联系外交部领导接见国际世协主席、副主席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几十年来，柴老对于世界语运动的支持与奉献是始终如一的，这完全是出于他对世界语的期望，就像他为2005年9月第六届全国世界语大会的题词一样：“让世界语为构建和平友爱进步和谐的社会服务！”

老而弥坚 一生清廉

柴老在海外工作了二十二年，却很少为自己的子女、家庭操心。离休后，仍欣然为国际公关协会、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老区建设促进会等一些社会组织效力。他在美任职期间，曾对自己的子女们说：除非国家外派，我不会为你们找关系到美国来，你们想来只能凭自己的本事，不能凭我的关系。至今，他的五个孩子除一个在国内外企工作被派出国临时工作外，其余都在国内工作。

在他的影响下，五个孩子个个奋发努力，没有一个依靠父亲的名望和权力在求学和就业上为自己谋得利益；他们有的参军留在部队，有的转业后到地方工作，也有的毕业后直接参加了社会工作，五个子女中却没有一个从事外交工作。当我们问他是否为此会多少有些遗憾的时候，柴老欣慰地说：“他们自力更生是好现象，是好的典范，我不遗憾！”

柴老在国外银行没有账号，没有一分钱存款，贵重的礼品都如数上缴，从这两点之中，已可鉴其清正廉洁之风。当时，美国物价上涨，使馆的同志们提出伙食费也应上升。柴大使说：“现在我们的生活相比国内已经很好了，伙食费不必提高了，为国家节省点费用吧！”大家也能谅解大使的用心。

环视柴老家的客厅，这里没有豪华的陈设，没有精美的装修，除了书籍、照片和各种资料以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他的饮食起居也同普通市民一样，即使在国外工作期间，他也没有心安理得地享受小灶待遇，而是与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他说，最怕的就是那些繁琐的宴请，如果不是为了工作，我还是喜欢家乡的粗茶淡饭。那一桌的文房四宝和大量书报，足以让他身心愉悦。他从小就酷爱读书报。到各地去参观访问，有暇便去逛书店。本来他也喜欢书法，但因每天很忙，排不出时间练字，他认为这是件憾事。

凡接触过柴老的人都会用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形容他，同去柴老家采访的

原全国世协副会长、世界语之友会秘书长邹国相问柴老：“您长时间担任外交官，而且不是一般的外交官，是大使，但您说话却没有官腔，也不摆官架子，您是位可亲可敬的老人，您的这种作风是怎样形成的？”面对提问，柴老笑笑，谦虚地说：“我没有做过官，一直做群众工作。抗战时期，我参加游击队，游击队是人民群众的部队，我做的工作始终离不开人民……”柴泽民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的教育和个人的经历无疑对于他的一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善待周围的每一个人，善待兄弟姐妹，善待战友同事”，这些对于日后柴泽民平实朴素、平易近人性格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作用。参加革命以后，在部队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在告诫着他，要做一名好的军人。他说：“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该做人民的勤务员。”抗战期间，柴泽民曾经担任过中共闻喜县委组织部部长、晋豫区条西地委书记，无论在哪个岗位，他始终视自己为军队中的普通一兵。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在30年代，他在部队当政委的时候，连队里有个小兵是他的老乡，小兵觉得在连队里太苦了，所以找到他，提出要给他当勤务员。考虑到当时确实需要一名勤务员，所以柴泽民就把那名小战士留在了身边。可是没过多久，小战士就抱怨地跟他说：“以为跟着你能吃香喝辣地享福呢，怎么整天都跟你吃面呢？”讲到这里，柴老哈哈大笑起来。

2006年8月初，北京正当炎夏时节，我开始着手编写本书，为此专门去报房胡同访问柴泽民大使。老人已九十岁的高龄，他原本高大的身材仍不减当年的气度和机敏，待人仍热情可亲，思维仍敏捷，动作也还利索。因天气太热，他还坚持自己动手为笔者打开电扇，随后慢慢地坐在沙发上，有条不紊地对过去的事如数家珍似地谈了起来。然而他毕竟已年届耄耋了，听力有点不太好，得戴上助听器才能和人交谈。那天他向笔者讲了过去的三件难忘的事，说就是因为这三件事，使他的记忆力有些不如过去了：

第一件事是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外交部老部（即外交部街

30号)参加运动。有一天中午,他骑自行车回家,车刚骑到街口,突然有一辆大卡车急刹车停住,柴老来不及躲闪,撞在了大卡车的车轮上。当时,自行车被撞坏了,他的头也被撞开了一个口子,可他没有去医院,就急忙扛着破自行车赶回家,洗了洗伤口,抹了点药水,下午就又去上班了。

第二件事是1973年10月他在埃及任大使时,埃及外交部组织四十多位各国大使去“十月战争”后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以色列阵地参观。当汽车快到运河时,大客车突然侧翻,倒在沟里的大石头上。车被摔坏了,很多大使受伤,有的还断了几根肋骨。当时,柴老被摔倒在行李架上,阿尔巴尼亚大使压在了柴老的身上,使他连气也喘不过来。柴老被人扶起来后,强忍着疼痛回到住所,已不能动弹。但也没去医院,只检查有无骨折,在住所向工作人员要了一瓶云南白药,大家说喝一瓶不行,起码要喝三、五瓶。柴老说,喝一瓶就够了,在国外缺医少药的,剩下的留给别人用吧。

第三件事是1984年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工作时组织视察团到敦煌视察,途中遇到一辆大卡车飞速冲过来,由于速度太快,一下就把政协的客车给挑起来摔坏了。这时柴老在车里睡着了,不知道撞车就昏过去了,直到把他送到医院才醒来。随后医生替他把伤口缝好,上了绷带。他在当地住了三天医院后,全国政协向军委要了一架小飞机把他接回北京。医生要他至少休养三个月,他只住了一个月就要求出院上班,投入紧张的工作了。

讲完这些之后,柴老还高兴地说:“三次车祸,当时没给我造成任何残疾,还能让我又很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这真是我的福气。”

柴老真是一位乐观而意志坚强的老人。

现在,我根据老人的讲述和在查证引用一些资料的基础上,终于整理编写完成了这部书稿。

张国强

2007年2月



柴泽民大使与夫人李友锋。

赴任美国

1978年，中美关系进入到了关键时刻。此时的柴泽民已经六十二岁，在大多数同僚眼中，他是真正的功成名就，完全应该安度晚年了。但他却在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动员下，在中美关系十分关键的一年里，接受了一项极艰巨的任务：前往美国，担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而1978年的美国，在中国人心中，仍是与中国为敌、极不友好的国家。那时，柴泽民正在泰国当大使，经过了一段困难的过程，两国关系现正走向顺利、正友好发展的时候要调他去一个霸权主义的国家任职，从内心讲他实在有些不愿意，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向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那就只好做“去”的准备了。

1978年5月，柴泽民刚刚从泰国回到北京，就遇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来华访问。布热津斯基主要谈的是建交问题。那时万斯国务卿从苏联谈判核武器问题失败归来，于是卡特总统只好根据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中美建交之后再跟苏联谈判，以中国来压苏联。所以布热津斯基一到中国就很直截了当地说，他来中国就是为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当时，邓小平副总理考虑：谈判建交问题

我们赞成，要是谈成了，建交之后不仅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也有利，那我们为什么不谈？柴泽民从离开泰国到接待布热津斯基，中间这个时间很短，紧接着还参加了黄华外长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的两次建交会谈。进行了两个月的准备，看了一些资料就到美国上任去了。

1978年8月5日，柴大使偕夫人李友锋启程前往美国赴任。他坐在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思绪万千……

接受新任务

过去两年多来，我总是在北京与曼谷间往返，现在，又将开始新的跨国飞行了，心里真是别有一番感受。这次奉调的消息一传开，从泰国离任的送行活动便排得满满的：想为我饯行的人接连不断，一天三顿饭都有人请，从泰国王室到地方官员；从政府的各部长到各党派领导人；从各界友好人士到华侨华人，无法拒绝他们的热情。同时，外交同行们也都赶到中国驻泰使馆来送行。

在告别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中泰关系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和睦相处的典范，两国人民的交往已进入水乳难分的境地。大家都在祝中泰友谊万古常青。一想到这里，我内心就起伏难平。我是1976年作为中国首任驻泰国大使前往赴任的，现在中泰友好关系的发展已掀开了新的一页，我衷心地为泰国侨胞和华人朋友在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泰中关系的发展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而感到高兴。我希望侨胞和朋友们，一如既往，为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临行前，我举行告别招待会。有些华人讲的话感人肺腑，他们回忆起两年中前中泰关系的处境是如何的困难，深感今日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他们说：“通过柴大使的胆魄和坚忍、耐心和努力，渐渐地，使大家了解了我们的国家，了解了我们国家外交官的真实面貌和实实在在的能力。”说我是“在曼谷能找到的最

好的大使，他有一颗赤子之心，富有人情的心，一颗巨大的心！”我知道，这些褒扬是对我们国家的外交路线、方针的赞美，我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而已。

当地的报刊杂志不断地在谈论我，对我未来的职务有很多猜测。几个月前，中国刚刚宣布资深外交家黄镇即将调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一职，人们最容易联想到我将去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接替黄镇。

其实，早在1978年2月上旬，中央已经确定了由我出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的职务。

2月份我回到北京的家中，长大成人的儿女们听到消息也纷纷赶回。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这是很难得的全家人团聚。父母与儿女们的目光碰撞着。儿女们望着我们，我感到他们的目光里似乎流露出对父母的陌生。他们心里也许在想：“你们老俩口头发已经花白，老了，即使还需要工作，也是该留在北京的年龄了，为啥还要往外跑？”在战争年代，孩子们过的也是烽火硝烟中的动荡生活。60年代初，我偕李友锋就出国任大使去了，匈牙利、几内亚、阿联（今埃及）、泰国，近二十年里，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国外。一般人总以为外交官享有种种特权，可以领略世界各地异国风光，而不了解许多这样从事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大使家庭在感情方面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忍受了多大的牺牲。他们的孩子不像在常人百姓家庭，可以得到正常的父爱与母爱。他们过早地独立生活，使他们变得各有主见，相互间长期分离，总不在一起而变得彼此陌生，不容易倾吐心里话，甚至还羞于喊“爸爸”、“妈妈”。

儿女们盼了多少年，满以为父母老了总算回来了，该有一个像样的家了。可是，我望了望儿女们，却说：“我和你们的妈妈很快就要去华盛顿赴任了。”而孩子们的眼光，不是惊异就是疑惑，却一点都没有什么惊喜。

李友锋也有些不安地帮我解释说：“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人家美国以前派来驻北京的主任比你爸年龄还要大十岁，都已经七十二岁了。你们的爸爸今年才六十二岁，哪能不听领导的话，不去赴任啊。”

儿子眼里流出了泪水，没说什么就离开了。女儿们也相继走了，家里就剩下了我们老俩口。

初到美国

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是我的老熟人了，所以一到华盛顿，我们之间就开始了密切的合作。

我到任近两个月后，于1978年10月1日举行了我国国庆招待会。联络处的屋顶上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华盛顿的很多要人在这一天的傍晚赶往中国驻美联络处出席国庆招待会，同中国联络处的官员们一同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周年。

从下午6点钟开始，受到邀请的客人接踵而至，来宾们很快就在宴会大厅的入口处排起了长队，我与李友锋及韩叙夫妇作为东道主，同七百多位客人一一握手。被装饰得流光溢彩的大厅里政要云集，人们在来宾中看到了美国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许多民主党、共和党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华盛顿市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执行副主席，美中贸易委员会理事长，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此外还有科学、文化、教育、工商、新闻各界的知名人士和美籍华人及华侨代表。招待会一直持续了近三个小时才结束，人们临别时都对这个令人难忘的晚上赞不绝口。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美之间的 神秘接触

在我国驻美国联络处举办的国庆招待会结束后，柴泽民在院里转悠着，沉思着，回想起新中国成立前后毛主席对中美关系的关注……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引起毛泽东关注

1949年4月底，那时我刚参加接管北平（今北京）不久。

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进展迅猛，喜讯频传。二野、三野的战斗部队攻占南京后，已经包抄逼近上海，四野也逼近汉口，一旦消灭敌军后，部队马上面临接收上海、汉口等大城市的任务。但此时南京已经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的战士已经进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卧室里去了，听说还有战士封锁西欧某国驻华使馆大门，禁止洋人出入。当然，这些问题在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后，已经及时得到解决。

此时，萦绕在毛主席头脑中的的是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虽说

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但这个问题随着南京的迅速解放而凸现出来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滞留南京，并带动了各西方国家的驻华使馆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都留在南京了。跟随国民党政府迁去广州的，只有苏联的驻华使馆。

司徒雷登为什么要在南京逗留？为什么在我们解放南京后还不走？很显然，其目的只能有一个，就是企图与我方联系。

毛主席是见过司徒雷登的。那是在抗战刚胜利、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先是在蒋介石的宴会上，那时他还只是大家所称道的燕京大学校长、著名的教育家。初次见面，他曾对司徒雷登寒暄说：“司徒先生，在延安那里有你的不少学生？”司徒雷登不无得意地回答说：“我希望他们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

没想到，在数月之后出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看中了司徒雷登，请这位老校长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毛泽东在陕北黄土高原上观察此事，很快就得出结论，这位校长出身的美国大使，上任伊始就往庐山上跑，说明此公的屁股是整个坐在蒋介石一边了。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不断取得的胜利，令司徒雷登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这位美国大使先生开始给周恩来写信。大使很会动脑筋，送信走的是一条特别的香港渠道，通过在美国延安观察组时与中共高层领导关系甚佳的谢伟思来传信。谢伟思曾经因所谓“通共”罪而被拘捕，在查无实证被释放出来后，安排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任副武官。司徒雷登给周恩来的信都通过谢伟思，在香港转交给中共驻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乔冠华。司徒雷登的这些信，也是毛泽东观察美国对华政策微妙变化的重要依据之一。

毛泽东当然了解这位大使先生的目的，是想通过与中共的接触，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但是，从援蒋反共，到拒绝国民党调停国共

内战的要求，再到想与我们联系，也不能不说是发生了一点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南京很快就要解放，在国民党政府经营了多年的首都，有国民党的外交部要接管，有众多留下来没有迁去广州的外国使馆及外交官们要打交道，特别是这个美国大使已经数次发出了要与我们联系的信息，需要派一个合适的外事干部去主持南京市军管会的外事工作。

毛泽东问：“你考虑派谁去好？”

周恩来早已考虑过了：“我看黄华就合适。他在延安接待了中外记者团、美军观察组，后来又跟剑英到北平军调处与美国人打交道。再说嘛……”

毛泽东插话问：“你看中了黄华与司徒校长的师生关系？”

周恩来说：“这个大使校长说过要通过师生关系来影响我们，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师生关系去对他做工作。”

就这样，决定了黄华南下。黄华当时任天津军管会外事处主任，天津的外事处工作调章文晋去负责。黄华接到命令后，立即与在北平组织的南下工作团一起匆匆赶往南京。

黄华一到南京，就听说了有关司徒雷登的事。

美方向市军管会申述滞留在南京的理由，说是司徒雷登的专机坏了，需要时间修理，飞机现停在明故宫机场。我方问要修多久，回答说需要修理约四个星期即一个月左右，我方同意了。黄华一听就明白，这显然是一种借口而已。

这时，黄华已经获知司徒雷登急于与他见面。5月5日，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黄华燕京大学的老同学傅泾波要求先与他见面，黄华以有事为由而推托了。经报告南京市委领导同意之后，约定第二天与傅泾波见面。

傅泾波早已与司徒雷登反复琢磨过怎么来与黄华进行首次对话。这对老同学寒暄后言归正题时，傅泾波按司徒雷登面授的意思，先为司徒雷登申辩，将

事先准备好的一番话倾倒出来。

黄华只是听着，仍没有作出什么表示。

傅泾波又按司徒雷登授意，主动谈起了《中美商约》。《中美商约》全称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那是蒋介石为了博得美国大力支持和援助他打败中共，在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按这个条约的内容，美国人可以完全自由地在中国居住、旅行、经商、购置土地及产业，美国商品与中国商品享有同等待遇，美国船舶、物资、人员可以自由通过中国领土、领水……此条约签订后，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指出该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可耻的卖国条约之一，是中华民族之国耻。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发布命令，将签约的11月4日定为国耻日。

司徒雷登让傅泾波主动提出修改《中美商约》，一方面是做贼心虚，另一方面也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妄图诱使新生的人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发生官方关系。

黄华只是听着，仍没有对此表态。

“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比换一个新人好一些。”傅泾波向黄华转达了司徒雷登想继续当大使及与中共方面办交涉的愿望，并特别强调司徒雷登的诚意。

黄华回答说：“美国援蒋政策造成中国人民损失重大，创痛极深。现在美国尚未放下屠刀，何能期望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至于司徒雷登，他是美国派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外交使节，人民政府不承认他的‘大使’身份。会见的事嘛，考虑以后再说。”

谈话就此结束。

傅泾波离开之后，黄华就立即将这次谈话情况以南京市委名义电告中央并报华东局，请示下一步的做法。

燕京师生间的特殊对话

毛泽东同意黄华可以去与司徒雷登见面，目的是让黄华去摸一摸美国政府的底，并觉得5月6日黄华对傅泾波谈话中有的说法不妥当，需给予指正。

5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电，电报内容中主要的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二）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①；

（三）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种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会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四）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① 李涛声明：指1949年4月30日，中央军委作战部长李涛严厉谴责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声明。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根据中央指示，5月13日晚黄华以私人身份到司徒雷登的住处去拜访，这又有点出乎司徒雷登的意料之外。

两人见面寒暄过后，因刚发生过解放军进宅事件，黄华就问起战士进屋的情况。先问此事也符合黄华的外事处长的身份。

司徒说起此事，故意显得很有风度。他很平静地说起那天一大早，有几个年轻的战士进屋来了，他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看一看，态度还算好，等等。当然，他没有说他自己当时暴跳如雷大发火。

黄华当即告诉他，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在没有同新中国建交之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国侨民，我们自将保护其安全，请他们放心。

司徒雷登接着说了一番“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给美国的安全与世界和平带来威胁”之类的话，然后就声称自己是要为和平作努力的，他留在南京就是为了在美国政府与新中国之间建立新关系方面做一些事情，说他“乐意逗留一段时间，以表明美国人民对全中国人民幸福的关注”。他表示希望新的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取民主人士参加。

黄华对司徒的共产主义威胁论给予了批驳。在谈到美国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时说，我们希望美国承认新中国，但是必须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

司徒雷登却提出了几个所谓的标准，作为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其言外之意，就是要新中国承认西方帝国主义过去在华的既得殖民利益和种种特权。他还说，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他已经建议将上海经济合作署所存粮食、棉花等援助蒋介石的物资，待上海解放后即移交给人民

政府。

当时，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战役已经打响。黄华就说：这些粮食、棉花物资我们当然要直接从国民党手中接收，我们不接收美国的物资。

司徒雷登说到美国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使黄华想起在山东青岛的美国驻军。于是向司徒雷登提出了这个敏感问题，说：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该将美国驻在青岛等地的海军陆战队和军舰撤走，以免发生冲突。

司徒雷登却强词夺理地辩护说：美国驻军是“由于内乱和战争造成局势混乱，美国侨民的生命需要保护”云云，但答应将此意见转告有关方面。

与黄华见面之后，司徒雷登感觉到自己有了“面子”，立即利用会见的事做起文章来，以此提高他在外交界的身价。他还乘机要挟英法等各国使馆，在同中共的交往上，一定要跟他采取一致的行动。他想，如果美国承认新中国，他还可以依然当他的美国驻华大使。

各国使节对司徒雷登所放的风声不明底细，纷纷要求与黄华见面。

根据这个情况，南京市委决定，由黄华出面召集所有留在南京的外国使节开会，再次申明中共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以及对待各国使、领馆和外交人员的具体政策，并回答了各国使节及外交人员提出的问题。

在黄华与司徒雷登第一次见面后，没多久，司徒雷登通过傅泾波与黄华联系，表示他准备在7月初回美国，希望回国前能再与黄华见一次面。为司徒雷登返美问题，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及华东局写了报告。

6月2日，驻青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与军舰撤离，青岛也获得了解放。

毛泽东为黄华与司徒雷登谈话再定基调

在美军撤离青岛的第二天，即6月3日，毛泽东指示同意黄华与司徒再次会面，并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允许司徒雷登及傅泾波返美给南京市委并告

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复电，在加写的一段中指出：

美国有利用国民党逃亡政府尚存时期提出对日和约之可能，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

接到中央指示后，黄华即安排6月6日在外事处接待室的这次会面。

谈话一开始，司徒雷登首先提出要去上海与回美国的问题。他打算7月初就返回美国。

黄华告他：关于去上海与回美国的事，你可以普通外国侨民的身份到外事处申请。

司徒雷登果然像毛泽东所判断的，谈到了对日和约及台湾问题。他说：开罗会议罗斯福曾允许台湾交付托管，待对日和约签订后正式归还中国。

黄华严肃地说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被日本侵占后，中国人民从未承认，也从未停止过斗争。如今台湾已经归还中国，即将成立的人民政府决不容许国民党政府出卖或外国政府借口对日和约另生枝节。

然后，话题转到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上。黄华说：新中国希望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必须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今天，美国的援助物资仍然在继续运往台湾。美国同国民党流亡政府保持关系，乃是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也表明美国缺少同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诚意。

司徒雷登申辩说：如果今后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往别处，美国代表不会随往。但因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且国共各占领一部分地区，按国际法，美国还不能断绝同旧政府的关系。

黄华告诉他：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流亡政府的关系

及停止援助蒋介石，用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现在，美国仍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无从谈起。

司徒雷登仍继续为美国辩护，但其言论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神色显得甚为窘迫尴尬。

离境的司徒雷登感到丢脸了

7月15日清晨，司徒雷登刚刚醒来，还处于睡眠惺忪状态时，床头收音机里的“美国之音”播了一则蒋介石到广州的消息，顿时使他清醒了。

原来，在他准备动身回国时，杜鲁门总统下令：让司徒大使离开南京后要访问广州。

总统的指示又不能不执行，但他很担心中共方面知道他去广州，会对他自己有所不利。这使他这几天一直处于一种十分矛盾苦恼的心绪之中。他一听到蒋介石到达广州的消息，便果断地决定：广州，不能去了！

15日当天，他为不去广州的事，致电艾奇逊国务卿说：委员长已抵达广州，“我想他会逗留几天。设想我去访问广州（如果我按期启程），正好与他不期而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不利的猜测和曲解会随之产生。对此如能避免则应予以避免。不然，共产党无疑会认为，我的撤离计划不那么简单，并从中大做政治文章，甚至我的外交使团的同行们也不大会相信，我们在广州同时出现是巧合。”

由于华盛顿方面迟迟没有对他15日不去广州的报告复电同意，而动身离南京的日期就要到了，他十分焦急。7月18日，他再次致电艾奇逊国务卿：“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地去北平拜见毛主席；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改变航程去拜见蒋委员长也是不明智的。”

艾奇逊报请杜鲁门点头后，批准司徒雷登不去广州。司徒雷登这才松了一口气。

口气。

这次办理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的有关手续的时候，按照艾奇逊国务卿的指令，司徒雷登向南京外事处提出了申请，请求7月中下旬乘美国运输机离境回国。外事处答复他，准许他按一般侨民办理完相应的手续后离境。

按照人民政府当时的出入境管理规定，一般外国侨民申请出境，必须要找两家实力雄厚的担保商号，由商号填具保单，保证该离境外侨没有任何未了结的债务，没有拖欠税也没有悬而未结的民事或刑事诉讼，等等，同时对外侨在离开中国前的任何非法行为负责。另外，按规定，外侨出境所携带的行李也必须接受检查。

司徒雷登虽说对人民政府的这项外事政策已经知道，但他却以为，不会要求他个人及随行人员做这种事，因为他们都是使馆人员。因而，当其申办出境外事处按政策对他提出了这个要求时，他感到有损其大使尊严，丢了脸面。

他遂向华盛顿方面反映情况、寻求对策，一面派傅泾波找黄华交涉，一面也悄悄联系担保。他让人探询在南京的地方银行及与使馆有签约关系的中间人，以确定他们是否愿意为他的随行人员及机组人员担保。

7月15日，美国国务院急电司徒雷登，命其不得填具担保，电函并训斥司徒雷登在与中共接触中表现软弱。

司徒雷登接到此电函后，叫傅泾波去外事处找黄华。傅说：司徒雷登希望获得谅解，他留在南京是出于友好，返回美国也是为中美关系努力，如能免去担保和检查，不胜感激。

当时，还有一些国家的大使、公使也存在着类似司徒雷登一样出境手续方面的问题。根据这些具体情况，考虑到这些大使、公使仍被本国视为是国家的代表，南京市委经研究向中共中央建议，可以对这些人给予一定的便利，免除其觅保手续，允许一件手提行李免检，对使馆其他人员仍按

原规定办理。

中共中央经研究后，同意了南京市委的意见。

于是，南京外事处对司徒雷登此次返国采取了免除觅保、检查的手续，其随行人员由美国使馆留下的人担保，傅泾波由两个私商担保。为出境的事已连续数日焦虑不安的司徒雷登听说后，真是如释重负，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8月2日清早，南京明故宫机场。被助手搀扶上舷梯的司徒雷登扶着舱门，回过头来，黯然神伤。他真不愿意相信这就是他在中国最后的结局。

如今来审视与回顾这段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前刚刚解放的南京，表面上是原燕京大学老校长与其在中共方面学生的“师生见面”，而经档案解密后才“水落石出”，原来都是中美双方最高首脑亲自掌握的外交接触，双方都想摸对方的底，但美国一方还没有任何政策方面的准备。当时在冷战风云笼罩全世界的情况下，中美联系的门户从此关闭了。

别了，司徒雷登！

几年之后，中美关系史上发生了一场独特的马拉松式会谈。

外交史上独特的马拉松式会谈

中美建交之前的两国关系是一场充满智慧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决定在中美之间建立一种大使级的会谈机制，树立新中国的外交姿态并谋求于我国有利的外交格局。

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在我之前，有很多同志为此做过非常出色的工作，其中就有王炳南同志。

1955年7月，外交部去电正式通知在波兰任大使的王炳南，让其出任中

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去参加即将于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的会谈。同时，外交部为这场大使级会谈专门成立了指导小组，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小组由章汉夫任组长，副组长是乔冠华，秘书长是董越千，另外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会谈有两项议程，一是关于遣返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王炳南接到国内指示时，离会谈日期已经没有几天了，他大量翻阅材料，根据国内的指示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和其他同志一起研究了可能出现的问题。

没过几天，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由两国同时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大报都将此消息作为头版头条或通栏大字标题的新闻，并且纷纷发表评价和预测，中共首席代表成了众传媒关注的新闻人物。

王炳南先从华沙到瑞士首都伯尔尼，中国驻瑞士大使冯铨又陪他乘坐火车去日内瓦。抵达日内瓦那天，刚下火车，早已探听到中共首席代表到达消息而守候在车站的各国记者蜂拥而上，一下子就将王炳南和冯铨团团围住了。镁光灯纷纷闪亮，各种型号的麦克风都伸了过来。此时，早有准备的王炳南就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

中国人民一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和美国打仗。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中早已经提到，说中美应该用谈判方式来缓和目前的紧张情势。如果双方都有一样的诚意，我相信这次会谈，不仅是遣返侨民问题不难得到合理的解决，而且更进一步还能对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情势有所贡献。

在准备会谈时，周恩来决定在会谈开始前首先宣布提前释放被判刑的十一名美国间谍。中国先迈出第一步，为中美会谈创造良好的开端，使中国在会谈中夺得主动。

周恩来总理采取先宣布释放美国间谍的做法是很成功的。这使国际舆论很快就认识到中国对会谈是怀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很快就倾向于

中国。对王炳南与美国人第一次举行会谈的情况我有些已经记不清了，但第二次的会谈情况却记得很清楚。会谈开始一个小时，双方就遣侨问题进行了谈判。双方都提出了一份遣侨名单。中方的这份名单中包括了钱学森博士的名字。王炳南还提出，我国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

美方首席代表、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大使看了中方提出的名单后，就说：“王大使先生，您提供的仅是名单，没有证据表明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想回中国。”

早有准备的王炳南立即拿出了一封钱学森写的、要求政府帮助返回祖国的亲笔信。这封信是钱学森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是他夹在一封给国内的家书中捎给陈先生的。

约翰逊看了钱学森的信，就说不出话来了。

其实在中美会谈开始后，我们才意识到，认为开几次会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错误的，在中美两国相互敌视的大背景下，此种会谈将会是十分艰难和旷日持久的。

双方仅就遣返侨民问题就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会谈。约翰逊奉美国政府之命，固执地要坚守住美国对华政策的最根本一条原则，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在会谈中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时，美国政府总是要敏感地联想到是否会形成承认新中国的印象和结果。为此，凡是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约翰逊就兜圈子。

这样，会谈进行了近十轮，还迟迟未能取得什么积极成果。到了当年的8月底，会谈从每周举行三次减少到每周一次。连一直守在会场外等待突破消息的各国新闻记者们，也都渐渐失去了热情和期望。

王炳南对会谈的情景有过这样的记述：“到这个时候，会谈实际上是程式化的。我和约翰逊轮流照本宣科。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你来我往的答辩，这就

要靠反应灵敏，要看善不善于抓住对方谈话的漏洞了。约翰逊是一个老练的、知识面颇为广泛的职业外交家。也许他严格遵守了杜勒斯的嘱咐，在辩论中从不失礼，不用尖刻的语言进行还击。在最难受和尴尬时，也不过就是红一红脸，多抽几支香烟。我们也始终彬彬有礼。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严肃的，但是言谈有理，举止沉着，保持着文明讲理的外交风格。”

外交斗争跟打仗不一样，文明讲理的风格就是我今后和美国进行谈判时要继续保持和发扬的外交风格。

那次会谈的时候，双方在会场内都坚守着自己的防线，而在会场外却进行着甚为友好的私人交往。周恩来指示王炳南要大胆地同对方进行私下接触；约翰逊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可以和中方代表进行个人交往。在会谈僵持不下的时候，为了缓和气氛，双方就相互邀请吃饭。后来我到了美国，也采取这种方法。

在正式场合不便于说的话，吃饭的时候气氛轻松随便，私下可以磋商，交换看法，摸摸底，“甚至还可能有点突破”。有一次是约翰逊需解决一个技术问题，经杜勒斯批准，他请王炳南吃饭。为了避开记者的视线，他在附近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了一处别墅，邀请王炳南悄悄地去共用晚餐，在饭桌上解决了这个技术问题。后来王炳南为了同样的需要，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后，也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进餐。还有一次，国内京剧团到日内瓦演出，王炳南特意邀请了约翰逊及其助手们来看戏。他们特别高兴，可一再叮嘱说：要保密，不要声张，千万不要让那些记者知道。

要回钱学森也是一个胜利

在王炳南和约翰逊之间谈判处于拉锯状态的时候，直接掌握着中美会谈的周恩来指示，为了使会谈不在一个侨民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

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更进一步的核实和处理。于是在9月10日的会谈中，王炳南奉国内指示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十二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出境。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中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

在中方一再主动争取下，历时四十天、会谈十四次后，中美双方终于在9月10日这天的会谈中，在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达成了一个关于遣返侨民的协议，并且公布于世。这也成了中美之间长达十五年大使级会谈中达成的唯一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同时双方商定，中美两国特别委托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协助中美侨民返回本国。

王炳南说，这个协议“是在双方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做‘协议声明’，英文为 AGREEMENT ANNOUNCEMENT”。

十多年后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所达成的有名的《上海公报》，也是沿用了这种形式。这正是毛泽东与蒋介石重庆谈判时最早创立的这种各说各的联合声明模式。1978年，我到美国去谈判建交，也用了这种形式。

会谈从1955年9月20日进入第二阶段，中方提出要讨论实质性问题，即台湾问题及周恩来总理与杜勒斯国务卿直接会谈的问题，希望通过解除禁运和外长会谈，寻求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进两国来往，改善相互关系。

但美国采取敷衍纠缠、拖而不决的态度，先以“关于遣返平民的声明得到履行之前，讨论其他问题未免为时过早”，接着又以朝鲜战争中失踪的四百五十名美国军人的命运问题进行纠缠；还要求先讨论对台湾地区除防御之外不使用武力问题，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对此，王炳南一一给予驳斥，并郑重指出：和平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正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中国主张坐下来谈判，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个主张。但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问题，绝对不可能同中国通过和平方式还是使用武力方式来解放台湾这一内政问题混为一谈。解放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决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议题。要谈就得谈美国应该放弃对中国使用武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问题。

但美方不愿认真讨论，一味拖延敷衍。在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双方一再处于争执不下的情况，使会谈陷入僵局。

1956年1月、3月和6月，中国三次公布会谈经过，揭露了美国拖延谈判的真相。同时，中方接连提出的准许双方记者互访、有关禁运的协议草案、有关文化交流及人民往来的协议草案和司法协议草案，均被美方一一拒绝。

1957年12月12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进行了七十三次。约翰逊在会谈中彬彬有礼地宣布，他将撤出会谈，出任美国驻泰国大使，他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丁接替他的谈判工作。

这分明是美国想把中美会谈降级。王炳南当即表示：这种变化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同时，王炳南也很有礼貌地向约翰逊指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你们这种做法是很不严肃的。正如周总理说过的，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于是，在第七十三次会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

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曾说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1958年起，中美大使级会谈改在华沙举行，地点是波兰政府提供的梅希莱维茨基宫。但时断时续，至1964年4月5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时，已是中美大使级第一百二十次会谈了。

中美谈判总在停下一段时间以后，又继续举行，双方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之所以没有彻底断绝，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都需要在相互不承认的情况下，保持着这个唯一而独特的接触渠道。此后的会谈断断续续，几乎千篇一律，难有进展。正如1968年11月26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的会期问题发表谈话时所说：“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十三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就这两项原则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而是本末倒置，老在一些枝节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告诉美国方面，中国政府是绝不以原则做交易的。如果美国方面继续采取这种做法，不管美国是哪个政府上台，中美大使级会谈绝不会有什结果。”

到了1970年春天，那时还是“文革”时期，我还在外交部写检讨，但没有下放参加劳动。1969年12月，美国大使斯托塞尔追着中国外交人员，要求转达美国政府继续举行美中大使级会谈的意向。我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雷阳将美国的要求报告国内后，毛主席说，美国要谈就谈吧。因我国驻波兰大使回国参加“文革”后未再返任，外交部任命我为驻波兰大使并承担华沙会谈的使命。我一切赴任的工作都准备好了，正待要动身，1970年5月美国入侵

柬埔寨，中国停止了与美国的一切谈判。于是我也就暂时停止出发了。这时阿联（埃及）总统纳赛尔向我国再三提出要中国迅速派出大使到埃及。此时我驻埃及大使黄华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能返任，于是随即把我又调往埃及接替黄华当大使。可没想到，到了1978年，我又被派到美国工作，又与美国方面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谈判。

中美关系走向改善

1978年8月9日，我根据国内指示，刚到华盛顿就与布热津斯基取得了联系，开始就中美建交进行一系列外交会谈。

我在美国期间，和五位前任、在任或后任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布什）打过交道，唯独尼克松像老朋友一样，见面最多。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我就去与尼克松和基辛格交换意见，他们总是热情地接待。尼克松对别人说：“只要是柴大使想要见我，我什么要紧的事都能放下，他想和我谈多长时间，我都陪他。”

所以，我现在还常常想起他为中美关系所做的一切……

想起了老朋友尼克松

说到尼克松和他的执政，还有他的对华政策理念，以及当年我国对中美关系的外交战略思考和决策过程，我想引用一些资料来说明。

1968年，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战胜民主党候选人赫伯特·

汉弗莱，于1969年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

尼克松上台时，面对的国内外“挑战”是相当严峻的。

就国际形势而言：（1）苏联的实力迅速增长，以至于形成美苏均势。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前，洲际导弹数量美苏的比例是二百九十四枚对七十五枚。而到了1970年，苏联拥有一千三百枚陆基洲际导弹，从数量上超过美国的一千零五十四枚。美国已经彻底丧失了“核优势”。（2）美国的西欧盟国和日本等国的实力和独立性增强。在外交政策、关税、贸易限额等方面，西欧和日本同美国之间的竞争和相互排斥越来越多。（3）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的力量壮大。特别是越南战争使美国陷入空前的困境。尼克松上台时所面临的局势是必须维持五十四万侵越人员的沉重负担，对付每周二百人伤亡数目的压力。

柴泽民
大使在我国
驻纽约总领
馆会见美国
前总统尼克
松(1980年)。

就美国国内层面而言：（1）美国由于“帝国战线过长”，实力相对衰落。在表面繁荣的后面，美国经济已呈现衰落的征兆。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庞大的战争开支使美国财政赤字逐年扩大。1968年美国赤字已达605亿美元。这



年美国贸易顺差仅8.4亿美元，与60年代初期的54亿美元对比，相差悬殊。1969年11月至1970年11月，美国经历了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2）侵越战争的失败，不仅使美国在国际上十分孤立，也引起了国内的强烈反对。

1965年民意调查显示,25%的人认为美国介入越南是一个错误,到了1968年持此种看法的人数已达50%。美国国内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此起彼伏,反战示威的人数常有几万至几十万。美国政策的改弦易辙,已势在必行。

由于越南战争模糊了美国战略视线,尼克松的前任犯下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成其主要敌人,而忽视了苏联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的历史性错误。几乎就在同时,苏联依托其迅速增强的军事实力,趁美国深陷越战泥淖之际,积极推行南下战略,企图夺取和控制中东、亚洲的海上通道,切断美国同欧洲、日本的海上运输线,进而包抄欧洲。这一严酷的事实表明,苏联已公开走上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如何摆脱其自身的困境,刹住苏联的扩张势头,就成了尼克松政府的当务之急。

尼克松政府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对美国外交进行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战略调整。美国外交的宗旨,由主动推行“遏制”政策,不断向外扩张,转变为力图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保住已有的势力范围。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调整,就是其中明显一例。1969年7月,尼克松出访亚洲途中,在关岛发表了美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政策的讲话。尼克松所强调的两点是:(1)美国将“恪守”美国的“条约义务”;(2)但在“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问题上,美国将鼓励并期望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负责”。尼克松的关岛讲话要旨,很快就被媒体称为“新亚洲主义”或“尼克松主义”。1970年2月,尼克松政府向国会提交《七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新战略》的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是:美国将参与盟国和友好国家的防务和发展计划,但不会替各国拟订计划和保证全部方案的实施,或担负保卫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任务。美国只有在自己的帮助“起作用”时,而且“符合美国利益”时,才会给予帮助。尼克松还把“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作为其“新和平战略”的三大支柱。(资料来源: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当时大家都认为，“尼克松主义”可以看作是战后美国外交的“分水岭”。美国对外战略“遏制”的总目标没有变，但其策略则变得更加灵活、现实。在调整美国的战略过程中，尼克松政府逐渐认识到：美国应该“抓住中国的现实”，尽快调整对华政策，即由过去的敌视、孤立、包围中国，改为利用中苏矛盾、缓和中美关系，以便从越南脱身和抗衡苏联。美国这种新的对华政策调整，即“联华抗苏”的战略构想，就是在这样的国内外大背景下形成的。研究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方面专家的这些看法是准确的，我很赞同。

尼克松之所以在此时要特别提到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分量在增强，美国对中国可能发挥的作用已经有所认识。尼克松入主白宫十二天后，即1969年2月1日，就向基辛格表示“应鼓励政府探索与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并指示这种探索“应私下进行”。基辛格遵照尼克松的指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国同中国进行接触的可能性，及美国的利弊得失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会议之后，由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愿意通过“对话”同中国接触，缓和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着手建立一种比较富有建设性的关系”。（资料来源：《尼克松回忆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苏格在《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这本书中还提到：在基辛格的主持下，美国政府智囊班子经过反复磋商，起草了一份编号为“NSSM-14”的文件，为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建议。此时，基辛格头脑里中美苏三角政治关系的概念已经基本成型。此后，为了打开美中关系的大门，尼克松通过多方渠道传递信息。这就是：1969年3月，尼克松对戴高乐表示他有意改善中美关系和结束越战。7月下旬，美国放宽了对美国人来华旅行和贸易交流的限制。此外，尼克松7、8月份出访亚欧过程中，还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向中国传递口信，称美国希望同中国对话。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美国一直在密切注

视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7月，基辛格主持制定了编号为“NSSM-63”的中苏关系分析报告。8月，中苏边界发生的新的流血冲突，更加速了美国“联华抗苏”战略构想的成型。

“东联孙吴、北拒曹操”

在尼克松政府酝酿上述战略调整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也在进行重大的战略构思。因为到了此时，中苏同盟早已名不副实，中苏争议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路线问题上的争论，而是苏联霸权主义的恶性发展，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直接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这时，中国在国际战略态势方面实际处在建国以来最为不利的状况。在东面中国大陆要警惕台湾方面的窜犯；在西部中国同印度的关系尚未缓和；在南边中国承担着援越抗美的重任；而在北方中苏关系又处于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为了应付四面八方的威胁，中国当时的军队总员额六百余万人，军费和直接的国防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此数字还不包括三线建设和人防工程等间接开支。（资料来源：徐焰《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备思想》，载《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因此，正当美国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淖而大损元气，被迫进行战略收缩而向中国伸出橄榄枝时，中国没有理由不去利用这一历史性的机遇。虽然美国人“联华”为的是实现对外关系上的“均势”，但中国也可以借此加强自己在国际格局中的地缘依托。

熊向晖在他的《历史的脚注——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位老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这样写道：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具体安排，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四位老师接受了“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1969年7月11

日，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交到了周恩来那里。这份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报告判定“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的安全威胁比美帝大”。而在美苏关系中，“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报告关于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战略分析，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提供了依据。此后，从7月下旬至9月中旬，老帅们又对另一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即：万一苏联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要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老帅们认为古今中外可以借鉴的案例包括：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操”和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谋略。经过十次讨论后，老帅们提交了题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

当时的中国，综合国力并不强大，又同时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毛泽东将中国的这种处境形象地比作“夹肉面包”。如何扭转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严峻局面呢？毛泽东在慎重考虑和反复观察之后，毅然作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定，以开拓中国外交的新局面。用陈毅的话来讲，就是：毛主席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就是面对苏联侵略的威胁，建立一个从中国经中东到西欧，越过大西洋到加拿大、美国，再经过太平洋至日本，并且包括太平洋南岸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再将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亚非拉国家团结起来，形成“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格局。有关毛主席的这一战略思想，不少的回忆录文章和书中都有介绍。

中美互致改善关系信息

1969年10月，尼克松加紧了同中国联系的步伐，他再次请巴基斯坦总统

叶海亚·汗传话，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解冻”，并表示美国将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军舰。此后，尼克松又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伺机同中国外交官接触。12月，斯托塞尔在华沙一次展览会上与中国驻波兰使馆人员相遇，转达了美国政府关于恢复美中华沙会谈的意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注意到了美国的表示，很快作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决定，同时宣布释放当年2月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的两名美国人。此后，中美两国代表商定，中美大使级会谈将在两国大使馆内轮流举行，而不是在波兰政府提供的梅希莱维茨基宫。会址的变化也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1970年1月8日，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通知斯托塞尔，中国同意于1月20日举行中美华沙会谈。同日，美国国务院在宣布该消息时，首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1970年2月，美国在其对外政策报告中又称：“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1970年1月20日，雷阳代办同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会谈。美国大使首先宣读了一份事先拟就的稿子，称美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并表示美国愿派代表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讨论或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中方则按国内指示，重申了解决台湾问题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关键，同时表示对美国方面提出的任何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旨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议，中国都愿意考虑。双方讨论的方式，可以是在大使级会谈，也可以是在更高的层次。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出现了前面一百三十四次会谈前所未有的缓和气氛。2月20日，雷阳代办同斯托塞尔大使在美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了第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级会谈。中方根据国内的指示，再次强调中美两国最根本的原则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并进一步表示：如果美国派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特使来华，中国政府愿意接待。

中美大使级会谈举行了两次后，5月因为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毛泽东主席发表“五二〇声明”予以严厉谴责而中断。同年6月美军撤出柬埔寨后，

中美双方又各自向对方发出一系列希望改善关系的友好信号。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华沙会谈的渠道再未使用。于是中美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就成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最后一次。至此，历时十五年的这个大使级会谈渠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0月初，尼克松又利用叶海亚·汗和齐奥塞斯库来美参加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之机，请他们向中国领导人传话。10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宫向叶海亚·汗表示：美国绝不会同苏联联合反对中国，并表示他愿意派高级使节密访中国，请叶海亚·汗充当中介人，叶海亚·汗欣然应允。次日，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尼克松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发出了西方所称的“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第二天，尼克松请齐奥塞斯库向中国转达他打算派人访问北京的信息。（资料来源：《尼克松回忆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巴基斯坦首先将信息传到北京。11月10日，叶海亚·汗同周恩来在北京会谈，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美国希望同中国走向和好，希望在更高级进行秘密对话。尼克松还暗示，如果中国需要，他可以派基辛格前往。11月14日，周恩来正式答复叶海亚·汗：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特使来北京商谈。叶海亚·汗将周恩来的无抬头无签字的手抄备忘录转给了基辛格。不久，基辛格于12月16日答复：美国同意接受邀请，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北京的会谈将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是将包括旨在改善关系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其他步骤。至于美国在台湾的驻军，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随着东亚的太平洋紧张局势的缓和，美国将减少在该地区的驻军”。（资料来源：《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中译本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方面一直在密切注视美国的政策动向，并不时向美方发出响应信号。毛泽东认为要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就必须同美国的当权派交谈。1970年8

月毛泽东批准了邀请埃德加·斯诺访华的计划，并在国庆节让斯诺上了天安门。不过在当时的背景下，美国人并没有将此事与中美关系的改善联系起来。当基辛格12月16日的复信经巴基斯坦大使转到北京之后，毛泽东于12月18日在中南海再次会见了斯诺。毛泽东向斯诺表示了“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并谈了“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等战略观点。（《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92—594页）毛泽东关于他乐于同尼克松交谈、不管尼克松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行的口信，几天后就传递给了尼克松。尼克松获悉这一信息后很受鼓舞。

根据尼克松自己的回忆录记载，1971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提交了第二份外交政策报告。报告称他在今后一年里有关美中关系要做的事情就是：“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并表示要对“前景”采取完全“现实主义的态度”，“凡是我們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同年3月15日，美国宣布：取消关于持美国护照去中国访问的一切限制。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为后来“乒乓外交”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宫力的《跨越鸿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也谈到了这一段中美双方改善关系的历史性举措。书中写道：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战略意图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周恩来遂于4月21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领导人发出邀请：“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5月17日，尼克松在复信中表示他准备接受对他的访华邀请，并建议派遣基辛格到北京做秘密的先期安排。为了准备美国领导人的来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5月26日开会确定了对美新政策原则：（1）美国全部军事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关系

的关键问题。如果这一原则问题不能事先原则商定，那么尼克松的访华就可能推迟。(2) 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3) 我将力争和平解放台湾。(4) 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5) 如因为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没有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6) 不主动提及联合国问题。如美方主动提及，我方则明确表示绝不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方案。(7) 不主动提及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在美国从台湾撤军的原则确定之后，可以商谈。(8) 中国政府主张美国应从印度支那、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撤军，以保证远东和平。

关于访问的具体方式，中国方面原建议公开来访，因为毛泽东曾说过，既然要来，何必藏头露尾呢。但美国人坚持要保密。数次交涉之后，我方同意基辛格秘密访华。6月2日，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向基辛格亲手递交了周恩来复信。信称：毛泽东欢迎尼克松访华。周恩来也欢迎基辛格为尼克松访华做具体安排。尼克松读完信后，基辛格评论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两人还破例干了一杯陈年白兰地酒。（资料来源：《尼克松回忆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毛泽东让斯诺上了天安门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活动还没有开始，广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喧声如潮。红卫兵军装的绿色与标语口号旗帜的红色，构成了天安门广场的两大主色。

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了好一会儿，按名单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已经陆续来到。当埃德加·斯诺带着夫人路易丝·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快步迎了上去跟斯诺握手。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多次写到他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吸引，所以一见到周恩来，话语有些激动，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马上将话接了过来：“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斯诺当年到陕北写了将红军介绍给全世界的《西行漫记》，是独家新闻。也许此时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毛泽东请他上天安门的重要含义。他当时更多关注的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其实，1970年毛泽东的“五二〇声明”发表后，原定5月下旬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谈夭折了。但是，毛泽东又有了新的思路，他于6月间嘱咐寻找“我们的美国老朋友斯诺先生”。当时得到的报告是说与斯诺失掉了联络。毛泽东让周恩来特别嘱咐中国驻法国使馆联络斯诺，邀请他作为毛泽东的朋友与客人尽快来华访问。使馆很快就联络上了已在瑞士寓居的斯诺先生，并发出了邀请。于是，斯诺与夫人一起在1970年8月14日到达中国。

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斯诺夫妇跟毛泽东亲热地握手。斯诺觉得毛泽东的幽默感不减当年。

毛泽东握住斯诺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朝栏杆前走去，走到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广场上的人群狂热到极点。人群上空，气球拖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有一幅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大标语。

毛泽东举起右手臂向群众挥动。群众欣喜若狂。

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经周恩来精心安排，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照片已经过特别技术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与站在身后的翻译四个人。这张毛泽东跟美国人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应该被视为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松和其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

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不幸他们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老朋友）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主席身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

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件事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主席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毛泽东曾在1949年开国大典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自豪地大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每逢国庆节，毛泽东都要在此举行盛大的国庆庆祝活动，接见人民群众。能在这种时刻站在毛泽东身边的，除了新中国的领袖人物之外，就是当时友好国家的领导人或是兄弟党的领袖。

斯诺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记者，毛泽东为什么让他站在身边检阅人民群众？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女士曾经陪着他参加了那天的活动。

据吴女士回忆，那天上午，在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

处，帮毛泽东穿衣服时，就觉得他的心情格外激动。从天安门回到住处，更完衣，毛泽东还沉浸在一种燃烧的激情之中。当时，吴旭君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给一个美国记者相当于国家领导人的礼遇，就问：“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高的礼遇？”

毛泽东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人的感觉神经。”

后来，基辛格曾经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形容：如果说毛泽东让斯诺上天安门是拿着一把轻剑来传递信息的话，尼克松却举着一柄大锤来传达他自己的信息。就在斯诺上天安门的前几天，即9月27日，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重点谈了刚结束不久的约旦危机。尼克松有意识地在谈话中插进了一段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他自己的作用的寓意很深的话：“也许在五年时间里，或甚至十年时间里还不可能起这种作用。但是，在二十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接着，在10月间，尼克松就亲自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去开拓巴基斯坦渠道。（资料来源：陈敦德《解冻在1972——中美建交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乒乓外交的邀请，震撼基辛格

在中美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刻，还有一件必须记述的大事。

1971年4月，中美两国乒乓球队正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人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华邀请。消息一传开，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4月7日上午10点半，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宋中向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

拉福德·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哈里森当即往美国驻日使馆打电话，美国驻日大使馆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这绝不是一种巧合：因为大使馆已经接到通知，国务院刚刚宣布，总统决定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美国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自然可以建议美国球队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

不过因为事关重大，美驻日大使馆还是给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接到电报的罗杰斯国务卿也不敢怠慢，写上意见后当即送往白宫。意见写道：“虽然我们还未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

可以想象，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并连夜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开会前，尼克松嘱咐基辛格做一下准备，在会上就对华新政策作一个概述。尼克松也没有忘记嘱咐基辛格，关于与中国通过秘密渠道的信件来往及美国的做法不能透露，只能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

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如果说，从1969年、1970年中美两国的外交小步舞使他觉得对手也是懂外交的话，中国人今天这一着更使他觉得对手不凡。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臂。美国人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遇到了一位高手。

基辛格读过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著作。在他1957年出版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摘引过毛泽东的一些警句，但是，书中对“中苏战略思想”的分析，还是套用了杜勒斯的冷战观点，把中苏当成“铁板一块”。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基辛格感到中国就要怒气冲冲地对全世界进行侵略了。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来更简直是无法无天、不可思议，八亿中国人简直是疯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他同情苏联人，认为中国人更好斗，更富于侵略性。

后来，在尼克松的督促下，在接触与处理中国问题的具体过程中，基辛格

的观点开始逐渐转变。经过好几次微妙的外交来回，他领悟了中国人的信息微妙：往往言辞激烈，而行动沉着。他感到，对手是善于分析国际形势的行家，深谙均势之道，懂得各种力量处于经常变动状态，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基辛格改变观点虽说晚了点，却对新中国有了独到的认识。他向往着飞往中国——在乒乓球队访华之后，作为总统特使飞往中国。他预感到这个日子在迫近。使他得意的是，在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国的官员已经在向外国驻北京的使节打听他基辛格了。据说，中国人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怀有敬意，他们看过他的书，他们放出风来：“愿意见基辛格，同这位高手较量较量……”

内阁会议室里灯火通明，该到会的成员都连夜赶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要开始。基辛格收拾好文件，走进会议室。他慢条斯理、胸有成竹地坐下，刚放下文件夹子，尼克松就从连接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个门走进来。总统的气色显得格外好。会议决定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前往中国。

很快，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到北京。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发表了讲话：“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但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他们确实是被当作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的。

有关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直接掌握之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有一件事，大家都津津乐道。那天接见过程中，周总理问美国代表团：你们在中国生活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问题？球队队员科恩突然站了起来，他穿了

件西装，没打领带，仍是长发披肩。他略微欠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斯廷霍文事前曾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让他不要随便拿问题打扰周总理。他焦急地向科恩打手势，但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下，瞄了瞄那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啦。”

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说：“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思想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科恩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总理评价嬉皮士，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被周恩来所折服。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不是吗？”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周恩来的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4月16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的语重心长的话。

华盛顿精心实施“波罗”绝密行动

为了实现中美高级会谈这一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基辛格经过精心安排，

于1971年7月1日开始了他自己起名为“波罗行动”的中国之行。就像它的代号“波罗行动”一样，使人联想起数百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探险行动。

基辛格1971年7月的中国之行，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避免新闻界的耳目，6月30日，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一份例行公告：尼克松总统将派基辛格博士前往亚洲四国，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然后到巴黎同布鲁斯团长磋商美越谈判问题。新闻界对此信以为真，包括国务院官员也深信不疑，连罗杰斯都以为这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

7月1日天还未亮，基辛格一行人乘坐一架空军战术指挥飞机从安德鲁斯机场起飞。两天后到达西贡（今胡志明市）。7月4日，他到了曼谷，那里的记者不多，渲染也少些。基辛格只是对记者们微笑，但是一言不发。7月6日，他飞抵新德里。由于一度出现了骚乱，有百把个反战示威者进行抗议活动，迫使基辛格从边门溜出了飞机场。7月8日，星期四，基辛格飞到了炎热的巴基斯坦新建首都伊斯兰堡时，跟随他的只有三个记者，人们不再注意他了。

伊斯兰堡，是基辛格秘密前往北京的跳板。现代外交史上最了不起的“遁身剧”就要在7月8日这天下午演出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穿针引线，传递秘密信件，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一行动的策划。最关键的是基辛格要装病，而且要装得像，这样就可以赢得时间暗中完成“波罗行动”。

叶海亚·汗总统在招待宴会中开始执行预先商定的计划。基辛格的肚疼成了大家的话题。总统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基辛格复原。他还坚持要基辛格到纳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去休养，这个别墅靠近总统的宾馆，位于穆里以北的群山中。当基辛格迟疑表示不同意时，他坚持说，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由客人的意志来决定。叶海亚·汗说得恳切异常，以致基辛格手下一个特工人员听到之后，立即派了他的一个同事前往该

地，作为“先行”去了解情况。到半夜12点钟左右，这位特工人员打电话来：他已勘察过该处的宾馆，认为不宜于居住。基辛格无计可施，只好要求巴基斯坦人把这位倒霉的特工人员留在纳蒂亚加利，直到基辛格从北京回来。

7月9日凌晨3时半，基辛格和随员们乘巴基斯坦的军用车，由外交秘书苏尔坦·汗陪同驶往查克拉拉机场。他还有一些助手和特工人员和他在一起。按照法兰大使的建议，为了在途中不被路人认出来，基辛格那天戴上一顶大檐帽和一副墨镜。后来基辛格回忆说：“其实在伊斯兰堡，那么早，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而且在这里我的名字也绝非家喻户晓。”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所属的波音707飞机停在机场的军用区等候。这架飞机7月6日、7日两天曾飞往北京，作为试验飞行，回程带来了几名中国领航员，他们要在7月9日的飞行中共同操作；为了保密，他们一直待在机舱中，不让人见到。

7月9日凌晨，基辛格登上查克拉拉机场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飞机，他第一个看到的是章文晋，他是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周恩来派他来护送基辛格博士到北京，表示对这次访问的重视。

基辛格回忆说：

章文晋看起来像艾尔·格雷科油画中的西班牙红衣主教——当然他穿的是毛式制服——他严肃、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他跟我们打招呼，对他来说，一个高级中国外交官陪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飞行2500英里到一个他们自称为世界革命发源地的政府所在地，这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

和他一起的有翻译唐闻生——那个难对付的南希·唐。她生于布鲁克林，因而讲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国英语。我常跟她开玩笑说，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她不会像我一样受到宪法的限制不能当总统。这个前途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她既聪明又活泼，很长一段时间掩盖了她的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章文晋一行的第三位成员是王海容，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

官员……第四个人是礼宾司的唐龙彬。

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我的特工人员也不曾见过，我去什么地方不曾告诉过他们，当他们看到这一切时几乎惊呆了。他们的指责不仅指的是我们乘坐了一架外国飞机——这是违反了他们平日训练的所有原则的——而且指的是一伙中国共产党人把我们带到一个“没有先遣人员”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完全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危险。杰克·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严格执行任务，他们无论到哪里，都紧贴着我们身边，如临大敌。他们甚至在我们和周恩来会谈的时候也要在场。（后来，中国人不许保卫人员进去了。）

从查克拉拉到北京的整个飞行途中，这架飞机上的所有乘客，都没有注意到这一行人马。只在起飞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这一天，当基辛格赶来乘坐这架巴航飞机时，一位以前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工作过的名叫贝格的巴基斯坦籍英国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恰巧在机场。这位记者一眼就认出了他，“那不是基辛格吗？他要去哪儿？”一位巴基斯坦官员说：“是的，他要去中国。”这位官员的回答，无意之中竟泄露了一个白宫最重大的国家机密。

贝格连忙回到办公室，向伦敦报社发了一条急电。他万万没想到，这条重要的消息竟被值班编辑“枪毙”了！据传，这位编辑当时是这样说的：“该死的贝格这个糊涂蛋，准是喝醉了，基辛格怎么会去中国？真荒唐！”

7月9日凌晨4点多，基辛格的座机没有按照通常的民航路线飞行，它不是向南兜一条弧线，然后沿着中国的边界飞行，而是从东北切进，飞越世界上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飞往北京。

经过四小时四十五分的2400英里的飞行，飞机按预定时间于中午12时15分（北京时间）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基辛格一行到达了“波罗行动”的真正目的地。这时，基辛格一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烈地鼓起掌来，祝贺平安抵达北京。

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会谈

基辛格一行在机场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元帅和黄华等人的欢迎。然后主人陪同基辛格乘坐红旗高级轿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来到西郊，下榻钓鱼台国宾馆6号楼。

丰盛的午餐过后，叶剑英兴冲冲地告诉基辛格：周恩来总理要前来看望美国贵宾。基辛格听了真是喜出望外，周恩来作为政府首脑竟然亲自登门拜访，这真是极不寻常的礼遇。基辛格忙招呼手下人员快步走到大厅门口，列队迎接。当周总理的汽车缓慢地驶到6号楼门口时，基辛格迎向前与周恩来握手，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握手。因为所有的一切还在高度保密之中，这一镜头当时没有公布于众。

经过一番介绍和寒暄后，宾主进入会议厅开始首次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叶剑英、黄华、章文晋和熊向晖等；美方参加会谈的有霍尔德里奇（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斯迈泽和洛德（基辛格的特别助理）等。

《新中国外交风云》丛书的第二辑，收录了一本《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作者魏史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对这次高级别的会谈，有详细的描述。根据书中所写，会谈开始后，基辛格拘谨地拿出一份写得密密麻麻的讲稿，读起他与尼克松共同起草的材料，从美中关系谈到这次会晤。当开场白的前言部分快讲完时，基辛格想露一露口才，说：“已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周恩来举起手来，说道：“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基辛格过去多半同苏联人打交道，而中国领导人则是另一种风格。他原以为中国人一上来就会在越南和台湾问题上“狠狠攻击美国”，却没有料到对方竟在神秘不神秘的问题上做文章。开头的那种拘谨气氛逐渐消失了，幽默代替

了彬彬有礼。

这样一来，基辛格撇开原来的稿子，就从台湾撤军等问题，着重谈了如下几点：

——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留下的军事力量。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

——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

——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

——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美国保证将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美国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

接着基辛格还谈了美苏关系、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问题。

基辛格发言后，周恩来说：“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基辛格则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你了。”

晚饭后，中美双方继续会谈。周恩来总理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坦率地说：我们双方有不同的看法，用我们的话来说，世界观和立场都不同。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阁下所说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首先一个问题是平等，换句话说是对等，一切问题从对等出发。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而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我们邀请你们乒乓球队访华就是证明。然后，周恩来总理着重谈了我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并阐明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条约无效。

谈到印支问题时，周总理特别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

尊严。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周恩来神采奕奕，纵论天下大事：“现在天下大乱，贵国总统在堪萨斯的讲话，提出当今世界存在美、苏、欧、中、日五大力量中心，我是基本赞同的。尼克松先生强调这五大力量中心相互间的关系将决定世界和平的结构，并再次重申同中国发展关系，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我们不同意把中国说成是超级大国。”

“五大力量中心”，这是尼克松的一个新说法。听到中国总理介绍自己总统的新观点，身为总统的特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自己还不知道，在与国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也不好说什么，更不愿加以发挥，只好眨眨眼睛点点头。事后，周恩来让他的助手为基辛格送来了尼克松的讲话全文，基辛格深为感动。

基辛格和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谈，就为这一异乎寻常的新关系定下了调子。在基辛格眼里，周恩来敏锐、聪慧而含蓄，是一位目光远大的政治家。基辛格很欣赏周恩来的风度，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位世纪伟人记下了如下的文字：

周恩来于4时半来到钓鱼台。他面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显然，上个世纪以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印在他身上……

周恩来同毛泽东不一样，他曾经到过外国……他担任总理已将近二十

二年，其中九年还兼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四十年代曾经与马歇尔将军进行谈判，他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又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有明确目的……

从会谈中深深地领略到，周恩来是一位镇定自若、才能过人的谈判家。我很快就感到，我同其他共产党人谈判时经常耍的那类小花招不灵了……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

商定尼克松访华事宜

第二天，7月10日上午，基辛格一行由黄华、熊向晖等陪同，参观故宫三大殿和出土文物，基辛格对中国古老文化赞不绝口。下午，到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继续会谈。基辛格对改变会谈地点甚为满意。

周恩来总理建议：尼克松可以在1972年夏天来华访问，并表示尼克松访华前先同苏联领导人会晤可能更慎重些。基辛格说，还是按照安排好的程序进行，先北京，后莫斯科。如果尼克松总统夏天来，离美国大选太近，有争选票之嫌。周总理说，那就1972年春天来访，基辛格表示同意。然后约定晚上商谈关于尼克松访华公告。

当晚商谈中，双方对公告稿的争议主要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原稿中第一点是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周总理考虑如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难看，于是改成“获悉”他要来访，我们邀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对于会谈要讨

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关于来访的时间改为5月以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公告稿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后，周总理于11日9时40分让黄华继续同基辛格商谈。基辛格看后认为，这一稿，中方设身处地考虑了美方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非常接近，马上表示同意。但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地”一词。

最后商定的公告原文是：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中美双方商定，这一公告定于1971年7月15日在两国同时公布。

7月11日吃完饭后，基辛格一行愉快地乘原机飞回巴基斯坦，并立即向尼克松总统写了北京之行的报告：

我们已为你和毛泽东打开历史的新篇章奠定了基础……我们现在所开始的进程将在全世界引起巨大的震动……

然而，当我们踏上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了解这些风险。我们也很了解，另一条道路，即与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最有才能的民族，与一个过去有辉煌成就、未来有巨大潜力的国家继续隔绝的道路，是不可取的……

如果我们保持意志坚定并认真负责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即使是那些风险也可以设法使之转变为对我们有利……

对亚洲和对全世界，我们需要表明，我们扩大外交范围这种做法，绝

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相反地还会证明对它们有利。我们的交往，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别人，都需要讲求信用、准确和策略。如果我们能掌握这些，我们就是进行了一次革命……

基辛格这次秘密访华，意义重大，他与周恩来总理一起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基辛格后来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写道：“伟大人物对重大事件的影响是很难加以确定的……中国和美国在七十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是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七一五公告》震动了世界

尼克松总统对中美会谈公告给予高度重视，并决定亲自在电视台向全美国人民宣布这一重要消息。7月15日，尼克松按预定时间乘飞机来到洛杉矶，进入设在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向全国发表了电视广播讲话：

晚上好！我今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过去三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七亿五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建立我们两国间更正常的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

我现在宣读在北京和美国同时发表的这个公告。

预料公告发表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推测，我们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的这一行动，绝不会损害我们的老朋友的利益。这一行动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我们谋求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任何国家都可

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同时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

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将对所有的国家有利。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将去中国一行——我深切希望这将成为争取和平的一次旅行，不仅是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而且也是为了我们共有的这个地球上的子孙后代的和平。谢谢大家，祝你们晚安。

在尼克松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前一小时左右，国务卿罗杰斯打电话把消息通知了二十几位外国使节，还有台湾当局的“大使”沈剑虹、苏联的多勃雷宁和日本的牛场信彦。沈剑虹当即不满意尼克松的决定，斥之为“不光彩的交易”。他还说：“不应该未经磋商、不打招呼就背着朋友和盟国干出这种事来。”多勃雷宁当时没有什么反应，但过后不久，莫斯科就大发雷霆，指责中美勾结。然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界人士和公众舆论，却热烈赞扬尼克松这个“迅雷般的行动”，并普遍认为“中美关系的解冻有助于世界和平”。（资料来源：解力夫《国门红地毯》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尼克松即将访华的《七一五公告》发表后，震动了世界，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尼克松把他的这次访问视为“历史创举”。为了保证圆满完成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基辛格奉命执行第二次进京，于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进行“技术准备”，商谈访华的具体日期、会谈议程、新闻报道和安全保卫等问题，并同中方进行政治性会谈。

基辛格自定这次访华行动的代号为“波罗二号”。

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

经过紧张周密的准备之后，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终于成行了。从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总统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一周的访问。这是中美相互敌对二十二年之后，美国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首次访问。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世界局势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因此尼克松声称：“这一周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历史性的握手

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总统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李先念副总理和郭沫若副委员长等领导人的欢迎。这个场面使人想起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人不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握手的傲慢无礼的行为。似乎是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尼克松走下飞机时，特意安排在他同周恩来握手前，让随行人员暂缓下机。当他和他的夫人快走到舷梯的尽头时，他就在掌声中急忙伸手向周恩来走

去，主动同周总理热情握手。这一历史性场面被摄影师一一摄入镜头。尼克松事后回忆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对此，基辛格博士在《白宫岁月》一书中曾作过这样的解释：

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是事先作了准备的。尼克松和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镜头拍摄总统和周恩来见面时，他应该是单独一个人。尼克松知道，周恩来对1954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种失礼行为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罗杰斯和我要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们握手结束。

抵达北京之前，我们被这样告诫过至少十几次。根本不可能再忘记了……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到那时有一名粗壮的副官挡住了“空军一号”的通道。我们的中国主人必定大惑不解，不知道官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出了什么事情。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是尾随总统沿舷梯鱼贯而下的。尼克松单独一人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圆满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才像变魔术似地出现。

当时，由于中美两国尚未建交，中央确定的接待方针是：“以礼相待，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在机场悬挂两国国旗，检阅三军仪仗队。但不采用分列式，不鸣礼炮，不请外交使团，不搞群众欢迎。当两人一同登上中国的红旗轿车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寓意深长地对尼克松表示：“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周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一行来到钓鱼台国宾馆，总理夫人邓颖超、郭沫若副委员长夫人于立群早在宾馆迎候。周恩来把尼克松、基辛格的白宫人员安排在18号楼，又将罗杰斯和美国国务院官员安排在6号楼。尼克松由此看出周恩来非常熟悉美国国情，对美国白宫与国务院之间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了如指掌。周总理陪同客人进入大厅后，风度翩翩地同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打招呼，然后在沙发上就座，与客人交谈，幽默的玩笑显出其自信与轻松，很快

赢得了美国客人的好感。尼克松第一次领略了周恩来的非凡的风采。

午宴不久，正当客人进房间休息时，周总理匆匆来找基辛格，说：“主席已经请了总统，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

当尼克松听到这一信息后，多少有点喜出望外。尼克松知道他来中国后，毛泽东肯定要会见他，但却不知道时间安排，更没想到会这么快。

随后，尼克松整装后在周恩来和基辛格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走进一座中国典型的四合院，进入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两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说：“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的领导人的会客室。”

中美领导人谈笑风生论天下

尼克松一进入院落，毛泽东就在秘书的搀扶下站起来，欢迎远方的客人。在一个小时左右的会见中，毛泽东谈笑风生。他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和寒暄后风趣地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谈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基辛格马上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

毛泽东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克松则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可是，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赞成。”

毛泽东又转向基辛格说：“你跑中国跑出名了，第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他称赞访华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可以说天衣无缝。

尼克松说：“只有他（基辛格）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

在谈到美国总统选举时，毛泽东说：“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尼克松说：“这个我懂得，我们希望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

尼克松说：“你是两害之中取其轻啊！”

“我喜欢右派，”毛泽东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英国希思首相是右派，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尼克松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毛泽东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你尼克松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的影响。”

谈到当时的世界局势和中美两国关系，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可是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我

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主席先生，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这里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尼克松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泽东说：“只争朝夕。”

在结束这次会晤之前，尼克松说：“主席先生，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尼克松告辞的时候，毛泽东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笑着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主席把客人送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尼克松回答说：“你的气色很好。”毛泽东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因为毛主席刚刚大病初愈，这次会晤进行了六十五分钟，到下午3点50分就结束了，但却给尼克松和基辛格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认为：毛泽东思维异常活跃，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永远是谈话的中心，在他的引导下，这一次历史性的会晤“是在漫不经心的一种戏谑、玩笑中进行的，轻松的俏皮话使人觉得是几个经常来往的熟人在聊天，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主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出来”。基辛格后来

把这次谈话比喻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含义。

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

就在毛泽东会晤尼克松的当天晚上，2月21日，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尼克松总统一行。中国军乐团演奏了尼克松总统喜爱的《美丽的亚美利加》和《牧场之家》等美国歌曲，优美的旋律在人民大会堂大厅里久久回荡。尼克松听到演奏《美丽的亚美利加》时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最喜欢并指定在他就任总统的典礼上演奏的乐曲。

周恩来总理首先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说：“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周恩来总理强调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中国政府早在1955年就公开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这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尼克松总统在致答词中说：“正如你在祝酒时讲的那样，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如果我们两国人民是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就的确是黑暗的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进行

合作的共同点，那么实现世界和平的机会就无可估量地大大增加。”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结构，”尼克松说，“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待着我们将做些什么。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的命运是为那些使旧世界受苦受难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由于我们有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

尼克松最后以高咏毛泽东的著名词句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他说：“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解决台湾问题是关键

尼克松在北京度过了五天，经过了紧张的谈判、游览和出席公众的活动。2月21日，就在参加当晚的国宴之前，他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首次会谈。

对于要发表的联合公报，尼克松说：“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谈，通常的做法是，开几天会，经过谈论，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辞的公报，把问题遮盖起来。”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

尼克松表示同意。

双方随后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坦率而深入地交换了看法。尼克松先从台湾问题谈起，重申了他处理台湾问题的五项原则：

——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

——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

——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

——支持任何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的企图。

——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决定逐步从台湾撤走军事人员和设施。但在政治方面有困难，还不能马上去掉台湾，希望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

周恩来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人民自己去解决。他表示：尽管台湾问题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我们还可以等待，还可再等几年，我们并不急于要这次就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使尼克松为难。

在北京期间，周恩来和尼克松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2月23日，中美两国政府首脑的会谈移到尼克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下午2点整，当周恩来乘坐的红旗轿车抵达时，尼克松带领基辛格、罗杰斯等人早在门口迎候。周恩来一下车，尼克松就大步迎上前去，热情握手，又主动伸手为周恩来脱掉呢子大衣，周恩来笑着点头相谢。两人友好地站在一起好让记者拍照。记者们都十分赞赏尼克松对周恩来总理表现出的热情举动，美国的一些主要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的照片。有家报纸为此发表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在这次会谈时，双方就台湾和印支等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对尼克松提出的“不能丢弃老朋友”、美国撤走会“出现真空”以及美国要“光荣地结束越战”等论点，进行了评说。周恩来以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退为例说明，美国愈晚退出印支，就愈被动。而美国也承认，戴高乐将军从阿尔及利亚撤军是对的。周恩来还以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为例说明，世界上不可能有“真空”，外国人走了，本国人民自会填补，没有什么“真空”。

在尼克松和周恩来举行限制性会谈的同时，姬鹏飞外长和罗杰斯国务卿也讨论了双方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以及推进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乔冠华副外长和基辛格则具体商谈联合公报。会谈的结果反映在最后达成的联合公报中。根据中方的要求，既列举双方的共同点，也列举双方的分歧点，不用外交词藻掩饰分歧，创造了外交的新风格。

“长城也是人类和平的标志”

尼克松访华的第四天，由叶剑英元帅陪同去游览长城。正好前一天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场大雪。雪后的八达岭一片银装素裹，逶迤的巨龙似的长城仿佛用雪线勾画而出，极为壮观。

尼克松对气势磅礴的长城赞叹不已。他说：“这的确是一座伟大的建筑，人类的奇迹。我们今天到了长城，成了主席说的好汉了；但是，今天是爬不到顶峰了。”

叶剑英笑着说：“总统阁下，我们不是已经在北京进行着顶峰会谈嘛！”

总统得意地笑了。

在归途中，尼克松一行参观了十三陵。他对叶剑英说：“走一万六千英里来看长城是值得的，走一万六千英里看十三陵也是值得的。”他还表示，“长城不仅是地球的标志，而且应该是人类和平的标志！”

到了2月24日上午，中美对《联合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仍存分歧。为此，中方代表乔冠华对美方的立场和措词发表了如下的评论：

第一，既然美方承认，所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台湾问题用什么办法解决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中方的措词是“希望”争取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美方的措词是“关心”它的和平解决。这两个词的含义显然不同，中国不能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

湾问题。

第二，台湾本来是中国的领土，而美国把它作为军事基地使用，美军当然应该全部撤走。而美方的措词是“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设施。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声明吗？

第三，既然美方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内部的问题，当然美国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应全部撤走，所以中方的措词是“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而美方只讲“逐步减少”而不讲完全撤出这个目标，中方不能同意。

最后，经过双方反复会商，《联合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定稿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另外，对反对霸权主义这一条改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取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最后在公报中还加入了双边贸易问题，“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经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过问，尼克松访华公报终于基本上达成协议。2月25日晚上，尼克松在离开北京到中国南方访问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

尼克松作为主人，首先致词。尼克松在祝酒时强调说：“我们开始会谈时，就承认我们之间有巨大的分歧，但是我们决心不让这些分歧阻碍我们和平相处。”

然后，周恩来总理举起酒杯说：“在过去几天里，我们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就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双方之间有着

巨大的原则分歧，经过认真、坦率的讨论，使彼此立场和主张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持不渝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2月26日，尼克松一行离开北京去杭州。美国客人一到杭州便陶醉在天堂般的美景里。尼克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漫步西子湖畔，走上九曲桥，来到花港观鱼。

但就在这时，由于国务卿罗杰斯没有参加公报的起草和谈判，对尼克松重用基辛格很有想法，对即将发表的公报横挑鼻子、竖挑眼，认为“对中国让步太多”，大大小小提出了十五处修改意见。

为了免得事情闹大，让记者们捅出去，尼克松经过反复考虑，还是让基辛格找中方商量。周恩来觉得事关重大，他还是通过电话向毛主席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回答说：“除了台湾问题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

按着毛主席的指示，双方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会谈。最后，这一不大不小的波折获平息，公报在2月27日下午最终达成协议。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因为当时中美尚未建交，故大家称它为“上海公报”，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对国际形势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总理的外交风范叫人折服

1972年2月28日早晨，周恩来将尼克松一行送到虹桥机场的总统座机舷梯旁。尼克松与夫人帕特飞离上海后，帕特对丈夫说：“周恩来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后来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

那时候（指他访华时）我与周除了一起吃饭、参加宴会和其他公开活动以外，正式进行单独会谈也有十五个小时以上。他给我留下了四点不可磨灭的印象：一、周的旺盛的精力、周密的准备、高明的谈判技巧和遇事不慌的镇定态度；二、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在我们的一些时间较长的会谈中，我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听着译员低声翻译的单调的声音，双方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都露出了倦意，但是七十三岁的周却始终头脑敏锐，精神抖擞，聚精会神；三、他从不离题，从不讲废话，也从不要求休息。如果我们对公报措词有一个分歧在下午会议上没有解决了，他并不把问题留给助手，而是在当天余下的时间亲自与基辛格会谈来解决，次日上午他看上去就像在乡间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周末刚回来一样精神；四、他日理万机，工作越繁重，精力越旺盛，权力和责任使他永获青春。周恩来为人机敏练达，对国务的处理周密细致，这些都可以与这种艺术和装饰的精巧细腻媲美。周的机敏胜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而且明显地带有中国人性格的特征。它是千百年来中国文明的发展和有意识锤炼的结果。在谈话时，周总是仔细区分含义的细微差别；在谈判中，他转弯抹角避开争论之点；在外交上，他有时通过看起来很琐细的小事传递重要的信息。

“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尼克松说，“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另一位巨人身边，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世界外交舞台出现了“中国热”

尼克松访华以后，双方同意以巴黎作为保持接触的渠道。1972年3月13

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和美国驻法国大使沃森举行会晤。同一天，美国批准向中国出口价值 228 万美元的卫星地面站设备。

4 月 9 日，美国赠送给中国一对麝香牛，由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主任里德博士等护送到北京。这两头产于北部寒冷地区的稀有动物被放置在北京动物园。我国赠送给美国的大熊猫“玲玲”和“星星”不久也运抵，放置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美国很快掀起“熊猫热”，熊猫和麝香牛推动着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4 月中旬，应美国乒乓球协会邀请，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回访美国。尼克松在接见代表团时说：“因为你们开创的人民对人民的接触，因而取得大胜的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这意味着实现和平的机会有所增加。”他请代表团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转达他的良好祝愿，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再去中国访问。

在这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同中国建交的势头更加迅猛。

1972 年 3 月 13 日，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半个月之后，英国政府终于放弃了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且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同时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机构。中英两国政府由此达成了正式建交的协议，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

同年 5 月 18 日，荷兰政府也作出了同样的抉择。

6 月 15 日，希腊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各界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也随之高涨。1972 年 5 月，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通过新华社常驻波恩记者王殊向中国政府传递信息，要求访华，很快获得中国方面的邀请。经过四十天的谈判，中德两国达成建交协议。

在这之后，欧洲卢森堡、西班牙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数月间，共有二十几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新的外交关系。

每一个建交的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于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驻外大使馆”和“大使”，纷纷降旗、归台。台北“外交部”被舆论讽刺为“绝交部”。世界局势的变化，对台湾当局如同大地震。

在东方，在亚洲，受冲击最大的是日本。二十多年来，日本政府不顾日本人民的强烈要求，奉行僵硬的对华政策，对美国亦步亦趋，到头来却被美国搞了“越顶外交”，美国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率先与中国改善关系，并举行了最高级会晤。美国的这种做法不能不使日本政府感到有一种“被出卖了的感觉”。日本政界的有识之士以此为契机，再一次强烈要求日本当局迅速开展自主和平外交，改善日中关系，日本原来奉行的对华政策也面临作出改变的选择了。

1972年7月，在日中关系问题上一筹莫展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被迫下台。田中角荣上台后，顺应人民的要求和时代的发展，终于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决定实现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

中美关系下一步怎么走

曹桂生在他的《回忆中美“巴黎秘密渠道”》一文中，对1972年以后的中美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

随着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正在一步步向着正常化的方向迈进。首先，中美两国按照《上海公报》精神，积极发展了“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美国政府放宽部分对华贸易限制后，1972年中美当年的双边贸易额就较前增长了十八倍，从前一年的490万美元激增至9590万美元。尼克松的访问，也促使美国出现了“中国热”。中美两国间的文化、科技交流与政界人士的访问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中美双方达成协议，官方和半官方的访问，通过中国驻法国使馆办理。美国人对来中国的私人访问，一般由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办理。在中美两国尚无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国方面通过巴黎渠道，安排了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斯科特等个人和团组对中国的访问。以后，又安排众议院两党领袖博格斯和福特率领的代表团访华。随着交流的增多，经双方协商后，由美方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负责接待中方文教和科技方面的访美代表团。中

美双方促成了体育、文教、卫生和科技等代表团的互访。（《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55—56页）

逐步迈向正常化

1973年初，尼克松连任总统。以前，尼克松在访华时，曾经向中方表示如果他当选连任，他将在其第二任期“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2月15日，基辛格再次访华，中国方面十分重视，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基辛格。毛泽东对基辛格讲：以前中美是“仇人”，现在的关系是“友好”（friendship）。毛泽东把中美关系定性为“友好”关系，显然对中美关系的进程是基本满意的。毛泽东还明确地对基辛格谈论了联美抗苏，即后来被人们称为“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毛泽东说：“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并称：“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基辛格称，美方设想在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头两年削减驻台军事力量，中美互设联络处；后两年，美国将考虑以类似日本的“模式”，实现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即美中建交，但同台湾保持某些文化、经济等民间来往。（资料来源：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商定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联络处。根据中美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两国加快了联络处的筹建工作。1973年3月15日，美方从中国外交部获悉，担任中国驻美联络处正副主任的人选是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两天之后，即3月17日，美方以最快速度书面答复表示同意。同时正式宣布将从5月1日起在中国设立联络处，并宣布任命老资格外交家戴维·布鲁斯出任主任。布鲁斯曾担任过驻法大使、驻联邦德国大使和驻英大使。美国政府还为布鲁斯配备了两名高级助手，一名是国务院的中

国和蒙古事务处处长阿尔弗雷德·詹金斯，另一名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约翰·霍尔德里奇。美国所安排的阵容说明了美国对联络处的重视，它实际上是将联络处作为大使馆来看待的。与美方的安排相呼应，3月29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黄镇和韩叙分别出任驻美联络处正副主任，两人同为大使衔。中方的安排说明中国希望推进中美关系的正常化。5月，双方联络处开始工作，中美双方得以在较高的规格上保持经常的联系。我就是黄镇以后任联络处主任的。



我国首
任驻美联络
处主任黄镇

但是，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丑闻，那一届总统任期没有结束就下台了。他当初在北京作出的实现美中之间关系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的承诺也没有兑现，这主要的原因当然在美国人那儿。

福特时期中美关系停滞不前

尼克松被迫辞职后，1974年8月9日，副总统杰拉德·福特宣誓成为第三十八任美国总统。在美国历任总统中，像福特这样登上总统宝座的十分罕见。1973年，尼克松政府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因贿赂案的牵连被迫辞职，由当时任国会众议院少数派共和党领袖的福特接任副总统。作为没有经过选举程序就任职的副总统，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人。而现在，福特没有经过选举又成为了美国总统。

福特曾声称尼克松时期的外交政策是“最为成功的”，他今后“决不改变方针”。福特虽在国会任职多年，是一个政坛老手，但他精通的是美国国内政

治，在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方面并没有多少经验。当他得知尼克松要辞职时，要求基辛格继续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务卿。福特时期，美国外交实为基辛格所掌管，因而，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主旨在福特时期得以继续。

福特任职期间，虽没有什么积怨，但共和党副总统和总统相继因丑闻而辞职，对共和党形象的负面影响极大。在经济上，美国当时正经历战后第六次经济危机。据统计资料显示，1974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幅度达5.7%，通货膨胀率最高达11%，失业人数825万，失业率高达8.9%。直到1975年初，美国经济方呈现一丝转机。然而，由于经济复苏尚需时日，福特政府在其两年多的任期内，始终没有赢得公众的完全信任。国内政治因素对福特的外交政策带来不少消极影响。

印度支那战争是尼克松留给福特的最大难题，中国问题在白宫的议事日程上所占的位置并不明显。再者，以对苏“缓和”为主旨的福特外交政策，自然使美国对华政策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为此，尼克松时期“联华抗苏”的必要性，在福特时期已经不再那么迫切。

1975年12月1日，福特总统来华访问，邓小平副总理受周总理委托与福特进行会谈。

福特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采取“拖”的方针，不断做出违反《上海公报》精神的事情：美国国务院无理要求从访美的中国艺术团演出节目单中取消《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纵容和支持西藏达赖集团在美国活动；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调回，公然宣布尚未考虑继任人选，故意表示轻慢中国。

福特在与邓小平会谈时说，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须推迟到1976年大选后，再仿照台湾问题的“日本方式”采取行动。一再重弹“期待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老调，说美国“不能在预期和平演变以外情况下抛弃‘老朋友’”。

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按照“日本方式”，也就是要接受断交、废约、

撤军三个原则，美台间的民间贸易关系可以继续保持。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自己来决定。

毛泽东会见了福特和基辛格。

毛泽东对福特对改善中美关系只停留在口头上很不满，幽默地批评他“尽放空炮”。

毛泽东继续开玩笑，指着基辛格说：“你们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美方人员大吃一惊，以为在台湾问题上令毛泽东不满，都顿时紧张起来，只听毛泽东接着说：“他不要我去见上帝！”美方人员才知道是虚惊一场。

福特访华后，便着手处理美国国内事务和准备下届总统竞选事宜。福特原想在竞选获胜后，解决美中建交问题，但后来在竞选中，他败于卡特之手，所以美中建交事宜便与他无缘了。

卡特政府举棋不定

1977年1月，吉米·卡特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

在尼克松执政时期，战后三十年美国内外政策的失误和由此造成的后遗症集中表现出来：越战失败，“水门事件”，通货膨胀，经济不景气，美国社会产生了对美国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的信仰危机。在国际上，美国的“天定命运论”被其他国家否定，需要树立起新的道义形象。因此，卡特上任后，决意恢复人们对美国基本政治制度和美国人历来引以为自豪的价值观念的信仰。

与此相应的是，他在外交中对人权问题情有独钟，希望在“人权”和“民主”的传统上能取得美国人民的支持，“增强美国意识形态对世界的影响”，同时也向所有盟国和友邦保证，美国将信守条约承诺；他还希望以“人权”作为武器，在意识形态上战胜苏联，扩大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的矛盾，为他的“世界秩序战略”服务。

在卡特政府的外交日程上，有一大堆既紧迫又棘手的问题，诸如：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会谈，中东形势，非洲事态，巴拿马运河区问题，等等。

与这些问题相比，美中关系正常化似乎不是特别紧迫的事。在总统的国家安全班子1977年1月第一次开会讨论最紧迫的问题时，甚至没有提到对华政策。

卡特作为佐治亚州的州长，他上台就任总统之前的政务中难得接触到美中关系。这使他在外交方面，包括在处理对华政策方面，就非常依仗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他们的主张也就对总统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方面，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在某些问题上，如在人权外交、中东问题方面，持相似的立场；在另一些问题则有不同的主张。他们最主要的分歧表现在对美苏缓和以及对美中关系正常化的看法。

万斯在他的《困难的抉择》一书中，对当时的美国对外关系形势和他的战略思想这样认为，“讲到经济发展与战略实力，中国还不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强国”，而美苏缓和关系到美国外交的全局，“一个稳定的美苏关系将有助于创造有利于实现美国其他外交政策目标的国际环境”，它“对于保持我们欧洲盟国的信心也是重要的”。他认为，当时，美苏关系的突出问题是要推进在1976年停滞不前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会谈，这是美国外交的“中心环节”，抓住这个环节既可以稳定美苏关系，又可以发展更加广泛的双边合作。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鉴于“苏联对中国过于担心，美国与北京的任何战略合作都可能的美苏关系中引起严重反应”，因此，中美关系正常化必须以不损害美苏缓和为前提。

万斯在描述他和布热津斯基在认识上的分歧时说，布热津斯基认为，要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对苏关系是重要的，但不能过于强调，以免导致别国对美苏主宰世界的担心；或产生对美苏冲突的歇斯底里般的担心。不能把苏联当作

美国利益的焦点而牺牲了其他的全球事务。他也不认为缓和是战争之外的唯一选择。缓和的关系就其本身来说是一种复杂的关系，“缓和不可避免地既包括合作又包括竞争，因此它必须既是全面的又是互惠的”。而且缓和必须既能避免战争，又能成为和平变化的工具。苏联的利益在于把缓和加以局限，使之成为单方面的行为。他“越来越关注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的长远政治含义，担心苏联将会继续运用其实力或者在第三世界挑起纷争，或者将其意图在一些政治竞争中强加给美国”。布热津斯基和一些学者、战略家认为，中苏分裂是冷战时期最富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事件。既然共产主义世界已经成为多中心的，美国也要实行多中心的政策，“要更多地注意中国，因为美中关系对美苏关系产生直接影响”，要利用中苏分裂使苏联的战略计划更加复杂化，“如果苏联多担心一点我们的对华政策，我们就可以少担心一点对苏政策”。

在卡特政府中，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与布热津斯基看法相近。他倾向于从中苏竞争的角度去看待中美关系。

卡特本人则“相信与苏联的缓和”，他认为“这表示在走向和平”，并称由于美苏缓和，“同苏联发生冲突的危险已不那么尖锐”。

1977年卡特受到万斯的影响较多，所以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仍然踌躇不前。后来，由于缓和的衰落，并受布热津斯基的影响越来越多，卡特总统才真正“打定主意”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而时间已经到了1978年。

当然，卡特也不是完全不注意中美关系。早在1976年底，大选获胜后不久，卡特就专门把基辛格请到佐治亚州他的家乡，向基辛格询问了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以及他多次访华后形成的对中国的印象。

美国确定了对中国问题的基调

1976年11月，佐治亚州州长、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利用共和党政府因

“水门事件”而声名狼藉之机，打着“平民百姓”代言人的旗号，当选为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

大选揭晓之后，卡特和即将被任命为国务卿的万斯商讨未来的美国政策时，有关中国问题的基调已经确立。卡特和万斯一致认为：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应是美国的“主要目标之一”。因为，“同一个拥有近十亿人口的国家建立正常关系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卡特和万斯又认为，美国在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时，要“小心谨慎”。美国在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面对面会晤的同时，“也必须制定出维护台湾人民的安全和福利的计划”。

万斯于同年12月就组织了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小组来研究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专家小组包括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托尼·莱克、副助理国务卿威廉·格莱斯特、罗杰·沙利文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等人。万斯向专家小组提供了由尼克松和基辛格制定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全部文件。万斯告知小组，政府需要的是“关于关系正常化和政治、法律以及战略问题的专项分析”。万斯具体指示说：万一我们“不能取得进展”，就制定一项“退却战略”，以便使两国关系“保持现状”。

1977年1月卡特入主白宫后，认真研究了尼克松和福特及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详细备忘录。卡特对中美关系近年来的成绩与问题的初步结论是：“美台关系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2月初，卡特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卡特和黄镇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卡特了解到中国对苏联的态度是“敌对和不信任”，而且担心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卡特也获得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的第一手感性认识。当卡特表示欢迎中国高级领导人访美时，黄镇回答说：“只要华盛顿还有台湾的‘大使’，这件事就没有可能。”卡特对此评论说：“这就是中国人典型的忍耐和固执态度。中国人在这方面从不肯屈尊，好像总自认为是中央王国（文明世界的中心）的一员，只准备等待别人前来接受他们在‘原则问题’上的

立场。”（资料来源：卡特《保持信心》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 年版）

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实力与原则》（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一书中说：“卡特总统知道，如果他想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迈出关键的一步。而卡特总统在此问题上，一直难以最后下定决心。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国际层面上看，美国当时希望优先处理同苏联的关系。例如，在总统就职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商量的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美苏关系和中东等问题，中国问题当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从国内层面上看，美国国内虽然有不少人赞同中美关系正常化，但主张同台湾‘断交’的还为数不多。从卡特智囊班子内部的情况看，在如何发展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各关键部门，如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

与万斯相比，布热津斯基更倾向于加快发展中美关系。他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中国问题的奥克森伯格配合默契。布热津斯基阅读完由奥克森伯格整理的美国前数任领导人同中国官员见面谈话的记录材料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推动中美关系，首先必须重新肯定尼克松对中国人所作出的五点‘承诺’。”为此，布热津斯基向卡特专门呈文，建议政府重申这五点“承诺”：（1）我们承认中国方面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2）我们将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3）在我们离开台湾时，我们将保证不让日本进入台湾取代我们。（4）我们将欢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不支持台湾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军事行动。（5）我们希望中美关系正常化，并设法促其实现。

卡特派员对华进行“探索性访问”

卡特同意了布热津斯基的主张。然而，万斯却对此持异议。理由是美国向

中方阐述上述立场的时机不成熟，这样做为时过早。尽管布热津斯基对此有不同意见，但却没有提出反驳。因此，在卡特就职后的一段时期，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实际上被搁置了。

卡特其实是在美中关系问题上有所作为的。1977年4月，卡特先派他的儿子奇普·卡特随美国国会一个高级代表团访华，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接见。

1977年8月下旬，卡特又派国务卿万斯来华作“探索性访问”。

这时候，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面对苏联的咄咄攻势，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同时，中国这个市场，对美国资本家来说亦有吸引力，如1978年上半年，西欧共同市场向中国的出口比美国多三倍，日本比美国多五倍。美国一些大的财团首脑就发起与中国建交的签名运动，其他财团纷纷响应，认为美中建交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于是他再派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下旬访华。

建交谈判的前奏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以前担任的所有党政军职务。他复出后，主动要求主管教育工作，同时负责国家外交事务。中美关系问题，是邓小平外交事务的重点。

中美关系是邓小平外交事务的重点

远望大洋彼岸，当年的谈判对手尼克松、福特、基辛格已随着政坛潮水退去，现在邓小平面对的，是一位来自美国南部农村的花生种植园主——新任总统卡特。

要说遗憾毕竟是免不了的。遥想当年，来到北京的尼克松向周恩来许诺，将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他虽然获得了连任，却栽倒在自己掘下的“水门事件”深井里，再也站不起来了。接任的福特对中国领导人说，如果他连任，有可能为尼克松、首先是为自己实现承诺——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结果，福特没有走出“水门事件”的阴影，在总统选举中败

在卡特手下。

1977年8月22日万斯访华，24日，邓小平会见了万斯。万斯1975年随福特总统首次访华时曾与邓小平会面，但不久后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会面，而且是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会见的第一位来访的外交部长，可见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这次与邓小平会面，万斯再一次阐述了美国的观点。而邓小平神情严肃地说，美国的立场从《上海公报》后退了。邓小平向万斯提起当年基辛格来中国谈判时说的一句话，当时基辛格表示同意，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美国是欠了账的。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对万斯说：“如果要解决，干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大陆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与万斯一起参加与邓小平会谈的美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后来回忆：“邓小平尽管彬彬有礼，但对万斯的建议很冷淡。当万斯一提出要把在台湾的美国大使馆换成类似联络处的建议，邓便不再继续讨论有关正常化的任何一步措施。”

其实，在我看来，万斯本人还是倾向于发展对华关系，主张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但在当时，万斯持有“渐进派”的观点，这一点，我后来在工作中与万斯接触比较多了，就感受到了。

万斯这次访华前，卡特有一个交代，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三原则”，但那是有条件的：

（一）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二）在非官方条件下保持与台湾的贸易关系，同时根据原先与台湾的条约规定，结束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时要“提前一年通知”，这一条应变通为中美建交后美台原“防御条约”还自动延长一年；

（三）中方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这三条可以视为美国对中方“三原则”的回应。

美国人的这些要求显然是通不过的。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有坚定的主张，那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9月6日，邓小平在同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了万斯来华没有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得进展的原因，认为万斯提出的“设美驻台联络处的方案等于是从美国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了”。

然而，对中美两国将通过谈判实现关系正常化、互派大使，邓小平充满了信心。这年9月27日上午，他会见了美国前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邓小平说，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步伐还可以加快一些。中美两国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们要加强往来。我们希望台湾问题早一点解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有别的考虑。

这趟万斯的北京之行，对中美关系的进展没有实质性的推动。这一方面，是中国领导人需要解决急迫的国内问题；另一方面，是美国人仍把与苏联的“缓和”放到了前列。于是，中美双方继续相互试探。

卡特派布热津斯基访华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28年出生于波兰的华沙，1938年随父母移民加拿大，1953年到美国。他和基辛格都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供职七年。1960年后布热津斯基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共产主义事务研究所所长。也许和出生地有关，他先是对东欧和苏联问题，进而又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研究。

据说卡特入主白宫后，他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由布热津斯基介绍最新国际局势。布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描述得条清缕晰，并提出意见作为总统进

行判断和作出决策的依据。

1977年年末，布热津斯基决心亲自出马，走向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台。没有想到，国务卿万斯向卡特推荐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前往北京。1978年3月中旬，他面见卡特，强调由自己访华更有利。

于是卡特最后下定决心，给万斯写了一封信，让布热津斯基转交，但布拿到了此信的副本。信上说：“副总统、国务卿：我已决定，由布热津斯基去中国最好。”

卡特作出这个决定是有代价的，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矛盾从这时起渐渐表面化了。卡特亲自修改了布热津斯基起草的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提纲，并专门指出，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符合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

在布热津斯基即将访华前夜，卡特又明确指示说：“我希望你这次中国之行富有意义，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你应该向中方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可以非正式地向中国人表示：美国打算今年进一步减少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在商业上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增加直接来往，使之经常化和定期化，这对双方都有利；邀请中国派贸易和军事代表团来美国访问。计划中的这些步骤，要反映出我们向关系正常化目标迈进的诚意。”

1978年5月20日中午，布热津斯基一行十人到达北京。在那之前，2月底我接到外交部通知调任驻美联络处主任，于5月中旬刚从曼谷回到北京，紧接着就参加了对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所有接待工作，其实也就开始全面介入了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

为使此行具有和中国方面进行广泛接触的意义，布热津斯基有意带了四个人向中方通报情况。他们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他将向中国介绍有关美苏力量对比的国际战略问题；国防部的莫顿·阿布拉莫维茨，他将作军事方面总的通报；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

克，他将负责文化与经济合作问题的交谈；总统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的助手本·休伯曼，他将同中方交谈扩大科技方面合作的问题。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专家奥克森伯格将协助布热津斯基准备全面阐述美国外交政策的讲稿。

作为卡特总统的特使来北京启动中美建交谈判，布热津斯基的身份有些不高不低。而当他一下飞机，看到来迎接的是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知道中国是按照接待国务卿的规格对待他，脸上有了笑容。

当晚，黄华外长举行招待晚宴。他在祝酒时说：“布热津斯基博士长期从事国际政治方面的活动和研究工作，我们将乐于借你这次来访的机会，了解你在这方面的见解，同你交换意见。”

布热津斯基致答词。他说，美国总统希望同强大的中国有友好的关系，决心同你们一道克服按照《上海公报》实现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所遇到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拿定了主意。

晚宴之后，双方立刻开始会谈。

听了布热津斯基的发言，黄华没有多谈，表示将在明天的会见中详细答复。

第二天上午，中方安排布热津斯基先后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和故宫博物院。

布热津斯基参观故宫的时候，黄华已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决定亲自会见美国代表。

邓小平会见布热津斯基

5月21日下午4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布热津斯基。

会见过程我也参加了，我觉得，布热津斯基这个人谈话很直率，他见到邓

小平之后就说：我这一次来，是总统授命，美国准备要同中国建交，总统已指定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为美方谈判代表，在北京参加谈判。

这是布热津斯基第一次见到邓小平。会见时在座的美方还有霍尔布鲁克、奥克森伯格和伍德科克；中方有外交部长黄华，我是作为即将赴任的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参加的，参加会见的还有王海容、林平等。

双方入座后，邓小平首先说：“布热津斯基博士，旅途辛苦了。”

布热津斯基的回答别具一格：“我感到振奋。”后来他说，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情绪。

寒暄几句后，邓小平言归正传：“中国方面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总理也是军人，我也一样。”

布热津斯基明白东道主的用意，急忙回答说：“对，军人说话就是痛快。我们美国人也是以说话痛快出名的，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美国人不容易理解，或者美国不容易理解。”接着，他又告诉邓小平，美国方面准备就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开始“积极的会谈”。

布热津斯基看准时机，认为该讲最关键的话了，口气显得特别庄重有力：“卡特总统要我带话给阁下，我们准备认真地谈，不光是谈国际形势，也不光是谈如何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动，来促进共同的目标和排除共同的危险，还要开始更积极地谈关于我们双方当前关心的问题。”

邓小平摇摇头说：“只要卡特总统下决心，我看问题是好解决的。你认为怎样才能实现关系正常化？”

布热津斯基说：“关起门来说，只限在座的诸位，我可以告诉你们，总统本人准备尽可能迅速而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再拖延下去……总统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你们的问题。”

接着，布热津斯基详细向邓小平介绍了卡特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想法，美国接受中国的三条，即：撤军、废约、断交，再次肯定美国上届政府向中国承

诺的五点。

布热津斯基建议：中美从下个月开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邓小平马上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指着黄华外长说，中方谈判代表就是他，我们的外长黄华，希望你们合作得好。接着又追加了一句话：“我想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了，我们期待着卡特总统下定决心的那一天。”并说：“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决心，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他还问：“为了实现正常化，你认为应该做些什么呢？”

布热津斯基作了长篇答复，表示将信守《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这条原则。但他又说，美国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即使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

邓小平换了一个话题说，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希望从美国得到新的技术，不过担心在于美国是否愿意合作。

会谈中，邓小平表述了重要的思想。他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不正常化，性质不同。在经济领域或其他方面，都相互受影响。他再一次强调，谈到正常化问题，我们观点很明确，三个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个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主权问题。“日本方式”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最低方式。所谓“日本方式”，就是在正常化的条件下，我们同意日本同台湾之间商业、人员继续往来。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已经五年多了，这个问题差不多讨论了五年多。我们多次明确阐述了我们的立场。要中国承诺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说不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你们可以说你们的话，但作为条件不行。

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布热津斯基感到，会谈的整个趋势是积极的。他事

后说：“邓个子小，气魄大，立即使我折服。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作为表明美方态度的另一种方式，布热津斯基还转交了卡特总统的两件礼物：一面曾经被美国宇航员带上过月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一块取自月球的石头。卡特在一张便条上这样写道：这两件礼物是送给华国锋总理和中国人民的，“象征着我们对于美好未来的共同追求”。

会谈结束，邓小平引导客人来到了北海琼岛北端的仿膳，共进一顿清朝皇家宫廷式晚宴。这时的气氛轻松多了，邓小平不时用筷子夹起美味佳肴，放到布热津斯基的盘子里。邓小平在祝酒时暗示自己愿意在恰当的时候到美国访问，他意味深长地说，自己作为高级领导人只有三年时间了。当布热津斯基说希望有一天能在自己的华盛顿家中回请他一次，以答谢这次宴请时，邓小平微笑着接受了。不到一年，这个愿望果然实现了。

布热津斯基的访问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从1973年以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停滞不前，布热津斯基的访问给这一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正常化由此进入了实施阶段，为建交谈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这次访问的另一意义是，双方坦率地就全球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并取得诸多共识。

布热津斯基访华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法国《世界报》称这次访问是“中美关系中的决定性里程碑”。

中美建交谈判正式开始了

1978年7月5日，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在北京开始。黄华外长与伍德科克分任两国代表。7月中美在北京的谈判，我参加了两次，然后才去了美国，同布热津斯基继续接触。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那次北京之行后，卡特决定，对华关系正常化问题就由布热津斯基来主持，为保守谈判秘密，知晓者的圈子控制在总统本人、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布朗和布热津斯基之间。

在布热津斯基访华的基础上，万斯也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认为可以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他于6月13日向卡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将与中国建交的日期“预定在12月中旬”。这个备忘录为日后邓小平访美在美国一方埋下了伏笔。

根据一些资料的记录，1978年6月20日，布热津斯基出席了一个由卡特召集的包括国务卿万斯、国防部长布朗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在内的五人绝密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制定美方在即将开始的中美建交谈判中的总体方案。经过讨论，形成了九点原则。为了防止这次会议的内容扩散到五人

之外，会议纪要不是由打字员打出来的，而是由布热津斯基手写在上。

就在五人绝密会议召开半个月后，中美建交谈判在北京正式开始了。

正式开始谈判

九点原则确定后，为了确保 1978 年 7 月 5 日开始的中美建交谈判取得成功，卡特作了如下安排：

（一）决定由伍德科克在北京与中方会谈，而不是在华盛顿或互派特使的方式会谈。这样做一方面可悄悄地进行，以免受国会和舆论的干扰；另一方面可利于保密。

（二）在总统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开始只包括五个人：总统、万斯、布热津斯基、布朗、乔丹，后来副总统蒙代尔也入此组。在驻华联络处内，联络处伍德科克主任和芮效俭副主任主办此事。这些就是美方了解中美建交谈判内幕的全部高层官员。

在北京的时候，伍德科克在第一次会谈时提出了双方要讨论的四项议程：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性质；正常化时美方的声明；正常化之后美台间的商务关系；双方建交联合公报的格式。

中方在会上重申了建交三项原则。对于美方提出的议程，黄华在 7 月 14 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表示，美方应先就中方的建交三原则作出响应，再考虑其他问题。

在我看来，这两次谈判完全是前哨战，中美双方相互摸底，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正式谈判开始的那个阶段情况，阮虹《韩叙传》（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有详细的介绍，引录如下：

谈判在最初一段时间里的确谈不上艰难，相反倒显得有些过于从容

了，或者说它应该被形容为进展缓慢。事实上，这是由美方最初设计的谈判方案造成的。因为在6月20日召开的五人绝密会议上，谈判的节奏被确定为每十天举行一次。伍德科克奉命就四个议题同中方展开谈判，而且美方规定伍德科克每次只谈一个议题，并且先从容易的问题谈起，而把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关头去解决，以免使双方在其他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化为乌有。由于中方的谈判策略是准备让美方和盘托出全部想法之后再做出反应，所以在最初的几个月里，谈判双方差不多只是在阐明自己的立场而几乎没有展开真正的交锋。当然，也没有哪一方亮出自己的底牌，尤其是在最关键的售台武器问题上。

当黄华和伍德科克在北京就中美建交的主要问题展开秘密谈判时，另外两条交换看法的渠道也在华盛顿开通了。一条渠道就是，韩叙（后来是柴泽民）和布热津斯基之间延续了差不多一年的定期会谈，不过在中美建交谈判开始后，它的作用发生了某些变化，或者说它实际上成了建交谈判的延伸或补充。美方希望通过这种会谈使中方了解美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其中也包括美国的对华政策，以便使双方在战略上取得尽可能多的共识，从而减少在北京进行的谈判过程中的误解或冲突。当然，如果因此能使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变得“更加灵活”，那就再好不过了。而中方则希望通过这种会谈摸清美方的动向和真实意图，并向后者施加一定的影响。毫无疑问，双方都想通过这条渠道，使情况变得对自己更有利，不过即使做不到这一点，在高级别上保留一条有效的信息渠道，不论对谈判的哪一方而言都是有益无害的。

另一条具有类似性质的渠道是，建立韩叙和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之间的定期会谈，它将被专门用来讨论包括售台武器问题在内的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问题，这既可以使黄华和伍德科克将诸如此类的肯定会引起争执的问题从建交谈判中取消，同时也不至于干扰柴泽民和布热津斯

基之间的心平气和的会谈。不过这样一来韩叙和霍尔布鲁克之间的麻烦就太多了，而且美方安排后者出场同中方讨论售台武器问题本身就非常耐人寻味，因为霍尔布鲁克此前一直在积极推动卡特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一种被命名为 F-5G 的新型战斗机。不难想像，针锋相对的立场使韩叙和霍尔布鲁克之间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好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也总能在他们之间得到基本解决。

当然，开辟第二条渠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售台武器问题排除在建交谈判之外，事实上，它仍然是双方耗费了最大精力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有什么事情真正妨碍了黄华和伍德科克之间进行的前四轮谈判取得进展的话，那就是美国坚持要把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作为双方建交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显然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

我 1978 年 8 月到任后马上就成为会谈的主角，当然，韩叙仍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

8 月 17 日，我同布热津斯基的第一次会谈在华盛顿进行。

就在这次会谈中，布热津斯基提出，有无可能就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美中两国首脑会谈？这个问题我不能直接回答他。我于是只有婉转地告诉他，过去几位美国领导人已经访问了中国，中国在这方面欠了一些什么，因此，安排中国领导人访美的问题已经可以提到议程上来了。我同时还告诉他，华国锋不久前已经访问了欧洲。这实际上就是转达了一个意思：这回该轮到另一位了。

双方同意加快谈判进程

经过几次会谈，布热津斯基对柴泽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个具有熟练谈判技巧的人，说“他总是拿出一个小本子，照本宣读他的正式发言，然后加以阐述……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能断定，他（指

柴泽民) 不仅把我的观点完整地报告给了中国政府, 而且做了充分准备敦促对某些争端做出调整。没有他的持久努力, 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在12月初实现那种突破”。

我到华盛顿担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的这一个月来, 几乎一直处在忙碌而紧张的唇枪舌剑之中。

那时, 北京和华盛顿两地的谈判都在紧张地进行着。在北京, 每当黄华外长与伍德科克的谈判出现僵局的时候, 在华盛顿, 布热津斯基就要约见我。地点就在白宫, 每次在吃饭的时候谈。大家在一起是边吃边谈, 而且在谈的过程中从没有红过脸, 总是心平气和地来谈。尽管常常据理力争, 你谈你的道理, 我谈我的道理, 但大家不动情绪, 就是谈道理, 谈问题, 这一次谈不成, 下一次再来谈。

布热津斯基这个人脑子很快, 他一听我提出问题, 马上就提出不同的意见, 跟你辩驳。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 他有他的看法。对苏联、对东欧国家他了解的都很多。

当时我们谈的主要问题是台湾问题, 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最后谈到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 我表示, 中方绝不能接受。

而美国人认为这并不至于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 还说过去他们只是出售给台湾常规武器、防御性的武器。

我就讲: 常规武器也是武器, 防御性武器也是武器呀, 既然是武器就可以进攻, 武器不能因为是常规性武器或者是防御性武器, 好像就不是武器了。我说, 这一点就是不能接受。

双方就在这问题上辩来辩去, 反正他就是有一条, 坚持非向台出售武器不行, 这样子, 谈判进行不下去了, 只好停下来。我把他的意见报回国内, 作一个缓冲。

因为我们心中有数, 我知道, 美国对中美发展正常化关系很着急, 因为

1978年很快就过去了，他们要赶在解决跟苏联的问题之前谈成，这对他们有利。

中美建交谈判从7月开始后，双方大约每月开一次会，开了三四次之后，美方的四个议题尚未谈完，进度比较慢。9月15日第四次会议后，双方在售台武器等实质问题上已有些交锋，但都还未亮出底牌。美方开始沉不住气了。

9月19日，卡特总统在白宫约见了我和韩叙。

会见那天来了好多记者，一开始有记者在场时，卡特只谈到双方的一些交流活动。记者一走，关起门来，我们的交谈便单刀直入，直奔主题了。我说：“这些交流活动有助双方关系的发展，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两国关系尽快走向正常化。我们知道卡特总统已下了决心，我们更愿看到美方的实际行动。”

卡特听后，果然给出了“底牌”。他马上说，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赞成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当然，作为最大限度的让步，美国承诺将只出售经过“小心选择的防御性武器”。卡特还再次表示了美方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不会有其他的障碍了”。他说：“今年可能是对我们两国关系来说十分重要的一年。我已指示伍德科克同中方认真讨论关系正常化问题。伍德科克能代表我个人讲话，他在谈判中的讲话是经我批准的。假如谈判成功的话，他准备不迟延地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卡特强调说，“我们现在已接近完成，这对你我双方来说都是很困难而又重要的时刻。我们愿履行你们提出的三点原则。但是，继续同台湾进行贸易，包括出售小心选择的防御性武器，期望你们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些是美国国内政治所需要的。假如这两个问题得以解决，全面、公正解决正常化不会有其他障碍。我期待着能在美国欢迎中国领导人来访。”

我向卡特以及在座的布热津斯基、万斯再次重申了我们概括为“撤军、

废约、断交”的建交三原则。当我谈到中美建交后美国只能同台湾保持民间关系时，卡特点头表示了赞同。但卡特显然对我方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有所保留，即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界不得干涉。于是中美建交谈判在这些问题上暂时僵持不下。

在谈判中，美国人也在尽量地作出一种姿态。为了使我方确信美方在建交问题上确已下定了决心，卡特在10月中旬接受了奥克森伯格和布热津斯基的建议，交给中方一份宣布美中建交的公报草案。受命起草公报草案的布热津斯基甚至将建交的具体日期也写了进去，当他将这个日期确定为1979年1月15日时，卡特还亲自将它提前了15天，即提前到1月1日。

10月30日，我和韩叙再一次与布热津斯基会谈，布在讲话中提醒我们“要抓住眼前稍纵即逝的机会”。我们理解他是担忧中方不明了他们的想法。他有意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双方如果不能在年底以前就建交问题达成协议的话，就将错过美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佳时机。他更明确地提出，按照美国国内政治现实，当年12月至次年1月将是一个特殊机遇，否则国会1979年年初开会，将先讨论美苏核条约等问题，中美关系问题将不得不推迟到1979年秋后，时机不当，会出现困难。如果将中美关系问题推迟到1979年秋天或者更晚的时候去讨论，恐怕没有人能保证不会使建交问题节外生枝。他恳切地说，双方现在必须加快速度，作出决策。

我和韩叙都注意到，卡特政府的确是下了决心了。我们在拿到美方的建交公报草案时，已经清楚地知道了美国人的心情。

11月2日，邓小平作出内部指示：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讲也要加快。他还说，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伍德科克提出的问题谈，要较早正常化，这样比较有利。

同在11月2日，双方举行第五次会谈，伍德科克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

共十六条。这包括双方互相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美台只保持非官方关系、双方发表声明的主要内容和格式等。

此后的建交谈判加快了速度。

12月2日，伍德科克把经过修改的美方草拟的建交公报交给中方。4日，他又告诉中方，美国将在发表建交公报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关闭美国驻台“使馆”，撤出一切美国军队，在台设立非官方机构，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但不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

这时，中方也根据早日促成正常化的精神，提出了中方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

正在谈判的关键时刻，黄华身体感到不适，繁重的谈判令他十分劳累，于是中央决定由韩念龙副部长接替。在12月4日举行的第六次会谈中，韩念龙提出了中方的六点联合公报方案，并且也提出了把1月1日定作建交的日期。韩念龙还表示，在美方发表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时，中方可以不公开批驳，但将阐述自己的立场。

得知这一消息，美方也加快了谈判的步伐。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一起研究了中方的公报草稿，提出了美方的修改意见。卡特还让布热津斯基明确告诉我，美国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11日，布热津斯基约见我，强调正式协商的时间该结束了，作出重大政治决定的时刻现已到来。要求中方作出决断，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他说，“现在我想如同朋友一样对你说，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所有重要问题都已解决，很快就能达成协定，勃列日涅夫很可能在1月访问华盛顿。如果两国能迅速实现正常化，美国就可以立即向华国锋或邓小平发出邀请，中国领导人就可以在1979年1月访问华盛顿。”——他希望邓小平能在勃列日涅夫之前访美。在此之前，布热津斯基已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中美两国不能迅速建交，那就得等到1979年很迟的时候，因为国会的议程安排得很满。我当时就把那次谈话内容向国内作了汇报。

邓小平一锤定音

我在全程参与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是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各种渠道发出信息，既坚持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又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从而大大地推动了谈判的进程。

中美第六次会谈后，双方基本达成了协议，但美方对达成的协议仍不放心，伍德科克提出要正式拜见邓小平。12月13—15日，邓小平四次会见伍德科克，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一锤定音。

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伍德科克和他的副手芮效俭。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会见伍德科克。伍德科克向邓小平呈上美方修改后的公报稿，表示公报发表后四个月内撤走驻台美军，立即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告知说，为了避免国会中的争议，美国准备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十条，提前一年通知对方终止条约。邓小平问：这就是说，在一年里条约仍然有效。那么美国是否同意，在这一年里在对台军售方面不向台湾作出“新的承诺”？已经达成交易的武器仍可继续交付，但不能再有新的交易。他要求，对台军售就此终止。接着他还就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伍德科克静静地听着，他不敢把卡特总统9月对我说的那番话和盘托出——那一次，卡特当面对我说，伍德科克说的话完全可以代表他——而只是答应把邓小平的要求向华盛顿汇报。伍德科克还提出，美方建议1979年1月1日建交，3月1日互派大使和建立大使馆，并请中方提出领导人访美时间。早些时候邓小平审阅公报草案稿后同意公报内容，但他提议增加一条反霸条款（随后美方表示同意）。伍并代表卡特总统向邓小平发出了访美邀请，邓小平副总理欣然接受。

华盛顿与北京有十三个小时的时差，伍德科克正好利用这个时差向华盛顿汇报。读过伍德科克的报告后，布热津斯基立即约见我，建议华盛顿时间12

月15日（星期五）晚9时（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时）为双方发表建交公报的日期；邓小平访美可以定在1979年1月下旬。美国政府因为在伊朗事件上走漏风声而大吃苦头，这回卡特决定不能再事先泄露出去。

14日，应美方要求，邓小平两次会见伍德科克。在前一次会见中，伍德科克向邓小平提出了美方的上述两点建议。邓小平当即决定同意上述两点，并决定1979年1月29日开始访美。在后一次会见中，伍德科克向邓小平通报了美方同意在建交公报中写入反霸条款。

谁知道，就在这种时候，双方在某些关键性的问题上的理解还是有偏差。14日（华盛顿时间），我去白宫见布热津斯基，讨论正常化后两国的互访安排。我说，看来一切都很顺利，尤其是美国同意终止（我用了“终止”这个词）对台军售之后。不料布热津斯基却反驳说，不是这么回事，是在1979年这一年中，美国不再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此后，美国将恢复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当时我就不胜诧异，这显然与中方原来所理解的不同！

我把意见说出来以后，布热津斯基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在这个最敏感的售台武器问题上，双方并没有取得一致，甚至还存在着误解。会见了我之后，布热津斯基立即致电伍德科克询问，中方是否了解，从1980年起，美国将恢复对台湾出售武器。伍德科克和芮效俭报告说，他们阅读了所有的谈判记录，关于这一点曾“含蓄”地提到。卡特总统指示布热津斯基，除非中方了解这一点，他可以向国会保证，在正常化后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援助仍将继续，否则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的。售台武器是有限的、是防御性的，但美国要保留这个权利。

布热津斯基即刻致电伍德科克，要他紧急求见邓小平，向他说明，在正常化后美国要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这时，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

15日下午4时左右，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第四次会见美方代表伍德科克

和芮效俭。当他们说明来意后，邓小平怒不可遏，他猛地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说：“我们绝对不能同意，我们坚决反对，这是不可能的，不能允许的！”伍德科克解释说，正常化是至关重要的，正常化后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在过渡时期，不但中美关系会发生变化，而且海峡两岸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最后，邓小平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争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宏伟气魄，运筹帷幄，决定不让对台军售问题阻挡中美建交大局，先与美国建交，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建交之后接着谈。他说，他保留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伍德科克表示他将立即向华盛顿如实汇报。

15日一早（华盛顿时间），布热津斯基接到伍德科克的电报立即接受了这种新的安排，并去向卡特报告。8时45分，布热津斯基约见我，向我说明了最新的事态，但解释说，美国不可能将对台军售一事保守秘密，这是不现实的。国会中会吵吵嚷嚷，台湾也会将它公开。但他又保证，美国不会主动公布对台军售的消息，“如果被问到，美国政府会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美国仍将向台湾有选择地出售防御性武器，但以不损害该地区的和平的前景为原则”。美国政府还将表示，中国政府反对这种军售，但双方同意实现关系正常化后再谈这个问题。

于是《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文稿到了15日中午才定下来。果然，卡特跟国会一些重要的议员通报了这个消息后引起一片哗然。

新闻界也是吵吵嚷嚷的，不了解情况的到处打听。他们到白宫去，白宫闭口不谈，不管他们怎么追问白宫也不露面，所以他们没办法，就到我们联络处来打听，我们也不见。

15日晚上，在北京的联络处，只有伍德科克和芮效俭两人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凌晨2点多钟（北京时间），华盛顿的电文到了。芮效俭立即将它送

往中国外交部。16日是星期六，伍德科克召集了全体美方工作人员（约三十人）的会议，向他们宣布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工作人员的惊喜是可想而知的。

那天晚上，我国驻美国的联络处也把门关起来不接见人，但是我们知道要宣布联合公报了。因此我们就举行了一个电影招待会，请华人、华侨来看电影。大家不知道，那一刻，我根本不是在看电影，而是在看着手表。等时间到了，我说，请大家停下来，看电视中的卡特讲话。卡特的电视讲话结束后，我根据联合公报的精神又讲了几分钟，主要是中美建交的意义，中国方面的姿态，以及公报中的重要内容。结果大家还不满足，还要问详细的细节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布热津斯基来电话了，我就站起身来，马上去接电话。

布在电话里说，我们已经完成建交任务了，一切手续完毕了，向你表示祝贺。我对他说：“也向你表示祝贺。”

中美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9时），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在各自国家首都同时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说，两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并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公报还说，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除了建交联合公报以外，中美两国政府还分别同时发表了声明。

美国政府的声明说：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台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即一年以后）予以

终止，美国将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余留的军事人员。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声明还表示，应美国政府的邀请，邓小平副总理将于1979年1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当有记者在新闻发布时问到“是否允许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用于防务目的的军事设备”时，中方的回答是：美方在谈判中曾提到在正常化后美方将继续有限度地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对此，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在谈判中，中国多次明确地表明了态度。我们认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方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不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就是说，我们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还是达成了公报。

华国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邓小平在后台坐阵。邓小平是中美建交中国方面的总导演，这样说是恰如其分的。

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大事，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从1949年以来，中美两国有过长期的对抗和隔绝，两国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美建交结束了两国关系长期的不正常状态，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两国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的结晶。经过八年艰辛努力，现在终于结出了硕果。

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是国际关系中的大事。它有利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它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一个榜样。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两岸关系也是一个促进。虽然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从而迫使台湾当局必须面对新的形势。

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代表团时谈到：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允许美国、日本在内的各国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商务、投资等关系。但“中华民国”的旗帜要降下来才行。我们不能允许有什么“两个中国”。在谈到反对中美建交的美国参议员高华德时，邓小平诚恳地说，如果他来，我们会高兴地会见他，并从从容容地进行讨论，不会吵架。

5日，邓小平在会见二十七位美国来访的记者时，再次全面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的政策。他说：在中美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经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的愿望。至于时间表，中国是有耐心的。

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的这些讲话及此后的另一些表态，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到了1979年元旦到来的前一天，台湾驻华盛顿“大使馆”最后降下了旗帜，在美国十四个城市的“领事馆”也同时关闭。

1979年1月1日是中美正式建交的日子。这天上午，邓小平致电卡特总统，热烈祝贺两国建交。下午，他在全政协举行的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座谈会上作了一个讲话。他说：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

的日程上来了。因此，今年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在这里，邓小平把中美建交与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祖国统一大业相提并论，足见对中美建交的重视。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划时代的里程碑。1979年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迅速发展，军事关系开始建立起来，不同层次的互访十分频繁，确实证明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979年1月1日清晨，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临街的大门前，举行了有使馆人员和部分华侨参加的庄严而隆重的升旗仪式。

那一天，在中国驻美联络处内有五百多位来宾，应邀出席了联络处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以庆贺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中美两国领导人分别出席了各自驻对方联络处为庆祝建交举行的招待会，并就两国建交的重大意义及发展前景发表了讲话。



柴泽民大使（右一）与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左一）、国务卿万斯（右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左二）在参加庆祝中美建交一周年招待会时于我驻美大使馆合影（1980年1月1日）。

我作为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那天为庆祝中美建交举行了招待会，美国副总统蒙代尔代表卡特总统和美国政府出席并发表了讲话。他说：中美建交标志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稳定时代的开始，标志着美中两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稳定的世界作出建设性贡献的开始。美国政府一向把中国看成是争取全球和平的一个关键力量。我们希望在全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上同具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进行紧密的合作。

在这个庆祝招待会上，美国国务卿万斯也发表了讲话。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卡特最终作出签署建交公报决定的时候，万斯正在中东进行访问。当卡特将电话打到了耶路撒冷，他得知再过四十八小时，美中双方就要对外发布建交消息时，“简直惊呆了”。原来，卡特和他的同僚在此前有过一个约定，即在1979年1月1日对外发布消息，因为这样将不会影响到万斯与苏联外长敲定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最后细节，但卡特没有遵守这个约定。伍德科克在那时是这样向中方解释卡特坚持要在12月15日宣布建交消息的原因的：卡特非常希望由自己第一个将中美建交的消息告诉美国人民，他担心再等上半个月的话，这个消息很可能就会因为走漏风声而被提前泄露出去。

在北京，伍德科克在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举行庆祝招待会，邓小平应邀出席，并发表了祝酒词。邓小平说：中美建交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也是历史的必然。卡特总统在宣布中美建交时说，美国不是出于权宜之计才采取这个步骤的，我赞赏这个富有远见的见解。中国政府一向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看待中美关系，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出席招待会的中美双方人士都为中美建交而兴高采烈，他们也为邓小平简短而深刻的讲话而欢欣鼓舞。

邓小平还说：“不久以后，我将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我希望通过与美国领导人和美国人民的直接接触和会谈进一步促进中美两

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以及两国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的友好联系与合作。”

台湾当局受到沉重打击

受到中美建交最大打击的是台湾当局。

无论是蒋经国还是驻美“大使”沈剑虹，他们事先都被蒙在鼓里。1978年美国时间12月15日，即中美要发表建交公报的那一天，沈剑虹夫妇还远在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优哉游哉地进行“访问”。

当沈剑虹夫妇看到卡特在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宣读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的内容，然后宣读美国政府对此问题的声明时，不知所措，烦躁不安。

同时，在台北，美国驻台湾当局的“大使”昂格尔接到国务院指示，要他待命接收传来的《联合公报》和美方声明全文，并交待他在华盛顿和北京同时宣布《联合公报》的前两小时，始可将这两份文件送交蒋经国。而且还附有条件：要蒋经国保密，在建交公报正式宣布前，只能把消息告诉少数亲信的助理。

台北时间凌晨2时30分，睡眼蒙眬的蒋经国接见了昂格尔。会晤前后不到十五分钟，蒋经国向昂格尔提出“强硬抗议”。昂格尔一离开，蒋经国就召集台“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及其他有关高级官员举行紧急会议。上午8点，国民党中常委举行紧急会议。12月16日上午10点（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上9点），蒋经国发表被沈剑虹称作“中美关系史上最强硬的声明”，“声明”中说：“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毁约，此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沈剑虹也说：“卡特12月15日所作的宣布对我们是一大打击，他竟然不

与我们磋商就采取行动，实在令人难以相信。美国官员一直都说，他们会先与我们磋商，然而他们却在事前七小时才通知我们的总统。”他承认：“我是失败了！”

中美建交谈判的正式代表

这里有必要再介绍一下中美建交谈判的两位正式代表。

中方代表、外交部长黄华

黄华，中共第一代外交干部。长期以来都是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重要助手。1913 年生于河北磁县，原名王汝梅。1929 年考入辽宁锦州东北交通大学预科。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进关读书，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与校长司徒雷登十分熟悉，也和该校新闻系美国教师埃德加·斯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黄华是 1935 年冬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于 1936 年入党，任中共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同年，他被派往延安，任红军总部翻译，组织并协助一批著名西方记者如斯诺、史沫特莱等访问了陕北中央根据地。1941 年，他担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参与接待了到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

1946年，黄华到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任中共代表叶剑英的秘书兼新闻处处长。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黄华任天津外事处处长。4月任南京外事处处长，受周恩来指示与留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接触，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华是建国后最早接触中美建交问题的外交官。

1954年，黄华作为中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参加了4月至7月举行的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以及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1958年，黄华担任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顾问。1960年，任中国驻加纳首任大使，1966年任中国驻阿联（今埃及）大使。“文化大革命”开始

以后，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奉命回国参加“文革”，黄华是唯一一个继续留任驻外的中国大使。1971年春天，他和章文晋一起在北京负责接待了来华访问的第一个美国民间团体——美国乒乓球队，在著名的“乒乓外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71年7月，黄华又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参加了与秘密访华的基辛格的会谈。事后即赴加拿大担任中国首任大使。同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黄华即于11月赴美国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任代表。1976年12月，黄华接任外交部长。



我国外交部长黄华

在长期的外交事务中，黄华工作谨慎，在对外交往和谈判中以字斟句酌、滴水不漏著称。他的英语娴熟，但在正式谈判中很少用英语，总是将对方的意思以英、汉两种语言各听一遍，这样在回答时就更显得从容了。

美方代表、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

1977年5月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托马斯·盖茨离任前，卡特总统已任命伦纳德·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为美国第四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对伍德科克的任命，中方最初并不看好。伍德科克1911年2月15日生于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后移居密歇根州。早年在底特律当汽车装配工。1955年起任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副主席，1970—1977年任该工会主席，还兼任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会长、美国民权联盟及全国城市联合会主席、全国健康保险委员会主席。他也是底特律市经济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他在工会和企业界有较大的影响，在政界和对外关系方面也很活跃，是美苏关系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日欧三边关系委员会的成员。

这是一份很有分量的简历。但在当时的中国，人们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当时在外交部参与处理美国事务的不少官员，作为当事人，他们都有些框框，认为他未搞过中美关系，也不了解中国，被卡特派驻中国，纯属政治报答性质。

而且，那个“美苏关系委员会”主张稳定美苏关系和东西方缓和紧张局势，这与当时我们主张的联美抗苏“一条线”战略背道而驰。

总之，初步印象是对此人估价不高，既然卡特总统已提名，中方当然不便

拒绝。等到伍德科克到达北京后，中方才逐渐通过接触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发现他是一位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使，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交往与合作的推动者。

1977年7月26日，伍德科克抵达北京。几天后，黄华外长会见了。伍德科克说，他愿在《上海公报》确定的原则下推动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美方已了解中方立场，然而由于美国国内还有困难，这一目标未能实现，但他深信，中美建立正常关系是世界和平所需。从伍氏几次谈话来看，他确实把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当作他的工作重点，这正符合中方的期望。接着，伍德科克又

美国驻
华联络处主
任伍德科克



会见了中国外贸部长李强等有关部门领导人。

1977年8月22日，万斯国务卿率团访华。这是伍德科克抵京任职后最忙的时间。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争论继续进行。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加速与中国建交，共同对付苏联的对外扩张势头；以国务卿万斯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同苏联谈判裁减军备，缓和关系，不应因同中国发展关系而刺激苏联。伍德科克既赞成与苏联谈判，也赞成与中国改善关系，主张不应因与苏谈判和辩论巴拿马运河问题而推迟对华关系正常化。这实际上是站在布热津斯基一边。

美国两派在争论中遇到一个难题，

这就是如何对待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这个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拦路虎无法避开。而伍德科克想到了一个“避开”这个难题的办法。1977年9月底，伍德科克返美述职时就向万斯提出：美方在与中方会谈时，不要再提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是中方不可能接受的。万斯对此未置可否，但答应在10月3日提出新方案，由伍德科克带回北京。

但到了10月底，万斯拿出来的方案只是，美方将不再提在台湾设官方联络处一事。

11月，伍德科克回到北京，11月14日他会见黄华外长，谈了美方不再提设联络处事，却提不出美方完整的新方案。

据王立的《1973—2005 美国驻华大使传奇》（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书中说，这时，伍德科克对万斯的拖延战术已忍无可忍，正好美国联合汽车工会召开全国大会，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便于1978年1月底再返回华盛顿，在会上向美国政府发出了一阵炮轰。他开门见山地说：“美国对华政策以往是建立在荒谬绝伦的基础上，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在中国内战发生三十年之后，美国仍这样做，这是继续参与中国内战。在尼克松总统打开对华交往的大门后的六年内，已有六十七个国家走进这道大门，实际上所有美国的盟国都已走进这道大门。”他最后指出：“我深信，本国能够找到足够的勇气来采取这一明显的步骤。我也深信，美中发展正常化的关系是世界和平所需要的。”由于这次大会受到媒体瞩目，电视记者在场，伍德科克的讲话醒目地出现在当日晚间的电视上。次日的《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把它登在头版。

但事后伍德科克还是不得不面对媒体，声明他那天的讲话，“只代表个人的看法”。

伍德科克具体负责中美建交谈判，他的工作从询问谈判日期开始，一直到谈判的结尾。邓小平称赞他在任期内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功

绩不小。

1979—1981 年，伍德科克担任美国第一任驻华大使。后在密歇根大学任教。2001 年 1 月去世。

关于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的工作

1973年3月29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担任驻美联络处正、副主任的人选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这两个名字对美国人而言显然都不陌生，因为前者在尼克松访华前的中美秘密接触中一直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重要联络人，而后者则是尼克松访华期间负责接待美国代表团的中方主要官员之一。

筹备联络处的先遣组

我是从1978年5月开始参与有关中美建交谈判的工作的，到美国后我的主要精力仍在谈判方面，而联络处的许多工作则由韩叙主管。我和韩叙在一起工作了近半年，直到中美建交谈判结束，我只有在紧张的谈判工作喘息之余才特别关心一下联络处的日常性工作。关于联络处从成立后至中美建交期间的日常工作，阮虹《韩叙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写得很多，我就把其中的一些内容摘要地引述在此。

1973年3月15日美方从中国外交部正式获悉：担任驻美联络处正、副主任的人选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两天之后，美方以最快速度做出表示同意的书面答复。同时通报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正、副主任的人选，即美国驻英国大使戴维·布鲁斯以及资深外交官约翰·霍尔德里奇和阿尔弗雷德·詹金斯。同时任命两位外交官担任这个驻华机构的副主任，这是美方表明自己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双边关系重视程度的方式之一。作为对美方上述安排的呼应，当黄镇和韩叙在两个星期后被正式任命时，中方特别说明，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副主任同样是大使衔的，这同样表明中国政府的重视程度。

与中美双方在人事方面的特殊安排一样耐人寻味的是联络处本身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联络处是比大使馆还要大的使馆。这种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先设立一个过渡性机构来处理双边关系中各种事务的做法，说明即使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中国的外交政策依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灵活性。

1973年4月17日，由韩叙率领的一个负责联络处筹备工作的先遣小组飞抵美国西海岸的著名城市旧金山。曾经长期为毛泽东、周恩来担任英文翻译的冀朝铸（后来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也是这个由七名外交官组成的引人注目的小组的成员。

不论是一般的美国人，还是先遣组的成员本身，首先都是从美方给予后者的非同寻常的礼遇上，意识到联络处和一般大使馆的不同的。通常情况下，即使是某国元首到访，美方也只是派礼宾司长到华盛顿的机场迎接，但是这一次，白宫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竟然赶到了旧金山，而且凡是需要乘坐汽车的时候，韩叙的座车前后都有专门的护卫警车。在其后很长一段时期里，每当联络处的官员们公开外出时，他们的座车前后总会出现这种警车。

位于白宫附近的“五月花”旅馆为先遣组的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美方为第五层楼中一半的房间安装了各种安全设施，并且配备了专用电梯。这里将

作为联络处成员的临时办公地点兼住所。

美方的官员在介绍这家旅馆时特地解释说：你们住在这里，象征着我们都是中美关系的先驱者，就像乘坐“五月花”号抵达北美的美国先驱者们一样，而且，这里离白宫很近，也象征着中美关系的密切程度。

对联络处的高规格礼遇还体现在一些具体安排上，比如负责联络处保卫工作的人员就不是由国务院派出的保卫大使馆的一般警卫人员，而是负责保卫白宫的财政部特工。假使联络处的官员生病了，负责为他们治疗的医生将是平时在白宫专门为总统服务的卡奇博士。此外，美方还指定了两名国务院官员昼夜同韩叙保持热线联系。当这一切情况报告国内之后，周恩来立即指示外交部相应提高了中方对美国驻华联络处先遣组，以及其后到达的布鲁斯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接待规格。

联络处成为中美高层之间联系的秘密渠道

华盛顿的政要们为先遣组的官员打开了社交界的大门，继续保持着人们对联络处在美国受到了极高礼遇的印象，日程表上因此排满了各种宴请。不仅如此，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还陪同韩叙等人参观了华盛顿的名胜古迹以及著名的博物馆和纪念馆。

那时，大多数美国人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毫无所知，在不少人的想象中，他们应该是冷酷、刻板、缺乏人情味和满口空洞说教的人。但韩叙却让他们大感惊讶，他衣着得体，深谙外交礼仪，并且脸上总是带着真诚的微笑。尽管韩叙在谈话时相当谨慎，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善解人意、反应机敏和适当的幽默，使他很快就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好感。

最初一段日子里，排列在韩叙日程表中的某些会见也并非只是礼节性的。4月20日，基辛格为欢迎先遣组到来而举行宴会，他向韩叙通报了美苏关系

的近况，并对中方敦促美国尽快采取措施解决印支和朝鲜半岛问题一事作了解释。这次谈话意味着通过联络处传递信息的中美高层秘密渠道正式启用。不过在联络处主任黄镇到任之前，它还只是部分取代此前使用的另一条秘密渠道，即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作为联络人的渠道。中美之间的秘密渠道同中国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官方正式渠道并用不悖，所不同的是，秘密渠道往往比正式渠道更便捷有效，原因是它可以绕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将重要信息直接传递给对方的最高领导人（同样性质的渠道还存在于美国和苏联之间）。

门庭若市的侨务领事组和商务组

1973年12月搬到康涅狄格街2300号后，拥有四百多个房间的联络处，暂时只有二十多名工作人员，但它必须使自己具有一个使馆的全部功能。有些部门刚一设立就忙得不可开交，比如侨务领事组，那里从早到晚都门庭若市。它为生活在美国的近八十万华人开启了一扇通向自己祖国的大门，而这扇大门曾经被关闭了二十多年。凡是来到联络处的华人，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联络处工作人员还帮助其中一些人寻找已经失散多年的亲友。来自新中国的外交官的友善与台湾官员通常表现出来的冷冰冰的、傲慢无礼的态度，形成了强烈反差，一时间，在华人圈里到处都能听到对联络处官员的赞扬之辞，这使更多的华人甘愿冒着被美国情报部门盘问的风险——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去联络处的人大都受到过这种盘问。

联络处始终将侨务工作视为对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这个工作方针是有远见的。包括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陈省身、李振翩、牛满江、任之恭、张捷迁等在内的一批有声望的华人学者，很快就成了联络处特别邀请的贵宾。

联络处的主动姿态使台湾当局感到相当紧张，台湾的驻美“大使”沈剑虹下令部属改变傲慢无礼的作风。为了保住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他们甚至一口气又设立了四个“领事馆”。

不过，一些来自台湾的青年知识分子却在帮助联络处建立覆盖全美重要城市的电影网，他们不辞劳苦地奔波于美国各大城市之间，使遍布美国各地的华人都有机会看到来自祖国的影片。这个电影网实际上成了联络处在华盛顿举办的电影招待会的延伸。

和侨务领事组差不多同样忙碌的还有商务组。由于有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这一半官方机构的推荐，前来造访的打算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络绎不绝。比如：西屋电器公司的唐纳德·博恩汉姆、约翰·迪尔农机公司的威廉·海威特；大通银行的戴维·洛克菲勒；汉诺威信托银行的盖博瑞尔；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卡斯坦戈……

在最早一批对中国市场怀有浓厚兴趣的美国商人中，就有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保罗·奥斯汀。谁都知道，要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先打开这里的大门是



柴泽民
大使（右）
在纽约与杨
振宁博士
（中）交谈
（1980年）。

个好办法。于是，他的公司每周都要为联络处免费提供两箱可口可乐，他还赠送了一台小型冰箱来放这些饮料。

就整个中美贸易而言，中间还存在着太多的障碍。比如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冻结资产问题”，高关税和技术封锁问题，等等。要消除这些障碍，需要做大量的开拓性的工作。商务组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推动中美两国经济界的相互联系和了解方面成效更为显著。比如它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定期向国内有关部门提供国内当时非常需要的美国经济法规、市场情况、大财团以及经济形势的信息，等等。

相比之下，中美之间科技交流面临的局面则要困难得多。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严密的技术封锁，大部分科技交流项目都只能在商务活动的名义下进行，而一些在后来看来极其普通的信息交流在当时都会被怀疑为“窃取情报”，至于那些负责科技交流工作的官员则很容易被怀疑为情报部门的特工。

为了避免麻烦，联络处在最初几年间一直没有设立科技组。

轰动美国的中国武术团访问演出

在联络处设立的第二年里，7月份中国武术团相当轰动的访美演出，给美国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中美恢复交往以来举办的第一个大获成功的大型文化交流项目。

尽管前期的商谈一直都比较顺利，但在武术团即将动身赴美前夕却出了一点麻烦，原因是台湾方面仓促组成了一个“中华之星歌艺团”，并且要求美方将其安排在同一时间访美，看来是想以此抵销武术团的影响。

韩叙奉命就此事同美方进行交涉，要求美国政府立即阻止台湾歌艺团打算同期来美的行动。

交涉很快就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美方向中方明确承诺，他们不会答应台湾方面的要求，此外他们还将派出二十名保安人员全程负责武术团在美期间的安全，其中的两个人还将在访问结束后，负责将武术团安全送抵香港。

1974年7月10日晚上，基辛格夫妇观看了中国武术团在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举行的访美首场演出，并且在演出结束后会见了全体演员。

作为第一个访美的大型演出团体，中国武术团在两天后还受到了总统尼克松的接见。尼克松把武术团的访问描述为美中人民之间友谊的又一个证明，他还请武术团转达他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他在1972年访问中国时见过的所有朋友的问候。尼克松还想借此机会再次重申这样一种看法，即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不过仅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就因“水门事件”失去了总统职位。尽管如此，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使他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性贡献的总统。

武术团的精彩表演以及媒体对它的大量报道，使许多美国人对精妙的中国“功夫”兴趣大增，一时间，人们学“功夫”成风，就连中国的软底布鞋也被作为“功夫鞋”而畅销于市。后来在很多城市中出现的美中友协组织，就是在一系列成功的文化交流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而且它们热衷于主办一些中、小型的文化交流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像涓涓细流一样，在以它们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不平凡的1978年

仅仅在1978年一年中，联络处就接待了来自祖国的近四十个访美代表团，而这样的数字在以往任何一个年头里都是难以想象的。由于访美代表团的数量骤增，有关的联络和接待事务一下子成为联络处的一项非常繁重的日

常工作。

6月中旬，美国西海岸的著名城市洛杉矶，举办了陕西省户县农民画展，美国民众从中了解到中国的传统绘画技法是怎样被用来表现中国现代农民生活的。

6月28日，中国一个大型艺术团抵达美国，它先后在华盛顿、纽约、明尼阿波利斯、旧金山、洛杉矶等五个城市中演出了三十场精彩的音乐、舞蹈节目，中国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令十三万美国观众大饱眼福。

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接见了中国艺术家，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观看了他们在华盛顿的首场演出，其他官方人士为这个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更是一个接着一个。

从1978年4月起，我国开始接连不断地向美国派出各种各样的科技考察团组，这些团组所考察的范围涉及石油化工、海洋开发、空间技术、高能物理、采矿、冶金、建筑、农业、电子、医疗等各个领域。这种考察不仅使与外界隔绝了十多年的中国科学家们大开眼界，而且也为中美交往开辟了更多的渠道和注入了更多的实质性内容。

同样的，我们驻美联络处也在加紧办理不少美国各界人士访华团的手续。7月份，美国向中国派出了它那时派往国外的最高水平的科技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由美国总统的科技顾问兼科学和技术政策局局长弗兰克·普雷斯亲自率领，其成员囊括了美国所有科技机构的负责人。这个代表团在中国也受到了热情接待，美国媒体甚至略带夸张地评论说，中方给予他们的热情是“自1949年以来美国所有代表团从未得到过的”。尽管普雷斯本人在事前并未期望此行会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但是当代表团离开中国时却带走了很多项颇具可行性的有关交流与合作的建议。有件事曾令普雷斯大吃一惊：当他试探性地提出中国可以先向美国派遣五十名留学生时，中方将他提出的人数增加了十倍。

从8月份到10月份，我、韩叙和普雷斯代表双方一直在就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计划有关方案的基本框架交换意见，最终促成了10月中旬中美双方关于教育交流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而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则成为三个月后邓小平访美时签署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的一些著名学府很快就开始制定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具体计划。几个月后，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里就陆续出现了前来进修的中国学者。

在积极开辟官方渠道的同时，我们又开始寻求通过更多的民间渠道，也就是通过已经进入美国科技界的大量华裔学者，来推动双方的科技交流。我和韩叙所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这些在美国工作的华裔学者并与他们建立联系。这件事，刚开始做相当困难，不过好在韩叙这些年间与美国各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关系，这些关系帮了很大的忙，结果国内在两三个月后就得到了满意的答复。那些与联络处建立了联系的学者，不久就接到了国内有关方面希望他们回国观光或讲学的邀请。与此同时，国内的一些同行也开始进入他们所在的学校或实验室。

双边贸易的情况也成为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转折的标志之一。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在1978年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我们都为此感到振奋。

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奥斯汀频繁地约见包括我、韩叙在内的联络处官员，而且还督促自己的下属也这样做。早在1973年就向中国出售过十架大型客机的波音公司，总是不失时机地向联络处发出各种邀请；波音公司的竞争对手麦道公司的业务人员在联络处同样受到了热情款待。只是麦道公司不可能像当年的波音公司那样，简单地把飞机卖出去就算了事，它还必须同时向中方转让飞机组装技术，中国要求把这一条件写进购买麦道飞机的有关协议。麦道公司在1979年接受了这样的条件，而一两年之后，它的不少组装业务已经可以拿到中国去完成了。

1978年下半年，联络处开始计划在纽约设立商务方面的分支机构，这预

示着中国将向美国加速开放市场。不过将在什么时候以及多大程度上得到这些好处，这还要取决于双边关系正常化以后的步伐究竟有多快，取决于联络处以后的大使馆的领导和同志们再作更为艰巨和不懈的努力。

邓小平的外交旋风

1979年1月29日，在中美建交不久，邓小平开始对美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整个访美过程，一切都非常顺利，所取得的成绩是非常巨大的。而一直陪同邓小平的黄华外长和柴泽民主任，却始终处在很紧张的工作状态，到访问结束后，他俩仅和邓小平照了一张像，这是柴泽民至今谈起来都感到有点遗憾的事。

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安全问题考虑最多

中美建交后我第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安排邓小平副总理访美。

根据中美建交谈判中达成的协议，为了进一步巩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成果，增进两国人民和政府间的相互信任 and 了解，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应卡特总统的邀请于1979年1月28日（北京时间1月29日）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八天的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的首次访美。虽然从名义上邓小平只是副总理，但美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上都非常清楚，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拿大主意的人。因此美国政府并没有把他当作一般的副总理，而是把他当作中国最高的决策者之一，按照最高的规格，给予热情、隆重、周到的接待。随同邓小平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夫人、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共二十人。

从1978年末，我们就为即将开始的邓小平副总理访美的有关事务做周密而细致的准备工作了。

为了很好地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首次访美的全部准备，联络处的同志们紧张而有序地全身心投入了工作。工作任务中包括为近八十个项目的日程作出安排，涉及会见、会谈、宴会、酒会、招待会、工作餐（早餐、午餐、晚餐）和文艺晚会以及参观、游览等各种公共活动；此外，双方的有关部门还要就邓小平访美期间准备签署的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协议达成一致意见。

为此，从1月中旬起，来自国内的先遣小组与美方有关人员之间开始作技术性谈判。随后，我又在美方人员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邓小平将要访问的几个主要城市的准备工作及进展情况。我当时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邓小平访美过程中的安全问题。美国的政治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也不排除在美国的台湾当局背景的人想捣乱，这使得邓小平访美之前的安全准备工作尤为重要。

国内对于安全问题也早有准备。那时，公安部已经从国外得到一些消息。在邓小平赴美访问前几天，布热津斯基约见我，说“有一个问题还没有通报你”。我问是什么问题？他说：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有言论结社自由，因此到那一天要是游行示威，请你们能够谅解这一点。我说，这个不行，邓小平副总理来访问，这是友好的访问，不能够出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他说你一定要了解我们美国，我们没有权力干涉他们，让他们不游行，但是我们有权力指定路线，叫他们不要和邓副总理的路线碰到一起就行了。过去铁托访美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对此，我当时说服不了美国人，就报告国

内，国内也没有办法，说这是他们的制度，咱也不好说服他们。那只好表明态度，让他们必须要保证邓副总理的安全，安全问题要他们全部负责。先遣队跟美国负责安全的人员在一起讨论，美国人说：这个问题我们都有安排，不会使邓副总理受到什么危险，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那么我们就要求他们必须保证做到万无一失。

邓小平副总理到了以后，我将安全问题向他作了汇报，邓副总理说，安全问题交给他们负责，内部保卫由我们负责就是了。一直到邓副总理访美结束，我也没见到游行示威，只是在白宫大草坪参加欢迎仪式时才听到远处有喊口号的声音。后来听说，那时有三派，国民党一派；“台独”分子一派；还有美国的极端分子，就是极“左”分子，他们拿着黄小书，完全像国内“文革”时一样，喊着口号。三队分开游行，以免发生冲突。

在美方举行的欢迎会上，邓小平和卡特在台上站着。对面是站满了群众的看台。左右两边就是贵宾，包括我们中国的代表团成员和美国的一些部长们。卡特总统先讲话，致欢迎词。他讲完以后邓小平副总理讲，邓小平刚讲两句，在群众后面有一个人喊“反对邓小平”的口号。他刚喊出来，美国的安全人员就一下把他的嘴堵住，拉出去了。

2月2日黄昏，邓小平去西蒙顿竞技场那边用晚餐，并观看表演。从宾馆准备上车时，突然有人插入保镖行列，直奔邓小平，但被美国特工击倒。尽管小有惊险，但邓小平副总理仍然是平安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盛大的访问。

美国政府用最高规格的礼遇欢迎邓小平

1979年1月28日（春节）上午，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在北京首都机场登上中国民航波音707-2406专机。飞机经上海，于当地时间1月28日2时35分

抵达美国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我和夫人李友锋，以及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夫人等，前往迎接，并同机飞往华盛顿。28日下午3时30分（北京时间1月29日凌晨4时30分），专机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政府破格以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接待了邓小平副总理；机场上铺着红地毯，鸣礼炮二十一响，气氛祥和而又热烈。此时，正是华盛顿最寒冷的时节，机场上空飘着小雪。经过一昼夜的长途飞行，邓小平走出舷梯时依然神采奕奕，情绪饱满。他身穿厚厚的深灰色大衣，没有戴帽子。

严寒中，机场上有四百多人前来迎接，其中包括美国各界人士、美籍华裔以及旅美华侨，欢迎的人们手举中美两国国旗不停地挥动，一条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

邓小平走下专机，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迎上前去与他握手。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到机场欢迎。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副代表赖亚力以及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



柴泽民
夫妇在阿拉
斯加迎接邓
小平副总理
访美时留影
(1979年1
月)。

事实上，美国政府不仅为邓小平打破了他们以往接待共产党领袖——比如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惯例，而且也打破了他们接待资本主义友好国家元首的惯例。这一点从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美方特地安排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国务院大使级礼宾司长杜贝尔女士赶到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迎候邓小平一行，因为小平同志乘坐的专机将在那里做短暂停留，而在通常情况下，美方官员只在华盛顿的机场迎接他们的客人。不过接下去的很多安排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可能更深刻，其中包括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郊外的家中为邓小平夫妇准备的家庭烤牛肉宴、美国职业篮球明星在肯尼迪中心举行的晚会上别出心裁的表演，以及为装饰国宴大厅特地从卡特总统的家乡佐治亚州运来的一千五百株山茶花，等等。人们还注意到卡特总统在华盛顿先后同邓小平举行了五次会谈，而不是像平时那样最多只举行两三次。国际舆论普遍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在美国所受到的隆重接待和欢迎是美国近二十年来，从未给过别人的。

28日晚，邓小平下了飞机几乎没有休息，在下榻的国宾馆换了一套衣服后，马上就在我的陪同下，前往华盛顿郊外弗吉尼亚州的麦克莱恩，参加布热津斯基的家庭宴会。这顿饭是去年邓小平在北京宴请布热津斯基的时候定下的。此刻，邓小平特别嘱咐：“这个活动很重要，是我访美的第一个活动，你们不能延误，否则，会影响以后的一连串事情的安排。”

按通常的外交活动安排，主宾一到国宾馆，就出发参加私人宴会，一来很少见，二来时间安排也偏紧。因此，在中国代表团先遣组到美国打前站时，美国国务院礼宾司就提出过，如果你们认为一到华盛顿即前去布热津斯基家时间安排过紧，也是可以取消乃至重新安排的。然而，邓小平早在去年5月在北海仿膳宴请布热津斯基时，就表现出对布热津斯基家宴的重视。因此先遣组立即表示，这项活动不必更改。那天，五十岁的冀朝铸担任邓小平的翻译。

为了办好这次晚餐，布热津斯基夫人忙了好几天，还请了国务卿万斯、美

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以及奥克森伯格、霍尔布鲁克前来作陪，布热津斯基的三个孩子端盘子送菜，以示家宴的气氛。当邓小平的车队快到达时，布热津斯基迎了出来。没想到这时出了一点小岔子：布热津斯基一出门，起居室内的炉子突然倒烟，弄得满屋子烟味。布热津斯基夫人和奥克森伯格赶紧搬过电风扇，打开窗户一阵猛吹，总算赶在邓小平进屋前把起居室的空气调整好了。

布热津斯基知道邓小平喜欢喝白酒，准备了不少酒，把苏联大使多勃雷宁赠送的名牌伏特加酒也拿了出来。宴会一开始，布热津斯基又告诉邓小平，这瓶刚打开的苏联伏特加酒也是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爱喝的，邓小平听了开怀大笑。

闲谈中，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开玩笑说，因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总统在国会中遇到了同援蒋集团之间的矛盾，您在中国国内也遇到过这样的麻烦吗？邓小平应声回答：“有。”

他的回答引起在场者的关注，人们都紧紧地盯住了邓小平。

邓小平停顿了一下，诙谐地说：“台湾有人反对我这样做。”此言一出，满座笑声。

席间，邓小平向布热津斯基表达了希望与卡特总统进行会谈的愿望，谈到他希望来到美国亲眼看看这个国家，学习一些好的东西。他还特别谈到，希望就越南问题和卡特总统单独进行一次会谈。

这场家宴持续时间不长，用餐完毕后不久，客人就起身告辞了。

刚刚结束的家宴，可以看作是中美两国首脑正式会谈前的一场小小预演，双方就可能接触的问题亮了牌。

卡特为邓小平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华盛顿时间1月29日上午10时，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为邓小平访美举

行了隆重的正式欢迎仪式。美国政府许多高级官员和一千多名挥舞着小型的中美两国国旗的群众参加了欢迎仪式。在卡特的陪同下，邓小平登上了铺有红地毯的讲台。这时军乐队奏起了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十九响。这一切表明，美国政府是把邓小平副总理当作一个友好国家的首脑来接待的。

在检阅了仪仗队后，卡特致词说：“今年开始了有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期望，这种关系正常化能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世界。”卡特强调说，“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也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今天是和解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接着，邓小平致答词。他高度评价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赞美了两个伟大的国家和两国伟大的人民，并意味深长地说：“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共同努力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欢迎仪式结束后，邓小平和卡特举行两国最高级会谈。会谈前，卡特和邓小平照例寒暄了几句。卡特说：“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曾经在青岛待过。”邓小平说：“我们的部队当时已经包围了那个城市。”“那你们早就见过面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插话说。邓小平笑道：“是的。”短短的几句话，卡特就对邓小平产生了好感。

当时，美国政府正在同苏联进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对此，邓小平表示我们并不反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人需要长期的和平以全面实现现代化。通过努力，我们可以把战争推迟到本世纪末。

当谈到苏联在世界各地的势力扩张，卡特认为有必要美中联合反苏时，邓小平说，现在美国同中国有许多共同利益。毛泽东和周恩来早就指出存在战争的危险，这一战争可能由苏联或美国发动。我们应当努力制止战争。为此，世

界各国有必要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

首次会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当记者们询问他同卡特谈了些什么问题时，邓小平以他那独特的诙谐语气回答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1月29日晚，卡特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和夫人。宴会厅里装饰着特地从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各种颜色的山茶花，表现出主人对此次宴会的格外重视。我国中央电视台和美国三家全国性的电视网转播了这次“全世界多数人今晚所注视的筵席”。

出席宴会的有政府官员、议员、企业家、学者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宾主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卡特首先祝酒。他称赞两国新关系能为世界和平事业服务，特别能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在讲述了科学知识和技术对发展生产的巨大作用和引起的重大变革后说：“我知道，中国人民和您，副总理先生，十分理解这些事情。你们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现代化的工作证实了这一点。美国人民祝愿你们的努力取得成功，并且盼望同你们进行合作。”

邓小平在致词中既谈到了友谊，也讲述了分歧，并重申了中国对和平的希望。他说，我们两国曾在三十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地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以及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各界朋友所作的努力。我们高度评价卡特总统、万斯国务卿和布热津斯基博士为两国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所作出的宝贵贡献。邓小平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出发，用长远的战略观点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双方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双方还在关于建交

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

祝酒结束后，双方开始随意交谈。邓小平谈笑风生，当卡特说到希望恢复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计划时，邓小平笑着拒绝了。在美方提出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要与自由移民政策挂钩时，他说：“如果你要我输送一千万中国人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意的。”这番话引起了满堂大笑。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和夫人在卡特总统和夫人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肯尼迪中心举办的文艺晚会。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一群天真活泼的美国儿童用中文演唱中国歌曲，从而使晚会的欢乐愉快气氛达到了最高潮。对当时的情景，卡特在当天的日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述：“当邓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拥抱演唱中国歌曲的小演员时，流露了真诚的感情。他亲吻了许多儿童，后来记者们报道说不少观众甚至被感动得流泪了……参议员克泽尔特是极力反对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但这次演出之后，他说他们输了。没有办法投票反对儿童们演唱中国歌曲。”卡特写道：“邓和他的夫人似乎真诚地喜欢人民，他确实轰动了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们。”

极其重要的会谈

从29日上午到30日上午，邓小平副总理与卡特总统共进行了三次“极其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会谈。会谈中，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邓小平指出，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第三和第二世界应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苏联终究是要发动战争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能推迟战争爆发；如果无所作为，形势会更加复杂。我们希望同美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做各自的工作。卡特同意邓小平的看法，他强调美国及其

北约盟国的力量正在加强，苏联面临很多困难，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中美双方还讨论了南亚、中东、印支、朝鲜等问题。对于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邓小平说，我们不反对美苏签订这种协议，但我们认为它管不住苏联，约束不住苏联的扩张政策。重要的是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这就是说，中、美、日、西欧以及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破坏苏联的战略计划。

在29日下午的小范围的会谈中，中美两国领导人就苏联支持下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两国领导人还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邓小平说，中国是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我们不会把手捆起来，因为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还指出，美国可以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出贡献，而不要做不利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事。他坚决反对向台湾出售武器，希望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要绝对谨慎。

会谈以后，卡特总统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说：“我们的讨论是深远、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的。”

布热津斯基评论说，讨论是“非常坦率的，其方式是朋友之间、甚至盟国之间所特有的，而不是四个星期前还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的方式”。在正式会谈结束时，布热津斯基感到深受鼓舞，因为“加强两国关系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1月30日下午，邓小平与卡特在白宫举行了第四次会谈，这是一次高度机密的会谈，在场者仅邓小平、卡特和翻译冀朝铸。

31日下午，邓小平与卡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卡特向邓小平通报了对昨天下午两人会谈的回应。

随后，邓小平前往白宫东厅，与卡特总统一道签署了《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中美文化合作协定》。在这之前，两国还签订了高能物理方面合

作协定和领事协定，并就双方在农业、教育和空间技术领域内的具体合作达成了谅解。

签字之后，邓小平致词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我相信，各个国家的联系与合作的不断扩大，各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和了解不断加深，应能有助于我们的这个世界安全一些，稳定一些，和平一些。因此，我们刚刚完成的工作不但有利于中美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邓小平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卡特总统接着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已经划出了一个新的、不可逆转的途径，通向更坚实、更有建设性、更富有希望的两国关系。”

与美国各界广泛接触

1月30日中午，邓小平应邀前往国会大厦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办的午餐。餐后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少数党领袖霍华德·贝克等进行了私下会见。下午，邓小平又出席了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举行的茶话会。随后又与众议院领袖们进行了非正式的讨论。在与美国议员的交谈中，邓小平就台湾问题、中美贸易等问题阐述了中国的立场，首次勾画了“一国两制”的构想。由于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为1978年度的新闻人物，因此议员们纷纷拿着以邓小平的画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1979年第1期请求他签名留念。

晚上，邓小平在华盛顿大酒店出席美中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举行的招待会，并发表讲话。随后又来到美国国家美术馆东翼，参加由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等六个团体联合举办的招待会。大约八百多美国各阶层人士出席了这次充满了友好气氛的招待会。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对世界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

1月31日晚，邓小平在我驻美联络处举行盛大的答谢招待会。联络处的大门红灯高悬，宾朋满座。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近一千人出席了招待会。邓小平和蒙代尔先后讲话，大家对他们的讲话不断报以热烈掌声，招待会洋溢着愉快和友好的气氛。

接受美国记者采访

1月31日中午，邓小平与来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公共广播公司的十一名有影响的新闻界人士举行午餐会。下午3时半，邓小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公共广播公司记者吉姆·莱雷尔、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弗兰克·雷诺兹和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戴维·布林克利在华盛顿布莱尔大厦的联合采访，邓小平回答了他们的提问。现在根据新华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摘要记述如下：

克朗凯特：谢谢你，副总理先生，有这个机会和你见面，并采访你。

邓小平：请让我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美国三家主要的电视公司和公共广播公司给我这个机会，通过电视同美国公众见面。首先，我要向伟大的美国人民表示我的亲切问候。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一向是友好的。现在，中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就为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良好的前景。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都要求我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我接受卡特总统的邀请来访问你们的国家，肩负着三个使命：

第一，是向美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友谊；

第二，是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第三，是同贵国的领导人就发展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问

题广泛地交换意见。我可以告诉美国人民，我同卡特总统和其他美国领导人在过去两天会谈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卡特总统和夫人已经接受华国锋总理的邀请，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正式访问中国。他们在中国将受到热情接待。

现在，我准备回答记者们的问题。

克朗凯特：谢谢，副总理先生，你上周和《时代》周刊的赫德利·多诺万谈话时曾建议，日本、美国和中国签订一条约以遏制苏联的霸权或可以称为侵略的行径。你是否已正式向美国领导人提出这个建议？如果已经提出，那反应是什么呢？

邓小平：我没有提这样的建议。我只是说，对待苏联的霸权主义，我们应该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为了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需要联合起来，认真地对付这种发动战争的危险挑战。我们不需要一个什么条约和同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对局势的共同的 understanding，并作出共同的努力。

莱雷尔：副总理先生，有人把你到达这个国家后发表的关于苏联的讲话，解释为你想改变卡特总统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立场。这是你的打算吗？

邓小平：我没有这个意图。我刚刚说过，同苏联谈判或签订这种协议，我们并不反对。我只是说，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协议上，它们对遏制苏联起不了多大作用。

雷诺兹：如果台湾拒绝自愿和你们重新统一，而美国甚至在《共同防御条约》废除后，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那你们除了使用武力外，还有什么选择来求得统一？

邓小平：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和完成我国的统一，但我们并不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

布林克利：副总理先生，除了友谊和善意以外，你最希望在这次美国之行中得到什么？

邓小平：通过这次访问，主要是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希望我们之间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以及其他领域的关系，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克朗凯特：副总理先生，你在和卡特总统的会谈中有何分歧？

邓小平：我们的方式是让各方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会谈是非常融洽的。

访美日程排得满满的

邓小平此次访美日程排得满满的。2月1日，邓小平一行离开华盛顿后，又访问了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

2月1日中午，亚特兰大商会和南部地区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邓副总理下榻的桃树广场饭店，联合举办了有一千四百人参加的盛大招待会，欢迎邓小平副总理。晚上，邓小平出席了佐治亚州州长乔治·巴斯比的宴会。美国十六个州的州长和一个州的州长夫人也参加了宴会。邓小平与美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一再表示，希望中美两国人民能千秋万代地友好下去，能在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合作。在谈到两国的贸易前景时，他说，中美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元。

2月2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结束了对亚特兰大二十三小时的访问，乘坐美国总统座机到达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威廉·克莱门茨州长和吉姆·麦康恩市长对中国客人表示热烈欢迎。邓副总理参观了休斯敦附近的林登·约翰逊航天中心。当晚，邓副总理还在距休斯顿50英里以外的西蒙顿竞技场观看了马术竞技表演。当邓副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到达竞赛场地时，人们纷纷伸出手来

和他握手，邓副总理朝站起来向他欢呼的人们挥手致意。

2月3日，邓副总理从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飞抵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访问，受到了华盛顿州州长迪克西·李·雷、西雅图市市长查尔斯·罗耶等人的热烈欢迎。

2月4日下午，邓副总理一行参观了在西雅图附近的埃弗雷特区的“波音747”飞机装配厂。波音飞机公司董事长威尔逊向客人作了介绍，并说中国订购的三架大型喷气式客机中的第一架，将在1980年交货。每架飞机有三百零五个座位。参观结束时，邓副总理对主人表示感谢，并且说，他看到了一些很新颖的东西。

2月5日上午，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等一行圆满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乘专机离开西雅图经日本回国。

邓小平副总理对美国的访问是中美关系史上空前的大事。这次访问与中美建交公报一起，开创了中美关系史的新纪元，使中美关系在正常化之后立即有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访问大大增进了两国政界和人民之间的了解，美国人民从邓小平身上看到了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形象，这对几年前还处于“文革”动乱之中的中国，在国际上确立它的新形象上是非常重要的。

邓小平在美国掀起了“中国热”

邓小平的这次出访，在美国掀起了全国性的“中国热”。在历时八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与卡特总统进行了有益的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各界知名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了讲话。那几天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变成了“邓小平时间”，美国各大报也以显著地位报道了邓小平的访问活动。邓小平的传奇性经历、他的政治家的风度和令人喜爱的性格，深深地吸引了美国人民。邓小平的美国之行，无疑对美国了解中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离开美国时，特致电美国总统卡特，肯定访美取得圆满成功，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重大的发展”。

美国总统卡特原来对邓小平访美顾虑重重，白宫担心中国会在台湾问题上持强硬态度，还可能在亚洲其他地区遇到难以预料的复杂问题，甚至发生重大对抗，在美国国会也会遇到政治上的反对，但和邓小平一接触，就发现邓小平能更巧妙地做通美国上层人士和议员的工作，因而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成果。

对此，卡特总统用热情洋溢的话语说：“一切都很顺利。无论在建交前还是建交之后，中国人对我的其他职责，对我们国内的政治现实都表现出十分了解。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关于我们新建立的外交关系在西太平洋的稳定作用，以及我们同日本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的必要性，他们的言论都是有益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懂得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

任驻美大使的日子

1979年1月1日，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结束了近三十年的敌对状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中美建交后，柴泽民即被中国政府任命为驻美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出任驻美大使

1979年3月1日，一辆插有中美两国国旗的黑色礼车停在了华盛顿西北区康涅狄格街2300号中国大使馆门前，从车内走出来的是美国国务院礼宾司司长，他将陪同我前往白宫，正式向美国总统卡特递交国书。

军乐队和仪仗队早已排列在白宫大门口的两侧，在迎接礼车的到来，这使整个仪式显得隆重而庄严。

在进入椭圆形办公室之前，我在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陪同下参观了“金室”，即一间陈列着各式金银器皿的接待室，还在一



1979

年3月1日，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开馆升国旗仪式。中为柴泽民大使，左为冶金部部长唐克。

间紧靠玫瑰园的用中国墙纸装饰的候客厅中等候了片刻。当我在总统的来宾签名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之后，那间著名办公室的大门打开了。

我走进椭圆形办公室，耀眼的水银灯已经打开，卡特总统露出了微笑。我在递交国书和颂词正本的同时，向卡特总统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他的问候。这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白宫记者们，开始不停地按动他们手中照相机的快门。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两三分钟，在通常情况下，仪式到这里就结束了。当然，如果有必要的话，总统会适当延长这个过程，以表明美国更重视他同建交国的关系。这天，当记者们的拍照结束之后，卡特又同我进行了短暂的交谈。我向卡特表示，能够出任中国驻美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感到非常荣幸，我将全力以赴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而工作。同时我也谈到，一个重要的前提——如果双方能够切实遵守两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的话，双边关系完全可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卡特对我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美方将协助我完成自己的使命。他还说：“我们已经建立起比较稳定而持久的友谊纽带，我相信，今后的岁月将为扩大和丰富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展现出十分美好的前景。”递交国书的仪式在这种堪称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

美国国务院礼宾司司长陪同我又回到了中国驻美大使馆，我邀请他和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们一起喝一杯香槟酒，他高兴地接受了。

递交国书之后，我和大使馆的同志们就开始了更为繁忙的外交活动。

这里也要顺便说一下，对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的任命，曾出现了一点波折。

1979年2月，美国参议院开始讨论卡特总统对伍德科克使华的任命。赫尔姆斯参议员首先发难。他质问伍德科克：“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你没有能够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个直接表示不会对台湾动武的承诺。你对此作何解释？”伍德科克并不回避这一问题，他坦率地说：“我个人认为，坚持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只会使建交谈判遭遇路障和陷入僵局，因为这是中国的一个主权问题，这实质上是试图让一个主权国家承诺不使用武力来对付它认为是自己境内一个省的问题。”这个答复对赫尔姆斯无疑是当头一击。赫尔姆斯怒气冲冲地说：“在我看来，伍德科克先生不愿意在北京共产党政权那里为台



柴泽民
大使（中）
向卡特总统
（右）递交国
书（1979年
3月1日）。

湾的安全取得任何利益。”伍德科克再次回答说：“我们的确在谈判中明确地讲了希望台湾问题应该和平解决这一立场。我想提醒的是，如果国会通过的法案（指《与台湾关系法》）中的语言与美中建交协议相抵触，那将是最不幸的事。”伍德科克还回答了丘奇参议员等人的质问。

当参议院的审查还在进行时，1979年2月17日中国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此事给了某些议员反对伍德科克任命的借口。

老资格的丘奇参议员这时出面为伍德科克解脱困境。他表示：“任命一位大使并不意味着支持某个国家的行动，承认一个国家，并不表明同意其所有政策。总统承认中国，只说明美国三十年来一直有个幻觉，似乎中国政府是在台湾岛上。”资深参议员伯德发言支持丘奇的观点。这几位民主党资深参议员的支持扭转了形势，在2月下旬对任命进行表决后，结果是八十二票对九票，支持者占绝对多数，通过了对伍德科克的任命。这场激烈的参院辩论终于结束。

3月1日，伍德科克大使在北京朝阳门外的美国大使馆举行了开馆仪式，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也在此时访华，参加了开馆仪式。7日，伍德科克前往人民大会堂，向中国领导人递交了国书。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对美国的利益极端重要”这一思想，就已在美国出现，正式表达这种新路线的则是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

1979年8月25日—9月1日，蒙代尔副总统和夫人应中国政府邀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七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中美建交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最高领导人，也是我出任大使后第一次陪同一位国家领导人访华。蒙代尔会见了华国锋总

理，与邓小平副总理就两国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和民航合作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举行了两次会谈，并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 1980 年和 1981 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和中美两国政府水力发电与有关的水资源利用合作协议书。

8 月 27 日，蒙代尔在北京大学发表了公开演讲。他在演讲中说：“美国正在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它这样做不仅出自诚挚的感情，也不仅是出于自然的好奇心，而是为了坚持原则和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两者的结合是所有现代国家建立和维持成熟关系的推动力。”他重申，一个强大而巩固的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任何试图在国际事务中削弱或孤立中国的国家，其立场便与美国的利益相抵触”。他说，美国政府正在采取重要步骤以推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我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庆祝中美建交一周年招待会上，柴泽民大使（左一）与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左三）举杯共贺。左四为国务卿万斯（1980 年 1 月 1 日）。

1979 年内中美两国来往越来越多

建交以后的第一年，中美两国之间的往来日益增多。1979 年内，中国访问美国的政府高级官员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石油部部长宋振明、冶金部部长唐克、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外贸部部长李强等。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访华的有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商务部长朱厄妮塔·克雷普斯，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等。

1979 年，中美两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往有很大发展。中美两国之间就贸易、文化、科技、资产、领事关系等问题签订了十五项协定和议定书。5 月份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访华时，于 14 日草签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该协定（包含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由中美两国政府代表于 7 月 7 日在北京正式签署，该协定（包含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于 1980 年 2 月 1 日正式生效。

美国一些公司同中方合作，已开始在中国的南海、黄海海域勘探石油资源，两国间还成立了中美联合科技委员会和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两国学者、科学家的互访也有增加。

1979 年 9 月 17—22 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第三次访华。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也相继访华。两国地方政府间的联系发展迅速。

中美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的 consistency，自然需要在双边军事关系上采取相应的步骤。但是卡特政府仍不愿对中国出售武器。

旧金山市与上海市建立姐妹城市关系也是建交后两国间的一件大事。1979 年 1 月 24 日，在美国华盛顿的一次宴会上，我与旧金山市市长黛安·法因斯坦女士探讨了旧金山市与上海市建立姐妹城市关系的可能性，并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彭冲取得了联系。

3月5日，法因斯坦市长致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彭冲，正式提出两市结为姐妹城市的建议。信中说，“鉴于两个城市在许多方面相似，都是世界著名海港、工业城市和文化、教育中心，因此提议为旧金山和上海之间建立姐妹城市关系而努力”，“希望这两个著名城市和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更为紧密的关系”。她还表示希望亲自率团访华。

6月中旬，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联名邀请，法因斯坦市长第一次率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为期十天。法因斯坦说，这是当时由美国市长率领的最大的一个访华贸易代表团。

6月10日，法因斯坦市长与赵行志副主任就两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进行了会谈，并商谈了建立友好城市协议书的基本内容。代表团还与上海港务局讨论了建立友好港事宜，与上海远洋公司商谈了航运合作问题，与上海中国民用航空公司探讨了旧金山与上海通航等事宜。在即将结束对上海的访问时，法因斯坦市长送给上海市政府一把旧金山市的钥匙，送给赵行志一节旧金山大桥上的钢索。她说，这把钥匙象征着上海可以打开旧金山的大门，她祝愿旧金山和上海两市人民的友谊像坚固的钢索一样联结在一起。

7月9日，中央正式批准上海与旧金山结为友好城市。

8月16日，彭冲主任函告法因斯坦市长，上海市愿和旧金山市结为友好城市，并拟派一个由上海市领导人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访问旧金山，正式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法因斯坦市长复函欢迎上海市代表团访问旧金山。

1980年1月，上海市副市长赵行志率上海市代表团一行八人访问旧金山。1月28日，在旧金山市政府举行旧金山与上海结为友好城市协议书的签字仪式，法因斯坦和赵行志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书宣布：“按照中美建交公报规定的原则，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接近，加强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和美利坚合众国旧金山市正式结为友好城市。通过两市间的往

来，为中美关系的不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上海与旧金山结为友好城市意义重大，因为那是中美两国间第一对友好城市。

中美关系的复杂多变

建交后的中美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度过了邓小平访美这段高潮期后，许多复杂的问题（有些还很棘手）显现了出来，一场场严峻的考验摆在柴泽民的面前……

他见证了那一段中美关系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一个人——周文重，他当时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1978—1983 年，在我国驻美联络处和驻美国大使馆任大使翻译。我在美国的工作情况，他知道得最多。

周文重 1968 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1970 年夏，被分配至外交部，先是在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了三年。周文重扮演的“角色”只是“中秘”（中文秘书、翻译），但仍为他日后的外交事业打下了最初的基石。然后又是三年留英学习。回到国内的周文重在翻译室开始了他的正式外交生涯。三年后的 1978 年他第一次常驻华盛顿。五年中，他一直在我

的身边，他说，这是他翻译生涯中最值得回忆的，他见证了中美关系的转折——从联络处到大使馆。

后来，周文重又从东部的华盛顿到西岸的旧金山、洛杉矶总领事馆工作，在从1970年至2005年的三十五年外交生涯里，有三分之一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前后四度常驻美利坚，从初出茅庐的“一介书生”，到纵横捭阖、独当一面的资深外交家；从外交场上毫不起眼的小“随员”，到2005年3月任中国驻美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大洋彼岸那些年的难忘岁月里，周文重见证了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

就在我向卡特总统递交国书的十二天后，3月13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却分别通过了多处违反中美建交协议的关于美台关系的立法议案。4月10日，卡特总统签署众参两院分别于3月28日、29日通过的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与台湾关系法》，公然把台湾作为政治实体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这种“一中一台”的做法给两国关系埋下了祸根。

此后，台湾问题一直是引发中美关系种种矛盾的导火线。时至今日，《与台湾关系法》还是美国售台武器的一个挡箭牌。为了这个问题，我在任期内曾向卡特、里根两届政府进行了数十次交涉，周文重皆随同前往，内中的艰苦斗争、酸甜苦辣，他最清楚！下面我讲到的那些情况，为了叙述的准确，引用周文重同志发表了的文章内容。

中国反对《与台湾关系法》的斗争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历史的必然，是两国关系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但最后的谈判确实又相当的艰巨。卡特政府既瞒着国会，更对盟国和台湾当局保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瞒着国务院。除了直接进行谈判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副主任芮效俭，只有总统、布热津斯基、奥克森伯格等少数几个人，知

道谈判最后几天的进展情况，知道中美双方将于何时宣布建交的消息。

1978年12月15日，在中美建交的消息公布之前数小时，白宫和国务院才忙着向有关方面打招呼。

对卡特政府来说，有一件难事，就是与国会之间的关系。本来，要与一个国家建交或断交是行政当局权力范围之内的事。中美关系正常化不必经国会批准。但在此问题上，有三件事，必须获得国会通过。

第一，美国驻外大使必须经参议院听证确认。1979年2月，美国参院开始讨论卡特总统对伍德科克任驻华大使的任命。与伍德科克被任命为联络处主任时的气氛大不相同，现在伍德科克已成了公认的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代表，反对者自然将矛头集中地指向他了。

第二，美国政府将调整法律与规定，以便在没有政府代表和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与台湾的商务、文化及其他非政府关系。但是，行政当局将要提出的新的法律和将要成立的机构必须经国会认可。

第三，中美建交后，自然会达成一系列的条约和协定，用来推进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其他双边关系，尤其是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每年都须经国会审议，这就给了国会就对华关系发表意见，甚至作出决定的机会。这些都给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美外交关系制造了很多复杂的难题。

那时我们心理上有准备，中国“同美国开展的一场斗争，要准备中美关系倒退到1973年（中国在美国设联络处）的水平”。通过两年的斗争，1981年1月11日，邓小平明确论断：中方的强硬态度，源于中美关系的最大“倒退危险”的台湾问题，是1979年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由美众、参两院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由于其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原则、干涉了中国的内政，成为埋在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一颗“定时炸弹”。

在卡特政府提交《台湾授权法案》后，美国国会在审议该法案和炮制《与台湾关系法》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违反中美建交原则和干涉中国内政的

决议案和修正案。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严重关注和强烈反对。

1979年3月3日，我奉我国政府之命，约见了美国国务卿万斯，向他转达了中国方面的口信：美国政府和国会制定什么法律是美国的内政，中国不予干涉，但是，此次美国国会的立法内容却是涉及台湾问题，中国方面对此“理所当然地表示关注”。中国政府认为：美台未来关系的安排应该根据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来处理，不允许单方面违反或破坏这些原则。任何旨在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关系带有某种官方性质以及变相地保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立法条款，都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同意的。我告诉万斯：中方已经注意到卡特政府作出了表示，即，“不能接受同美国已向中国作出的保证相抵触的任何决议或修正案”，中国希望美国真正做到这一点。万斯表示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将设法影响国会的立法过程，但他又说政府对此“不能控制”。

当美国参众两院于3月13日通过关于美台关系的立法议案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于3月16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就立法议案多处违反中美建交协议，申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黄华最后强调表示：“美国政府有责任运用自己的影响和职权，确保在处理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上不出现任何违反两国建交协议的事情。”

但美国国会还是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并于4月10日经卡特总统签署生效。卡特在签署《与台湾关系法》时，竟然说“该法与我们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系正常化时达成的谅解是一致的。它反映了我们承认该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国政府的这一解释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以美国对台军售为例：众所周知，台湾当局获得武器是为了同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相对抗。既然美国已经承认中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时，台湾又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美国出售军火支持地方当局反对该国的中央政府，这就是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行径。为此，中国政府对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生效感到愤慨。

4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时表示：“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有一个政治基础，这就是“一个中国”。

4月28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抗议照会，阐明中方立场。照会着重指出：“《与台湾关系法》实质上是蓄意继续把台湾当作‘国家’，把台湾当局当作‘政府’，它的许多条款都违反了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照会表示：“中美建交协议，是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准则。中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如果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不遵守两国建交协议，而怀有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这只会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会带来好处。”

美国驻华使馆于7月6日给中国外交部发来复照。复照称：美国已经认真考虑了中国4月28日的照会。美国“将遵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各项谅解”。照会为美台关系法“引起中国政府的关切”表示“遗憾”，并解释说该法的宗旨只是通过“调整”美国的“法律”，“以容许维持同台湾人民的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方照会表示：“美台关系法为总统提供了充分的酌情处理的权力，使总统得以完全按照符合正常化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总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签署了该法案，使之成为法律的。美国政府一直努力确保该法的措辞不损害我们同贵国政府达成的谅解，或迫使我国政府采取背离这种谅解的行动”云云。

就这样，卡特政府一方面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又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同台湾当局建立起了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本法律依据的“实质性”关系。这种做法从实质上讲，仍未跳出“一中一台”的模式。此后，中美关系虽不断发展，但两国关系当中始终存在着台湾问题这个消极因素。而且，由于《与台湾关系法》的掣肘，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台湾非法转移外交财产案

中美建交之后，有一桩令人很不愉快的案件，就是台湾当局非法转移外交财产案。该案的交涉处理就在从中美宣布建交到正式建交之间的十五天里。被非法转移的外交财产包括原台湾“大使馆”、“武官处”和双橡园“官邸”，而根据有关国际法的规定，美国政府有责任将它们悉数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在卡特政府向台湾方面通知中美建交的决定后，台湾“大使馆”竟用1美元的价格把价值900多万美元的双橡园“官邸”卖给了一个叫做“自由中国之友”的组织。与其说这是台湾当局所为，不如说是他们和美国部分亲台议员共谋的结果。当然，买主必须是“自己人”。事实上，这起事件的策划者、亚利桑那州的资深参议员高德华就是这个组织的主席之一。

我和韩叙很清楚这桩案子的棘手程度，因为中美之间有关此事的交涉早在财产转移生效的第五天就开始了。前期的谈判是在韩叙和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之间进行的。但是四五轮谈判交涉下来毫无进展。霍尔布鲁克只是反复表示“美国政府并不反对将财产归还给中国，但这要通过有关的法律程序才能解决，而在一个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里，政府是无权干预这一过程的”之类。不难看出，在同中国签署了建交协议之后，白宫和美国国务院更关心的是如何抚慰一下台湾这个昔日的“盟友”，和国会中那些愤愤不平的议员们。韩叙曾把整个事件愤怒地比喻为美国和台湾在桌子底下搞的不光彩的“小动作”。

事实上，中美宣布建交之后，台湾问题正在演化为美国国内政坛上的一场激烈交锋。连卡特本人也没有料到，他真的会成为以高德华为首的二十四位参议员发起的一场“弹劾”运动的靶子。1978年12月23日，“弹劾”总统的起

诉书几乎是在外交财产转移案发生的同时被递交到华盛顿地方法院的。美国的各大媒体更是推波助澜，将此事搞得尽人皆知，尽管卡特最终挽回了局面，但整个事件毕竟极大地动摇了他的政治地位，而当他后来试图通过一些“补救”措施缓解亲台势力对他的围攻时，却又不免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倒退。

苏格在他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这样写道：

如果说，“外交财产转移案”和“弹劾总统案”让人们强烈地意识到台湾问题仍将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的话，那么它们本身不过是正在被掀开的大幕的一角，而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则将刚刚建立起来的相当脆弱的中美关系置于一场严峻的考验面前。

当有关《与台湾关系法》的交涉暂告一个段落之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处理外交财产转移案。我亲自到美国国务院会见万斯国务卿，要求美国政府必须按国际惯例，将台湾“大使馆”财产转交给中国大使馆，各个国家都是这样做的，美国也不能例外。万斯答复得很痛快，说我们当然要按国际惯例办事，不过我们要经过律师研究后再答复你。三天后律师给我打来电话说，经了解，台湾“使馆”的财产已卖给“自由中国之友”，你们只能通过法律手续去解决。我非常生气，说，这是你们的事，只能由你们去解决。以后多次通过国务院、白宫，都是这样推托。我们只能在当地找了一位名叫萨里的律师，委托他就通过法院起诉的可能性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为这个方案不可行，除非美国法院裁定，《与台湾关系法》中有关保护台湾当局在美财产的条款违反了美国宪法。否则，胜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件事后来由外交部美大司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即将外交财产转移案和1949年被我冻结的美国在华财产联系到一起考虑，或者说用被台湾当局非法转移的外交财产来抵消被中国冻结的美国在华财产。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批准。外交部美大司开始就该设想的可行性问题展开深入调查。与此同时，

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接到了一份由我国外交部递交的措辞严厉的抗议照会。照会指出：美国容忍台湾当局非法转移外交财产，是对中国主权与合法权益的侵犯。只要这笔财产一天不归还中国，美国政府就难辞其咎，中国政府将保留向美国政府索赔的权利。

在实际上很难收回台湾在美外交财产的情况下，这的确不失为一个明智的解决方案。中美双方后来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彼此冻结的公共财产的归还问题，至于私人财产的归还问题则是依据双方在 1979 年 3 月份达成的有关协议解决的。

刚刚起步的中美关系中一个不小的摩擦就这样被化解了，不仅如此，这一问题的解决还为双方后来正式签署解决资产问题协议以及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排除了一大障碍，这是一个额外的收获。（资料来源：王立《波澜起伏——中美关系演变的曲折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

关于同中国建立安全关系的问题，美国最高决策层的意见并不十分一致。中美建交之后，卡特就亲自授权布热津斯基同中国探讨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万斯、布朗和布热津斯基为此在每周一次的午餐碰头会上专门进行磋商。美国决策层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掌握向中国出口技术的“界限”，因为一些技术是可以转用于军事目的的。而且中国也在探讨向美国的欧洲盟国获得某些武器。万斯和国务院的意见是倾向于劝阻欧洲对华的武器出售，而布朗和布热津斯基的态度是“善意的中立”，也就是默认西欧对华的技术转让和武器出售。

中美开始探讨军事合作的可能

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和对美国的强硬政策，促进了美国对中国的接近。苏联一方面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向美国施压，一方面又加紧干涉阿富汗。美国感到其在波斯湾、南也门和伊朗的势力都处于危机的境地。为了扭

转这种被动局面，卡特同意逐步扩大美中在安全方面的合作。

1979年5月，我作为大使，与卡特多次进行了旨在加强双边安全关系的会谈。美国试图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作为向苏联施加压力的战略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为此，卡特直言不讳地声称，“让苏联人想象美中之间已经初步建立了军事关系，这倒也不坏。”

当年6月，布热津斯基建议美国军舰访问中国港口，作为对苏联军舰进驻越南岬港的回答。

8月，副总统蒙代尔访华。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表示：“一个强大、安全和日益现代化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表示：“任何国家如果想要在国际事务中削弱或孤立你们，它的这种立场就同美国的利益相对立。”

关于美国国防部长布朗是否访华的问题，美国决策层内部一开始曾有分歧。国务卿万斯认为，美国应该在中国和苏联之间“不偏不倚”地寻求“平衡”，而不是偏袒任何一方。他主张布朗的访问应该推迟。但苏联1979年12月对阿富汗的入侵，使主张布朗访华的意见占了上风，促使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于1980年1月5日至13日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国防部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和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对美国也进行了访问。此外，中美军方还开始了多种合作项目，包括医疗、后勤、军事院校的校际交流等。随着双方武官在驻对方使馆的设立和就任，两国的军事交流逐步增多了。

有关布朗访华的建议，最初是由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1979年8月访问北京时向中方提出的。然而直到美苏之间在第三世界一些热点地区的争斗日益白热化之后，有关这次访华的各项准备工作才明显加快了步伐。

在我将此情况报回国内后，从11月起，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就开始和军方共同制订布朗访华的接待方案。这个方案充分体现出中方对发展双边军事关系

所抱有的极大兴趣，因为这种关系不仅具有对苏联的战略威慑作用，而且还包含着另一种可能性，即打开购买美国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的渠道，从而逐步实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

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于1980年1月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作为第一位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受到破格的接待。他乘坐的专机不仅被允许在中国的领空内飞行，而且中方还向他开放了一些从不对外开放的军事设施。

这些特殊的安排为双方之间的会谈创造了极好的氛围，而且会谈的结果也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令人满意。布朗和邓小平以及包括国防部长耿飚在内的其他军方人士深入讨论了双边军事合作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中国很感兴趣的某些高技术武器项目方面，展开合作的可能性以及有关的技术转让问题。

此外，布朗还向耿飚发出了访美的邀请。

布朗访华之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威廉·佩里也应邀访华。

中国军事代表团对美国的访问

1980年4月，以刘华清副总参谋长为首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很快访美。美国商务部重新作了规定，扩大了可对中国出口的商品范围，特别是允许中国购买运输机、远程通信装备和军用直升机之类的“敏感装备”。

1980年5月，作为对布朗访华的回访，国防部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访问美国。我作为驻美大使为此精心作了周密安排，并在大使馆举行了大型招待会，有几百名美国军政要人出席。

美国方面似乎要用更加破格的做法回报中方给予布朗的礼遇，他们打算安排耿飚参观一些只对美国的西方盟友开放的高度机密的军事设施。这样的安排无疑会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苏联对中美军事合作进展程度的各种猜测和想象，而这恰恰是美方试图通过这次访问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之一。同时，美国也希

望此行能使中方对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军事技术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使自己在中美政治关系中据有更多的筹码。即使从中方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方案。

由耿飚率领的访美代表团抵达美国后，作为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韩叙将参与起草耿飚此行中的一些重要讲话以及为有关的会谈做准备。当代表团乘坐的美国空军 C-9 型专机降落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机场时，等候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布朗本人。代表团的成员被安排在博林空军基地下榻。当晚，布朗夫妇在这个基地的军官俱乐部里热情地为耿飚一行接风洗尘。

在五角大楼，为一位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国防部长举行欢迎仪式，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大楼里的工作人员都好奇地观察，这位中国国防部长到底是什么模样。

在接下去的两天里，耿飚分别同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以及总统本人举行了会谈。

布热津斯基小的办公室令人感到拥挤。耿飚着重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以及发展中美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意义。布热津斯基向客人介绍自己的办公室，说：白宫中任何一间办公室的重要程度，要由它们和总统办公室之间的距离来决定，而他的办公室就是离得最近的。

修建在科罗拉多州一座被挖空了的山体中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同时负责保障美国本土和加拿大的空中安全，它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司令部的最高指挥官陪同耿飚一行参观了这个基地的心脏部位——中心指挥室。这里安装着令美国人颇感自豪的监测系统，该系统能够保证美国在任何一枚导弹发射的瞬间就发现它们，不论它们位于世界上的哪个角落。

令美国人感到自豪的最新一代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停泊在圣迭戈海军基地的“突击者”号也是第一次迎来了它的中国客人。身着便服的耿飚受到了全体官兵的列队欢迎，飞行员们还为客人准备了一场高难度的战斗机群返航

表演。

中国代表团此行中的最后一项日程是参观位于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美国设在海外的最大的军事指挥机构。四星衔的海军上将特地安排耿飚住进了他的私人宅邸。在参观著名的珍珠港时，宾主还回忆起了中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关系，这似乎是在暗示这种关系在今天依然存在，而夏威夷总部和苏联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太平洋总部之间距离并不遥远。有的评论认为，这种暗示是耐人寻味的。

耿飚的这次访美，十分引人注目，使整个世界都看到了，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美新关系正在给双方带来怎样的战略利益，以至于有人在形容这种新关系时用了“蜜月”一词。

美国放宽对华出口限制

美国同中国战略安全关系加强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放宽对华的出口限制。而美国对新中国禁运和封锁政策要追溯到美国推行“冷战”政策之时。美国同其西方盟国早在1948年就成立了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此后美国又于1949年制定了限制军事用途的产品及技术进入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管制法》。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将各国按与美国的关系程度划分为七个组别。其中“Z”组包括古巴、柬埔寨、朝鲜和越南；“S”组包括利比亚；“Y”组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老挝、蒙古和苏联；“W”组包括匈牙利和波兰；“Q”组包括罗马尼亚；“T”组涵盖除加拿大和古巴以外的所有美洲国家；“V”组所指代的是除加拿大之外的其他不在上列的国家。朝鲜战争中美交战之后，美国将中国列入限制最严的“Z”组。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政府作出了部分解除对华贸易禁运的决定，实际上是指将中国重新划入“Y”组。也就是说，凡是美国可以向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等华约集

团国家出口的物资，均可以对华出口。

随着建交后中美战略安全关系的发展，“Y”组的安排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务必加以改变。布朗访华回国后不久，1980年3月美国国务院就公布了《第81号军品控制简讯》，放宽了对华出口的限制。根据新条例，由军火管制局核发许可证可通过“个案处理”的方式，向中国出口三十余种后勤装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对流层通信设备、直升运输机、牵引车、电子干扰装置等。然而，此时中国还是被美国放置在与苏联相同的“Y”组。中方领导人邓小平在同美国人士的交谈中，对此种歧视的做法表示了不满。邓小平向美方提出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建议，这就是从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中另给中国选一个类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科技部主任本·休伯曼就此请示了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亲自向白宫提出，并获得卡特总统首肯。虽然该行动在具体落实时遇到万斯的掣肘，但在布热津斯基的坚持之下，万斯无奈地执行了卡特总统的指示。4月，美国商务部给中国单独开辟了一个“P”组。这样中国就可以“合法”地从美国获得非杀伤性的军事装备。美国对华军售和技术转让政策就不再是一味地在苏联和中国之间追求所谓的“平衡”，而是出现了对中国的政策“倾斜”。

中美经贸关系进展异常曲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所经历的是一条异常曲折的发展道路。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是其推行政治目标的一个辅助手段。早在朝鲜战争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50年12月17日决定根据美国国会在1917年通过的《与敌国贸易法》，对中国和朝鲜实施贸易禁运。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华执行的是“遏制”和封锁的政策。60年代初，美国政府曾经设想过利用向遭受自然灾害的中国提供美国农产品，以达到影响中国政治的目的，但是中国方面对此不屑一顾，美国的一厢情愿也就不了了之。

经贸谈判极其艰巨

1971年，尼克松解除了已执行二十年的对华贸易禁运政策。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之后，中美贸易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71年中美贸易额仅有

490 万美元，到 1974 年增长至 9.34 亿美元，增长幅度达十八倍。从 1975 年到 1977 年，中美贸易略为下降，其中的原因有多种，包括中国减少了从美国进口小麦的数额。但从 1978 年开始，中美贸易便开始了大幅度的发展。1978 年的双边贸易额较前一年增加一倍，突破 10 亿美元的大关。

随着中美经贸额的增加，两国贸易需要建立一个能确保其正常发展的法律框架。为此，中美双方代表围绕着以下问题进行了极其艰巨的谈判。

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中美相互的财产要求，特别是被冻结的对方资产的问题。因为此问题如果不妥善解决，任何一方到达对方辖区的任何财产，如支票、汇款，以及车、船、飞机及其所载货物，均有可能应另一方财产索赔者的要求，根据当地法院的法令予以扣压。中美之间的资产冻结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根据美国“在外遗留资产清算委员会”1966 年的调查和统计，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实行的国有化而对美国公民私人财产构成损失的索赔共计三百八十四例，合计金额 1.969 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被美国政府扣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在 1970 年 6 月的价值为 7650 万美元。中国政府处理外国在华遗留资产是有其原则的。如：关于中国历届旧政府为维持其反动统治或镇压人民革命而举借的外债，新中国政府概不承担偿还义务；土地为国家或集体所有，不存在补偿问题；中国政府亦不负担赔偿外国教会捐献的财产和外国人要求赔偿养老金等项目。但是，对确经新中国政府处理的外国在华私人财产，可以考虑予以适当补偿。

早在 1973 年基辛格访华时，就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提及中美资产问题。但此问题一直等到中美建交后的 1979 年 5 月，双方才由中国财政部长张劲夫和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通过政府协议得以解决。该协议对中美双方的财产要求作了如下规定：

（甲）美国及其国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对中国的资产要求。这些资产

要求产生于 1949 年或其后到本协议签订之日以前对美国国民的财产实行国有化、征收、干预和其他占有或特别措施。

（乙）对美国及其国民和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自然人或法人对美国的资产要求。这些资产要求产生于美国政府在 1950 年 12 月 27 日或其后直到本协议签订日以前所采取的有关冻结资产的行动。根据中美协议，中国政府向美国支付八千零五十万美元，作为对美国及其国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对中国资产要求的完全和最后的解决。协议还规定，本协议签署生效之后，中美两国政府均不再代表自己或他人向对方政府提出本协议范围内的任何资产要求。

中美之间达成的第二项重要协议是《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由于中美两国社会制度的差异，发展双边贸易的考虑和所遇到的问题是不同的。中国政府当时的政策是积极促进同美国的经贸关系，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美国对华技术转让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并行不悖的。相比之下，美国在发展对华贸易问题上，所受到的政治干扰就相对更多一层。美国当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主要是受到《1974 年贸易法》的制约。如该法第 405 节规定，任何双边贸易协定必须包括“旨在保护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多项复杂而冗长的条款：

首先，该双边贸易协定必须确定现行的和未来的贸易是否会引起现有市场秩序的混乱，并必须包括双方能够迅速磋商的途径；

第二，该贸易协定必须包含对工业产权、商标权、专利权和版权等项权利的保护措施；

第三，该贸易协定还须明确规定双方如何解决争端的途径和监督协定的执行的具体办法。该法还规定每个协定的有效期不得超过三年，而延长期也不得超过三年，等等。

此外，美国《1974 年贸易法》还有一项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条款，这就是该法的第 402 节（a）款中关于给“最惠国待遇”附加政治条件的规定。按照此规定，美国可以给非市场经济的国家以最惠国待遇，但是这类国家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包括：不剥夺本国公民移居国外的权利；不对移居外国者或有移民愿望的公民征收过高的税收，等等。

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的谈判，从一开始双方分歧就甚大。中国方面希望达成一项原则协议来指导双边贸易。而美国方面则坚持根据其国内法的框架，建立起包括保护知识产权条款细则的内容繁琐的美中贸易法则。

美国决策层在作出此项重要决定中受到苏联因素的直接影响。美国国务院的意图是不想让中国先于苏联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认为在最惠国待遇方面应该对中苏“一碗水端平”，就是把中苏的最优惠贸易国待遇都采用“限制与共产党国家发展贸易关系”的条款加以限定。布热津斯基和布朗并不反对对等政策或平衡政策，但认为，与苏联相比中国相对较弱，而中国对美国在某些方面的帮助却不小，如果机械地采取“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实际上是对较强者有利的政策。因此这种平衡政策要把中苏两国之间的差距计算在内。

1979 年 3 月，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正处于微妙阶段，卡特政府决定结束这种平衡政策，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而不等待苏美关系的发展。5 月 14 日，在商务部长克雷普斯访华期间，两国草签了贸易关系协定。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建立在非歧视性的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并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7 月 7 日，外贸部长李强和美国大使伍德科克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将在关税和手续税费方面互享最惠国待遇，向对方的贸易公司和商号等商贸组织提供最惠国待遇，相互对等地保护专利、商标和版权，允许建立在本国内的对方金融机构，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

开展业务等等。

这一贸易协定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无疑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协定必须经美国国会批准才能生效。何时提交国会，仍然有个时机的选择问题。美国务院中的苏联问题专家主张，在美苏关系稳定下来、走上正轨之前，暂缓向国会提交《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以免美苏中三角关系失调。而美国政府中另一些官员提出，把中苏两国的最惠国待遇捆在一起，简直就是以苏联的固执来惩罚中国。

最后，卡特支持了蒙代尔和布热津斯基等的主张，在诸如出口控制、进出口银行贷款、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双边关系的问题上，把中苏两国清楚地分开。在7月27日的总统早餐会上，卡特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一俟参议院中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问题有所进展，就向国会提出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这是卡特第一次表示要把中苏两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开。

10月23日，卡特总统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和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公告正式提交国会。卡特总统在致参众两院领袖的信中说：“这个协定的缔结是我们为使两国关系、为两国提供更大经济利益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它也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11月15日，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国际贸易小组作证时说：“仅仅外交承认不会自动保证正常和互利关系的发展”，通过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通过这个贸易协定，将能排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并为贸易创造刺激，这对巩固两国之间的纽带将发挥巨大的作用。1980年1月24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74票对8票和294票对88票通过了这个协定。1980年2月1日，中美两国在北京互换照会，两国贸易关系协定开始生效。

2月14日，在纽约的一次中美贸易关系研讨会上，谈到美国在华投资问题时，我引用谷牧副总理的话说：“我国将充分保证美国合营者的合法权益，他们在我国投资所得的收益，将不会低于在其他国家投资的收益，

我们还将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他们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得到充分的发挥。”再一次表明了我们发展中美经贸和中国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决心和信心。

7月31日，美参众两院批准私人投资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计划。8月8日，卡特签署了上述法案和一项总统决定，认为海外投资公司的上述计划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1980年2月1日《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生效后，中美双方给予对方的最惠国待遇给双边经贸关系注入了巨大的推动力。按照中方统计，在中美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后的八年（1980—1987年）内，两国贸易额累计达458亿美元，是双方获得最惠国待遇之前八年（1972—1979年）的8.7倍。由于中美两国分别按照一次性结汇和按商品的原产地进行贸易额的统计，双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有时不尽相同。但双方的数字均显示1980年中美贸易额比1979年增加了一倍。

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增加，推动了中美双方金融关系的发展。80年代初，中美经谈判妥善解决了长达二十年的冻结资产问题。1981年10月，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率先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第二年，美国大通银行在北京办事处开业。

在《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的谈判过程中，中国对美出口纺织品的问题是最大的难题之一。美国的纺织业从60年代就已经出现萎缩，韩国、新加坡等国和台湾地区的纺织品已经大量涌入美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就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对进口中国纺织品的数量加以限制。然而，中国的情况是中美贸易逆差严重，按1980年的数字，中国进口额为38.3亿美元，而出口仅有9.8亿美元。由于中国能够对美出口的商品有限，纺织品在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方对过于苛刻的限制自然不能同意。就这样，中美关于纺织品的谈判在《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生效之时仍未

完结。最后，在中美双方均作出让步的情况下，中美关于纺织品的协定终于在1980年9月17日得以签署。中国同意了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的“配额”，美方同意在原定的额度上平均增加40%。

与中美纺织品协定同时签署的还有中美民航协定、海运协定和领事条约。纺织品协定的签署，为中国纺织品有序地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法律框架；民航协定使中美两国得以建立直航班机航线；海运协定使两国港口互向对方开放；领事条约为双方公民办理签证和维护在对方国土上本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依据。

科技、教育、文化关系获得突破

中美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关系，是对双方均有利的东西。早在70年代初期，美国方面就曾向中方提出进行双边科技和教育交流。可是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美国连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正式“承认”，中方认为要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大规模的科技和教育交流是不现实的。

中美教育和科技交流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在1978年7月。当时卡特总统的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率团访华，邓小平对普雷斯一行给予热情接待，美方的评论是：这是“自1949年以来美国所有代表团所未得到过的”。普雷斯在同中国科委主任方毅会谈中提出中方可考虑派遣五十名中国留学生时，方毅将此名单扩大到五百名。此后，中美双方的工作人员就开始了具体的运作。到了10月份，双方达成了关于教育交流的谅解备忘录。以后，该备忘录的内容，成为《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后，两国科技、教育和文化关系得以蓬勃发展。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与卡特总统签署了《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有效期

五年。1984年1月，中国总理访美，双方续签了协定，协定又延长五年。在十年里，中美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技术、科技情报、高能物理、计量、工业科技管理、大气、海洋、卫生、地学、地震、水电、环境保护、基础科学、建筑和城市规划、地表水、核安全、核物理、磁约束核聚变、航空、交通运输、化石能、测绘、电信、铁路、自然保护和空间技术等二十七个领域达成政府间对口部门的协议或谅解，商定的合作项目数量达五百多个。此外，在中美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发展的推动和鼓励下，两国地方间、院校间和其他民间机构之间，也开展了广泛的多种合作关系。

中美教育交流和合作项目发展极为迅速。1979年，按美方统计，到美国从事教育交流的人员有一千三百三十名。到1980年，美国批准的教育项目的签证达四千三百二十四件。到1983年，按教育交流项目访问过美国的中国人民超过一万九千人次。按中方的统计，从1978年到1991年上半年，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的总数已逾七万人，其中公费四万余人，自费人员三万余人。中国已

柴泽民
大使（中）
在亚特兰大
“南部地区
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
演讲（1982
年）。



经成为向美国派出留学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到中国任教和学习的人数也不断增加，1979—1988年，约有七千名美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美国学生多数来华学习汉语，少数从事社科研究或学习。自1979年中美文化协定签订以来，两国还在文学、艺术、新闻、广播、电影、图书、出版、文物、档案、体育、社会科学、园林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此外，中美新闻交流也增加了双方的了解机会和渠道。1979年，中美双方互派记者，新华社在华盛顿设了分社，《人民日报》设了记者站。1980年美国十三家新闻媒体各有一名记者驻京。新闻媒体成了双方了解对方的窗口。正如一位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访美归来后写道：“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反过来，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又是一个古怪的国家。但是，只要接触一些，美国人将会发现中国并不神秘；我们也会发现，美国人也并不古怪。我们两国人民是可以彼此了解的。”

总之，中美科技、教育、文化、新闻的交流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以“量化”的，但它确实是十分重要的。

柴大使从1978年到1982年在美国任大使期间，是中美两国关系从阴云密布到雨过天晴的时期。两国的领导人实现了多起互访，逐步进入了全面合作时期。

1982年1月19日，中美代表又互换领事条约批准书。正是根据这一条约，中国在旧金山、休斯顿、纽约和芝加哥建立了总领馆，美国也在上海、广州、沈阳和成都建立了总领馆。中美总领馆的建立，是和柴泽民大使领导的使馆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的。中国驻美各总领馆都举行了开馆仪式，柴大使都亲自到会祝贺，并举行招待会。

同年2月26日，中美互庆《上海公报》发表十周年，柴泽民大使向美方递交了我国领导人致美国领导人的贺信，里根表示：“美国将致力于加深中美关系，为双方的长期友谊建立更坚实的战略基础。”

民间大使陈香梅

陈香梅，1925年6月23日生于北京，祖籍广东。她原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抗战时在采访中结识了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总指挥陈纳德将军，两人相恋，结为伉俪，生有两个女儿。蒋介石亲自为她的两个女儿取名“美华”、“美丽”。1975年，蒋介石去世，陈香梅作为美国总统的代表，赴台参加葬礼。她在美国国会中有许多朋友，所以台湾当局利用她在美国做“院外活动”，进行游说。中美建交后，使馆苦于无人做美国国会工作，感到很被动，只有台湾当局有人在那里“捣鼓”，国会听不到大陆方面的声音。当时我想到了陈香梅，她是中国人，总应该晓得：美国都同中国建交了，台湾在那里的局面还能持续多久？中国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对陈香梅大有工作可做。就是争取不过来，只要做个中间派，不在国会反对我们也是成功。于是就在华人中物色与陈香梅交好的朋友作媒介，与她交谈，试探着前进。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找到一位在波士顿的李教授向陈致意。

陈表示很愿意与中国大使会晤，并提出可否不在中国驻美大使馆，而在她家中。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定在旅居美国的黄埔军人蔡文治将军家中见面。

1980年5月的一天，我俩见面了。陈香梅开始时不免有些紧张，因为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握手，第一次与中国外交官正面接触。随着谈话的深入，我们之间的隔阂逐步消失。

蔡文治将军款待我们两位特殊客人的晚宴是中国火锅。炭火炽红，鲜汤沸腾，大家边吃边谈，越谈越投机。陈香梅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在她的眼中，我大概从西装革履的中国大使又变成一身戎装的八路军指挥员，大家身处同一战线，正在商讨如何抵抗日寇……

我告诉陈香梅：“咱们国家过去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凌辱，现在中国人民

站起来了，但台湾问题尚未解决，祖国至今不能统一。咱们都是炎黄子孙，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分裂下去。”陈香梅表示赞同，说：“中国人的事，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不能依靠外国人。更不能依靠美国。”我一听这话，感到很高兴。接着，我邀请她回大陆看一看，并说：“现在的大陆与过去大不一样了。”陈香梅高兴地说：“要回去！要回大陆去看看，不过要等里根竞选总统后才能成行。”

1980年12月初的一天，陈香梅突然打来电话，说她准备到中国去，与她一路同行的还有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西奥多·史蒂文斯。我说，好啊，去中国的一切手续我给你办。

在一个雪花飘扬的日子，我邀请陈香梅和参议员史蒂文斯到使馆吃饭，为他们饯行。当场敲定：陈香梅和史蒂文斯12月30日到达北京。

陈香梅终于踏上了阔别多年的故土。她的舅舅廖承志热情地会见了她，对她做了很多工作，鼓励她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她感慨万千地说：我又寻到了我的根，我不再是浮萍了。

12月30日陈香梅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就会见了她，陈香梅将当选总统里根的一封亲笔信当面交给他，彼此进行了坦诚而亲切的交谈。1981年元旦，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设宴欢迎陈香梅一行。在排座次时，陈香梅坐在第一贵宾的位置。邓小平说：“陈香梅坐第一，参议员史蒂文斯先生坐第二。因为参议员嘛，美国有一百来个；而陈香梅嘛，不要说美国，就是全世界也只有一个。”邓小平会见陈香梅的消息，海内外各大报均在头版重要位置作了报道，影响很大。

从此以后，陈香梅频频来往于海峡两岸，每次来往都路过台湾，直至蒋经国去世。

1989年冬，陈香梅亲任团长，率领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组织的、有众多台湾经贸界人士参加的工商经贸考察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他们下榻钓鱼台国宾

柴泽民
在北京与陈
香梅亲切会
见（1995
年）。



馆，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0年，陈香梅趁热打铁，又一次组织台湾工商考察团到大陆访问。从此以后，陈香梅多次来中国，每次都与我会面，老朋友重逢，自然是欣喜万分，有说不完的话题。陈香梅曾对人说，“是柴大使鼓励我来的，我不能忘记柴大使。”她还写了这样一首诗：“四十年来家国，万千里路山河。惆怅两岸书剑，何日期许共和！”（资料来源：林卫国、薛麦喜《柴泽民“结缘”陈香梅》，载《中华儿女》2002年第4期）

友谊之情 感人之行

美中基金会医疗顾问尤金·格里斯博士是北卡罗来纳大学临床眼科教授，他与美中基金会总顾问柴泽民大使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们早在美国就已相识。1979年中美建交后，柴泽民出任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次年，即1980年秋，柴大使应当时任雄狮国际俱乐部主任的尤金·格里

斯博士的邀请到其家中作客，由于这段友谊的渊源，尤金·格里斯博士来到中国考察、交流与访问。此后二十余年来，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冬去春来，光阴荏苒。转眼二十多年过去，我早已卸甲归田，但是还担任一些民间职务，比如“美中基金会总顾问”这样的。因为长期工作劳累患了眼部疾病，尤其是右眼病变严重。当年陪同我去北卡罗来纳的英文翻译小周——周文重，现在已经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尤金·格里斯大概对我那年去北卡的事一直念念不忘，得知此消息后，作为美中基金会医疗顾问，已七十七岁的他于2004年12月17日晚不顾严寒，专程从沈阳乘夜车赶往北京。第二天一下火车，立即赶往北京同仁医院为我详细检查眼睛。格里斯是美国著名眼科医生，兼任美国青光眼协会主席。一生的学习与实践，使他医术高超，言语与动作之间，处处显示其极为干练精湛，根本看不出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经过极其仔细的反复检查与测试，格里斯医生诊断认为：二十年前我的右眼因视网膜脱落在美国做过手术，现在这只眼睛发生病变主要是因为那次手术使眼睛受到了伤害。但是无可否认，那次手术是成功的，因为它二十年来都没有给我带来麻烦。而且可喜的是，我右眼的病变并没有导致左眼发生异常。格里斯医生在此诊断基础上，提出了治右保左的治疗方案。

分别之时，我们两个老人双手紧握，彼此叮嘱多多保重，言语之间传达了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此次诊断工作由美中基金会执行总裁李黎先生与特别助理胡长妮小姐全程陪同。诊断工作结束后，格里斯医生还没来得及歇息就要返回他眼下工作的城市沈阳。李总再三挽留，格里斯医生坚持当晚返回沈阳的工作单位——沈阳何氏眼科中心进行他的研究工作。最后，李总与夫人不得不亲自将格里斯医生送上北归的列车。

格里斯医生这种为友情与事业废寝忘食，敬业爱岗，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为美中基金会每位工作人员树立了一个学习的好榜样，不愧为当代的白求恩医生。（有关资料引自美中基金会网站）

里根上台之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自1980年夏、秋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一再鼓吹同台湾要建立所谓的“官方关系”，或在台湾设立政府级联络处等错误主张，其实就是要在《与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谋求美台关系的新突破。

里根就职典礼的风波

在1980年的美国大选年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发表了一系列亲台湾、损害中美关系的言论，尤其是提出了所谓“倒联络处方案”，即按1973年台湾当局在美国设有“大使馆”、中国在美国设联络处的方式，现在中国在美国有大使馆，让台湾当局在美国也设联络处。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竟邀请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出席他在1981年1月20日举行的就职典礼。

邓小平对此事的态度十分坚定，他说：我们“同美国开展一场斗争，要准备中美关系倒退到1973年（中国在美国设联络处）的水平”！经过《与台湾关系法》问题上两年的斗争后，1981年1月11日，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现状

发出这样的明确指示，源于中美关系的最大“倒退危险”，即台湾问题。

在中方看来，里根在当选为总统后，竟然又发出对台湾政要的邀请，这一举动很可能是里根要全面发展对台关系的信号。为此，邓小平才表露出“不惜倒退”的强硬态度，决意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同时，外交部在获悉里根邀请台湾派团参加自己的就职典礼的消息后，立即急电让我速与美方交涉。

美国人也特会“踢皮球”。我先找到美国务院，得到的回答是此事不归他们管。我又找到了白宫，有关人士又声称，客人是国会邀请的，他们管不了。这种不痛不痒、推三阻四的答复把我给惹火了。于是，我带上周文重再度来到国务院，找到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并向他发出严正声明说：如果台湾派团参加里根总统的就职典礼，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将不参加。

我记得当时我说话的语调很冷静，但措辞却强硬而且不容置疑，再加上周文重圆熟的译技，使对方一定感受得到锐利锋芒。周文重将我的那种“不要到时候怪我没有预先打招呼”的味道，转达得惟妙惟肖，使霍尔布鲁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不敢怠慢，迅将情况上报有关部门。事已至此，美国不能不认真对待了。他们开始为自己准备“台阶”，想方设法让蒋彦士“得上重感冒住进医院”，让他回避起来……

就在里根就职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陈香梅找到我并对我说：“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台湾代表不会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了。”“为什么呀？”我还是明知故问。“病了！”“住进医院了。”这位当年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遗孀拖长了声音笑着说。我淡淡地说，“他就根本不该来。”

几个小时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柴泽民阁下已受到美国官方邀请，代表中国出席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任何来自台湾的人士出席典礼将只能作为私人参加，没有任何官方或代表的资格。”

那天，我站在观礼台上，穿了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我想，大概在华盛顿冬

日和煦的阳光照耀下会显得很引人注目的。站在身后的周文重与我一样，一定也感到非常自豪。但说实在的，我们心里却毫无一点轻松感，这件事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外交工作的曲折、艰难和沉重。

紧接着，即2月6日，美国国务院又声明，里根政府将恪守中美建交公报各项原则。2月10日黑格约见我，3月19日里根本人也会见了，重申他将加强中美关系，愿与中国建立密切的军事关系，共同对付苏联，并表示“两个中国”不是他的政策，又表示，美国对台湾负有义务，但这些义务将合乎《与台湾关系法》和中美建交公报规定的非官方标准；美方会很谨慎地处理售台武器问题，等等。

《八一七公报》与售台武器问题上的艰苦斗争

1981年年中，美国的赫尔姆斯等数十名参议员联名给里根总统写信，表示要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中国政府对此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进行抨击。

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黄华在1981年10月28日至30日访问美国，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与美国务卿黑格会谈。

会谈一开始，黄华的态度就非常强硬，他说：“为了平息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美国必须确切说出它打算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期限有多长，保证今后任何一年的武器销售不超过卡特时期的水平，并表明这种销售将逐年减少直至停止。”

黑格没想到中国的态度如此强硬，他大吃一惊，忽然站起来说：“这是最后通牒吗？”

黄华厉声回答：“这是中国的坚定意见！”

这时，中美关系“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双方会谈只好暂时停顿下来，黄华外长返回北京。据外电报道，国务卿黑格要里根总统下定最大的决心。他向总统进言道：中美关系“可能导致自1949年美国‘失去中国’以来最重大的

外交灾难，对这次失败，共和党要在政治上承担严重后果”。

1981年12月4日，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正式谈判开始在北京举行。中方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美方代表是驻华大使恒安石。双方进行了八个月的艰苦谈判，其间几次濒于破裂，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史称《八一七公报》）。该公报与《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并列为中美关系准则的三个公报。

公报包括以下九条内容：

柴泽民
(左四)、章
文晋(左
一)、黄镇
(左二)在
北京与来
访的美籍
华人张仲
鄂(左三)
合影
(1986年)。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发表的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范围内，双方同意，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二)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在两国谈判建交的过程中没有得到解决。双方的立场不一致，中方声明在正常化以后将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双方认



识到这一问题将会严重妨碍中美关系的发展，因而在中
国总理与罗纳德·里根总统以及黄华副总理兼外长与亚历山大·黑格国务卿于1981年10月会见时以及在此以后，双方又进一步就此进行了讨论。

（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确认了这些原则。1979年1月1日生效的《建交公报》又重申了这些原则。双方强调声明，这些原则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

（四）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是按照这一大政方针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进一步重大努力。

（五）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台湾问题上出现的新形势也为解决中美两国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分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六）考虑到双方的上述声明，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七）为了使美国售台武器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最终得到解决，两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以利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八）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双方决心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为继续发展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共同作出重大努力。

（九）为了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两国政府重申《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双方将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保持接触并进行适当的磋商。

8月17日上午，也就是公报公布之前，邓小平接见了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请他向里根总统转告以下口信：

(1) 中美《八一七公报》已经正式达成协议，期待美方切实履行其承诺和保证。《公报》中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这一规定在原则上是很清楚的。中国不希望看到由于玩弄数字游戏或借口生产上的原因而引起新的争执。《公报》中说，“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这个“一段时间”的含义很清楚，即是有限的，不应推到遥远的将来。至于“最后的解决”，其含义也只能是最终停止售台武器，而不应作任何别的解释。

(2) 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在《公报》中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作了什么承诺，当然也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希望双方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误解。

(3) 中方重视中美关系，愿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同美方一起作出努力。但无可讳言，在中美关系上始终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个法即使未被修改，美国总统在执行该法时也有很大的机动权限，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资料来源：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公报发表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要点如下：

(1)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关系到中国主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势必严重损害两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今天发表的联合公报“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规定了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步骤”。

(2) 只有严格遵循“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两国关系才有可能健康地发展。

(3) “美国售台武器本来早就应该完全停止。由于考虑到这是一个历史遗

留的问题，中国政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分步骤予以解决。美国方面承诺售台武器首先在性能和数量上不超过两国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逐步减少，并经过一段时间最后解决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最后解决，其含义当然是指美国售台武器经过一段时间必须完全停止。也只有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排除发展两国关系中的障碍。”

(4) “中国方面在公报中提及关于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是为了进一步表明我国政府和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在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上，不容许有任何曲解或外来干涉。”

(5) 《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两国建交公报的原则，是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的”。任何试图把本公报同《与台湾关系法》相联系的解释，都是违背本公报的精神和实质的，都是不可接受的。

(6) 此协议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开端”。“重要的是，公报的有关规定能得到认真履行，以早日彻底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资料来源：李长久等编《中美关系二百年》“附件”，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在美国方面公布《八一七公报》时，里根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也作了说明。里根声明说：“同中国建立牢固、持久的关系一直是接连四届美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这样一种关系对我们长远的国家安全利益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有助于东亚的稳定。促进这种重要的战略关系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但与此同时，里根又表示：他“决心保持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间与我们的非官方关系一致的各种接触——文化的、商务的和人与人的接触”，并且将以适合于“老朋友”的“庄重体面的方式”进行。不过，关于今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里根还是说“出售武器将继续按照《与台湾关系法》进行”。里根表示，“我们十分重视中国人在公报里关于中国的‘大政方针’的说明”，并称“我们今后在采取行动时将充分考虑到这种和平的政策”。关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里根说：“台湾问题是应该由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解

决的事情，我们决不会干涉这件事情，也决不会妨碍台湾人民在这件事情上的自由选择，或者在这件事情上对他们施加压力。同时，我的对于任何解决办法都将是和平的解决办法这一点怀着不变的兴趣和关心。”（资料来源：哈里·哈丁《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前景》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总之，《八一七公报》再次确认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

这样，虽然中美关系中依然存在台湾问题的障碍，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得到了缓解。

由于公报本身就是双方妥协的产物，还有一些遗留问题只能留待以后解决。在公报的协商过程中，中国政府由于考虑到售台武器是历史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维护原则的基础上体现了灵活性，没有坚持美国售台武器的停止期限。

《八一七公报》使中美双方在解决建交时遗留下来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如果美国方面切实遵照这个公报执行，后来中美两国间的许多摩擦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并没有严格履行公报，甚至不时地有严重违反公报的情况。中国方面为此不得不进行持续不断的交涉和严正的斗争。

有国际问题评论认为，即便公报没有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公报起码表明，中美双方都不愿意让这个问题破坏了整个中美关系，不愿意让这个问题阻碍了中美关系中其他方面关系和交往的发展，都希望把它放在整个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之中来加以解决，而随着中美关系中其他方面的发展，两国的纽带也就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坚固，从而又会给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较好的环境和条件。

关于“胡娜政治避难事件”

中美在教育、文化、新闻、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不断增加，对中美关系的正

常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难以“量化”的，而且又是十分重要的。中美文化交流的发展速度是迅速的，但“双向”交流的数量和整体态势又是很不平衡的。值得指出的是，中美两国在上述领域的交流中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的“胡娜政治避难事件”。

1982年7月，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胡娜随中国网球队在旧金山参加比赛。7月20日，胡娜在参加国际网球比赛后离队出走。数日后，由律师出面宣布胡娜向美国政府提出“政治避难”申请。此后，中方多次与美方交涉，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维护中美文化和体育交流的大局，不要使这一事件升级。

1982年8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时，敦促美国政府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妥善解决这一事件。然而，美国政府在经过国内各方激烈辩论之后，于1983年4月4日，宣布给予胡娜“政治避难”，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向美国政府递交了抗议照会。文化部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决定终止双方商定的、但尚未执行的全部项目。

关于“湖广铁路债券”问题

1979年，美国公民拉塞尔·杰克逊等人向美国亚拉巴马州联邦法院提出申诉，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还清政府在1911年举借的“湖广铁路债券”。按照美国的法律，这些美国公民的诉讼是不能成立的。美国1976年颁布的一项法律规定，在发生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诉讼时，外国享有豁免权。但美国政府采取暧昧态度，不表明立场。美国国务院声称“自己管不了法院”，以美国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各自独立为借口，表示“不介入纠纷”，从而未能制止这场不应进行的诉讼。1982年9月2日，该法院缺席审判，要求中国政府偿还原告4130万美元。1983年2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华。我国外交部向他递交了抗议备忘录，就“湖广铁路债券案”对美国提出抗议，指出此债券是由

被推翻的旧清朝政府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不应负有责任；再则，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也不能接受美国地方法院的管辖。在中国的坚决抵制下，1984年10月26日，美国亚拉巴马州联邦法院重新审理此案，驳回了原告就湖广铁路债券问题对中国提出的诉讼。10月31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法院的上述裁决表示欢迎，同时重申中国政府对此案的一贯立场。后原告继续上诉，先后于1986年7月和1987年3月被联邦上诉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历时八年的这一诉讼案终告结束。

中美纺织品贸易之争

随着双边经贸交往和互利程度的增大，发生贸易摩擦的机会也就增多。中美纺织品之争即是一例。

1980年中美第一个纺织品协定规定，对六种纺织品实行配额。按照美方的统计，出口到美国的中国纺织品从1978年到1982年增长了九倍，冲击了美国市场。美国要求中方将向美国出口的纺织品数量的年增长率控制在1%以内。后来，美国对华限制的数量有所松动，但其单方面规定的指标仍然是1.5%—2%，与中方要求的6%的增长额相距甚大。1983年1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单方面宣布，由于第一个协定到期，在新协定达成之前，美国决定对中国纺织品进口实行限制。这使得中国损失巨大。于是，中国方面决定削减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直到当年7月，中美才达成第二个协定。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规定对三十三个品种实行配额。再加上美国单方面决定实行配额的五十八个品种，纺织品配额品种实际增加到九十一个。1987年底，中美又达成第三个纺织品贸易协定。根据协定规定，中国出口美国的纺织品和成衣的年增长率为3%，但此数量仍高于港、台地区和韩国等国对美国的出口。

中美关系相对 平稳发展的阶段

里根上台以后，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中的摩擦虽然从未中断过，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却也不断加深。在贸易方面，从1981年至1987年，累计双边贸易额超过450亿美元，其中198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78.58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外贸伙伴和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二大市场。

全面发展经贸互利，战略安全关系升级

中美合资企业迅速发展，截至1987年，四百余家中美合资企业已经在华开业，美国在华协议投资额已逾30亿美元。此后两年，美国投资额更是增加迅速。如果将中美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加起来计算，截至1989年底此类企业的数目已达949家，协议投资额达41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总协议投资额的12.4%；实际投资额达18亿美元，占外国实际投资总额的12.6%。（资料来源：张任《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就美国在华投

资趋势来看，从1979年至1986年，美国在华投资平均每年38项，平均每项近890万美元的投资额，投资者多为美国大企业，投资领域多为旅游项目等第三产业；而从1987年开始，平均每年163项，平均每项投资额为220万美元。这说明美国广大中小企业也开始参与对华投资，而且生产型、出口型或先进技术型项目数量大大增加。另外，中国在美投资额也从无到有，逐步增多。到1990年底，中国在美国的合资、独资项目共达217家，投资总额为1.007亿美元。（资料来源：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经济、贸易往来的日益增加，推动了中美双方金融关系的发展。80年代初，中美经谈判妥善解决了长达20年的冻结资产问题。1980年10月，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率先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翌年，美国大通银行在北京的办事处开业。到了80年代后期，花旗银行、美洲银行等美国银行在中国共开设13个代办处。美国金融业对华提供的信贷资金日益增多。从1979年至1983年，美国对华发放的银行信贷和商品信贷总额为2.03亿美元。中美关系走向稳定发展后，中方借用美方资金量增长迅速。1985年从上一年的1053万美元上升为1773万美元，而1986年剧增为1.58亿美元，1987年便上涨为2.74亿美元。金融业的合作，又进一步对双边经济、贸易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美建交之后，中美战略安全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美国对华技术转让仍然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难题。因为美国对华的技术转让仍然要受到美国单方面的规定或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卡特总统虽然在其任期的后期将美国对华技术转让的限制有所放宽，但许多具体的规定仍不十分明确。

为了使美国厂商在对华贸易中更具竞争力，里根于1981年7月提出了所谓的“双倍政策”（twotimes policy），即允许美国厂商对华出口的技术等级和

性能达到对苏联出口的两倍。由于该项规定的边际仍然含混，受到中方和美国商业界人士的批评。从1982年秋到1983年初，美国商务部对美国上述政策再次进行了审议。审议结果是美国实际上不可能控制世界各地对华的所有贸易。有些领域美国的规定过于严格，实际上限制了美国对华出口，而同类产品，中国却可能从其他控制较松的国家得到。然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又对中国获得某些先进技术和设备存有戒心，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可能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危害，所以美国在《八一七公报》签订之时，在此问题上仍然举棋不定。1983年5月，里根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的由多部门人员构成的专门小组，对美国可能对外转让的技术根据其性质进行分类。

该小组于9月份完成对美国对外转让技术的等级分类。根据该报告，美国将其技术和产品划为三类：

(1) “绿区”包括对美国安全风险最小的技术。该区的技术一般不需要政府部门，特别是国防部的批准就可出口。

(2) “黄区”的项目一般须经过政府部门的个案批准。

(3) “红区”包括最为先进和敏感的、能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技术。此类技术美国对北约以外的盟国都严加控制，对中国更是不准出口。

鉴于美国已经在1983年6月将中国从出口管理分类的“P”组划入“V”组，即将中国列入友好的非盟国一组，所以，此三类划分一经出台，美国对华出口的申请便骤然增长。以后美国政府又简化了对外技术出口的审批手续，特别是绿区项目的审批手续。按规定，美国商务部当时向中国出口的“绿区”共包括七类电子产品。这样到1984年，美国批准的对华出口许可证项目比1983年的四千四百四十五项扩大了一倍。1985年12月，美国商务部向中国出口的绿区已扩大为二十七类。（资料来源：谭青山《美国外交对华政策的制定》）

为伍德科克大使过生日

美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因公开抨击里根反华言论遭到打击报复。

1980年的美国大选年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发表了一系列有损中美关系的言论，尤其是提出了他要恢复美台官方关系的主张。这事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切。当年8月26日，伍德科克大使认为有必要表明美国政府的立场，他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点名批评里根的言论不当。他说：他感到难以理解里根先生目前对台湾的立场，美中有关协议已排除了美国在台湾设立官方机构的可能性。里根重提这一问题，危及美国精心同中国建立起来的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处于特别敏感的时期，将有严重削弱美国国际地位的风险。如里根当选后实施其“两个中国”的政策，美中关系将发生危机。作为一位大使，公开抨击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言论，这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位候选人很可能就是下一任总统，公开批评他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这次讲话引起了里根阵营的强烈反应，他们指责这位大使出言不当。卡特政府的国务院发言人站出来表态，说伍德科克的观点，就是政府的观点。接着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也发表类似讲话，为伍德科克撑腰。

这次争吵风波不久，里根竞选成功，成为白宫的主人。伍德科克的任职期限也就到了。

1981年1月，里根总统刚上台，伍德科克就接到了离任通知。此前国务院曾建议让伍德科克再留任一段时间，以免出现空档，不利两国关系，但里根拒不采纳这一建议。伍德科克只好开始为离任进行辞行活动。

中方对这位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过贡献的大使，给予了高规格的欢送。行前伍德科克会见了邓小平、李先念和其他几位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和宴请伍德科克时说，感谢大使在任期内为发展两国关系和人民友谊所作的贡献。

伍德科克表示，他为能在中国发生历史性变化时期担任大使感到非常荣幸。

黄华外长宴请伍德科克时，对伍德科克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中美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所作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伍德科克表示，看美中关系应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一切无知与混乱将一扫而空”。他这里指的“无知与混乱”，显然是针对里根政府错误言行而说的。伍德科克最后说：“我将带着永恒的、美好的回忆回国，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充满乐观和信心，中国必将取得更大成功。”

伍德科克席间还向中方提出临别赠言，他坦诚地说，他虽然不赞成里根的某些言行，但他从中美关系的利益出发，还是向中方建议，不要公开攻击总统，而要设法推动他，使他了解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芮效俭公使接着说：现在里根总统刚上台，对华政策还没有成形，建议中方派适当人选去美国一趟，一方面对政府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也对国会议员做些工作。中方对上述建议当场不便表态，后来外交部将这一建议上报中央。中央决定派英语流利、又熟知中美双方政策的美大司副司长冀朝铸担当此任。

冀朝铸到美后，即同我一起，会见了里根总统，布什副总统和黑格国务卿等也在座。冀就中方对台政策作了阐述，抓住时机，对美新政府施加影响。这种工作方式后来中国政府在一些关键时刻都用，几次向美国派出高级外交官去做工作，收到了较好效果。

1981年2月13日，伍德科克大使夫妇离开了北京，回到了美国密歇根州的家乡。

在北京机场，他们受到了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等中国官员的欢送。韩叙是个有心人，他有意地打听了伍德科克夫妇回国的详细行程，等飞机起飞后他立即将行程电告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和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

伍德科克夫妇到达旧金山时，胡定一总领事已等在机场迎候，并把他们送至旅馆。伍德科克夫妇下一站，于1981年2月15日到达华盛顿，时值伍德科

克七十寿辰。年迈的大使提着笨重的行李走在机场通道时，美国国务院竟无一人来接。到头来还是我前往迎接，并从华盛顿远郊区的杜勒斯机场把伍德科克夫妇连同行李带到了下榻的旅馆。更出乎伍德科克意料的是第二天晚上，我和李友锋在中国大使馆盛宴款待伍德科克夫妇，请他们吃了长寿面，并频频举杯祝贺伍德科克的生日。当我问他，为什么国务院不派人去接他时，伍德科克只好据实以告：“我想现政府不喜欢我在中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他一再感谢我们夫妇对他们夫妇的盛情接待，还为他过了美好的七十岁的生日，他说，这事会让他永生难忘。

感人的离任活动

1982年底，美国报纸及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章文晋副外长即将接替柴泽民大使出任驻美大使。舆论对此作出了积极评价，华盛顿的分析家们认为，让一位善于同西方国家打交道，并且一向受到西方外交官尊敬和欢迎的人来接替柴泽民大使，这说明中方仍然是从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来考虑大使人选的。

我即将离任的消息传出之后，伍德科克夫妇和美国的美国问题专家们几周前就计划在某日晚上为我们夫妇举行一次家宴，结果他们成了最早为我举行送别晚宴的人。

实际上，“辞行”这件事，为我又提供了一次广泛接触美国上流社会人物，或者说与他们讨论双边关系问题的机会。我先后以这种方式见到了十几位议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和议员们的谈话似乎还可以用“很愉快”一词来加以形容，而在某些时候，谈话的气氛有一些紧张，但双方的关系还是很友好的。

尽管离任前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但我还是决定接受邀请，前往拜会一些友好的美国朋友及一些美国官方人物。在我交往的美国历任总统中，尼克松是我接触最多的一位，也是关系最密切的一位。所以我向他辞行时，还就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很多意见。那天晚上，他为我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宴会。我想，尼克松依然喜欢以安排这种小范围的私人聚会的方式来表达他和我之间的非同寻常的友情，而这同时也是在告诉人们，他不会因为中国大使即将离开美国就改变他对待一位老朋友的态度。

我拜会的另一人是前国务卿基辛格，他很希望为改善和发展美中关系到北京再走一趟。就像尼克松在那天晚上所做的一样，基辛格也为我举行了一个晚宴，但与尼克松不同的是，他邀请了十几位朋友出席宴会。

12月中旬后，我的辞行活动进入了高潮，日程表上重新排满了各种各样的会见和宴请。

前国务卿黑格夫妇也为我举行了一个家宴。



柴泽民
大使在白宫
拜会美国副
总统布什
(1982年12
月)。

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则在一家餐馆里宴请了我，他不想邀请更多的人作陪，因为他希望同我单独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他后来说：“我和柴大使就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人权的正确定义，以及美国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的关注如何才是适当的或不适当的等问题，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讨论。”布热津斯基后来这样回忆了我们的那次会面。

柴泽民
大使（左
三）向里
根总统（左
二）辞行
拜会。左一为
里根夫人，
右二为柴泽
民夫人李友
锋（1982
年12月）。

我还同另外一些老朋友，比如华人社团的领袖以及一些有影响的华人学者，讨论了有关的问题。这是我来到美国以后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在离开华盛顿前的最后一个月里，我如愿以偿，这些老朋友包括美国亚洲协会会长、美京华人各界联合会创始人任之恭夫妇以及吴京生教授等等，这令我非常高兴。

有些官员和议员虽然不希望以自己的名义为中国大使举行某种形式的告别

活动，但他们却不拒绝出席一些以私人名义或以第三国大使名义举行的告别招待会。比如在日本大使为我和夫人举行的告别午宴上，就有司法部长迪克·桑伯格夫妇等。在告别冷餐会上，来宾中不仅包括主管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还包括一些参议员以及一些众议员。

向总统里根辞行的活动被安排在了12月中旬的一天。有关计划



中还包括总统与我在白宫共进午餐，这显然可以被理解为是总统本人为我这位离任大使举行的告别午宴。在上甜食之前，里根在一间安静的小会客室中会见了。里根不仅为会面准备好了咖啡，而且还让白宫摄影师为我们拍摄了合影。半个小时后，当我走出小会客室时，甜食刚好被端到了餐桌上，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能够选择的向一位老朋友表达友情的方式了。不过这次会面没有对外发布消息。

两天后的晚上，我在中国大使馆为美国各界人士、驻美使节以及华人代表举行了历时近五个小时的告别招待会。新华社在当天发布的有关消息中说：一共有“近千人士出席了招待会”。人们在招待会上看到的各界要人不胜枚举，比如前国务卿基辛格和黑格、前国防部长埃利奥特·理查德森、前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尔·曼斯菲尔德和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全国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普雷斯、全国工程科学院院长罗伯特·怀特，等等。《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是当晚的客人之一。会场上的气氛非常友好热烈，大家纷纷合影留念。美国“苹果”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报道了招待会的情景。第二天出版的《华盛顿邮报》也对告别招待会作了详细报道，其中写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此前都以个人的和非公开的方式与柴大使道了别。”

到了我和华盛顿最后说再见的日子。这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边用早餐边听秘书读报。9点钟左右，我走进了大使办公室，开始阅签离开华盛顿前的最后一批电文。两个小时后，完成了这项工作。我觉得，这就是为自己四年的大使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

当天中午，我和李友锋离开华盛顿前往纽约，尽管在前一天晚上已经和使馆的同事们正式道别了，但是当车启动时，不少赶来送行的人还是流下了眼泪。惜别之情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毕竟，过去的四年半（包括联络处的半年时间）不论对谁来说都是一段格外难忘和值得回味的日子。

到纽约后我们住进总领馆。次日举行了招待会，同总领馆、中国驻联合国

代表团及在纽约的一些朋友、华人、华侨、台胞们进行了告别酒会。第三天，有些不敢公开参加我的酒会、也不敢到我总领馆来的台胞们，单独为我秘密地举行了一次送行宴会，以表示对我们的难忘友情。

到纽约六天后的下午，1982年12月27日，我们乘坐的飞机飞离了美国的西海岸。我感到，我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抱有乐观的期待，而这种期待来自于一个坚定的信念，即良好的中美关系能够给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幸福。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会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尽管有时可能会遇到一些曲折，但两国的关系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

附录：在匈牙利、几内亚、埃及和泰国 当大使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世界与我为敌，把中国视为最危险的国家。那个时候，除了中苏、中蒙边境，外加一个香港，中国其他漫长的国境线均处在美国及其“小兄弟”的包围之中。20世纪60年代前后，中苏、中蒙分道扬镳，中国处境更加困难。于是，让早年有过人文经历而又经过战争历练的职业军人去镇守外交前沿，便有了充足的道理。所以写过小说的陈毅元帅出任外交部长，具有美术才能的军人黄镇干了好几任大使，而推广过世界语和新文字、又在战争中长期磨炼过的柴泽民也去做了驻匈牙利大使。

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在外交战线上饱经世事。事情就是这样奇怪，至少直到80年代初，中国驻在诸个重点国家的大使，多是军人出身，柴大使虽然一直是做党的工作，但从没有离开过部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打了十年的仗。建国后，又在北京做了十年的政府工作。从1961年起，柴泽民先后担任驻匈牙利、几内亚、埃及大使；1976年又担任了我国驻泰国首任大使。他的大使生涯充满传奇，留下了一篇篇动人的故事。

在匈牙利任大使

1960年12月，我被调到外交部，第一次出使的国家就是到匈牙利。

当时，中国和匈牙利的关系处在非常敏感和微妙的时期。中央把我派到布达佩斯任大使的初衷，是因为匈牙利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兄弟国家，想让我先去学习一些经验。而实际上，那时正是中苏关系走向恶化的时候，所以，在所谓的“兄弟国家”，工作并不好做，甚至更困难。

柴泽民
大使递交国
书后与匈牙
利人民共和
国主席团主
席道比握手
(1961年6月
20日)。

我被任命为驻匈牙利大使是1961年初，那时，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分化的岁月。同年10月，周恩来和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是准备“强调团结”，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相处的，却目睹了苏共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指责。周恩来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但考虑到团结，中共没有公开批评苏共。此时，毛泽东断定：苏共已变成了“修正主义”。

苏联的霸权主义思想和态度很厉害。苏联驻匈牙利的大使，对匈牙利的领导人也不讲礼貌，不尊重人家，在大庭广众面前，就公开喊叫人家的名字，说“过来！过来！”所以大家对苏联外交官的印象很不佳。尽管匈牙利政府不满意，也只得跟苏联走，因为苏联有权有势，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看它的脸色行事。大家都不敢也不愿意惹他们，只好屈从于他们。由于苏联的大国主义做法太露骨，所以驻匈牙利的大使们对苏联外交官都是敬而远之。



匈牙利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天，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即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后来，匈牙利追随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态度也逐步发生了变化。

我国第一任驻匈大使是黄镇、第二任是郝德青，我是第三任。1961年6月，我抵布达佩斯任驻匈牙利大使时，中匈关系已开始变得较冷，随后摩擦逐日增多，政府间的来往也少了。以后使馆的公报也不让出了，为此，我同他们外交部的副部长斗争了多次，最后该副部长向我哀求说：“你比我年纪大，好像我的父亲，请你照顾我的困难，公报不要出了吧。”他说出真话，不让出公报是别人压迫他们不让出，不是他们的本意。但是有些政府官员对我们却是很友好的，经常为我们组织一些活动，比如农村、学校、社团等经常邀请我们去访问参观，人民群众对我们很热情。所以我们在乡村、城市、农业合作社活动，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比如有一次，一个村子有集会，大家都远远地赶去看热闹。到那以后，活动还没有开始，我们就先在街上转悠。一个工人见到我们，就请我们去他家坐坐。我们到了他家，他父亲坐在一边愣着不说话，而且有些敌意。我们就问：老人家，您可好？可老人就是歪着脑袋不理我们。我们只好跟老人的儿子闲聊。老人在一边仔细地听，听着听着，突然开口问：你们是哪个国家的？他儿子当即应声说，他们是中国大使馆的，并指着我说，这位是柴大使。老人的态度马上就改变了，连说：中国人好！中国人好！好好！随即转身将冰箱打开，把准备节日吃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摆到桌子上，叫我们边吃边聊。老人还不断地进行解释：我以为你们是苏联人，真对不起，我弄错了。于是宾主就一起热情地聊了起来。这件小事说明，匈牙利的人民，对我们和对苏联的态度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我在匈牙利任职三年，与匈牙利政府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获得发展，但与匈牙利人民之间的友谊却有一定的前进。1964年7月，我与匈牙利依依惜别，转任驻几内亚大使。

转任驻几内亚大使

1964年9月，我到达科纳克里，任驻几内亚大使。

当时，几内亚政府自称本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把私人企业统统都没收了，改成了国营企业。结果国营企业资金不足，常常没有货源，唱“空城计”。

我们很重视第三世界国家，尽可能帮助他们进行建设。中国先后帮助几内亚建起了农业技术试验站和推广站，种植水稻、茶叶、甘蔗，建立了一家卷烟火柴厂，援助他们建立了一座水电站，以后还援建了一座人民宫、一座体育场，等等。

身着几内亚民族服装的柴泽民大使和夫人李友锋在我国驻几内亚大使馆院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后中国大地便处在狂热的气氛中。尽管中央不让“文革”的大火烧到国外的使领馆，可怎么也挡不住，最后中央还是决定驻外使馆全部人员分两批（每批三个月）调回国学习“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一回国就不是“学习”，而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0年大批人员下放“五七干校”。我在几内亚任期未满，也不得不于1967年6月回到北京接受“教育”。

1970年春天，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与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雷



阳，恢复了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当时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后下放到江西劳动，我因“检讨”未过关，留在外交部继续学习。同年5月，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突然找我，说：出去工作吧，不要“检讨”了，马上准备去波兰当大使，并承担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使命。然而，华沙会谈一波三折，因美国策动柬埔寨政变并入侵柬埔寨，中国决定停止同美国的一切谈判，中美大使级谈判也因此而停止了。这时，驻阿联（埃及）大使黄华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埃及总统纳赛尔再三要求中国派大使去埃及，为了满足纳赛尔的要求，于是外交部决定我就不去波兰了而转去埃及。我遂前往阿联，接替黄华为驻阿联大使。

出使埃及

1970年6月，我急忙飞到埃及。可到那儿两个多月了，一直都没见到纳赛尔总统的面。7月4日，我是向副总统萨达特递交的国书。

原来，当时身体欠佳的纳赛尔总统正处于一个艰难的抉择中。

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五战争”、“六日战争”）中，埃及被以色列军队打败。自“六五战争”失败后，由于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过度操劳，纳赛尔的身体渐渐垮下来了。他不仅体重减轻了30多磅，而且所患的糖尿病正在引发越来越复杂的并发症，如神经炎及心脏病，四肢受到影响不能很好走路等。

1969年9月11日，他的心脏病又严重地复发了。这次发病，除了有七个必须知道的人以外，其余谁都不知道，甚至连他的妻子也给瞒住了，只对外宣称：纳赛尔因患严重流行性感冒而离职休养六个星期。

“六五战争”后，埃及为收回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与以色列又打了三年的“消耗战”。1970年6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提出一项新的和平计划。由于得不到苏联的有力支持，纳赛尔被迫于7月23日正式宣布接受罗杰斯计划。

这项计划建议交战双方首先停火九十天，埃及和约旦承认以色列主权，以

色列则撤出所占领土。

埃及接受罗杰斯计划使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深为不满，纳赛尔被指责投靠美国，出卖阿拉伯事业。1970年9月，在约旦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因反对约旦政府接受罗杰斯计划，而与约旦政府军发生剧烈的流血冲突，数千人在冲突中死亡。为此，纳赛尔抱病于9月22日在开罗举行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共商解决约、巴冲突办法。9月28日会议结束后不久，纳赛尔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

这时候，我才通过埃及专门广播《古兰经》的经文这一非同寻常现象中，意识到埃及发生了重大事情。副总统萨达特在广播中低沉而简短地向全世界公布了纳赛尔逝世的噩耗后，顷刻间就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反应。

那时，我同埃及人民一样以沉痛的心情追忆着中埃关系的往事：1955年4月，周总理前往出席万隆会议的途中，在仰光第一次见到纳赛尔，同他就双边关系和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转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埃及的友好情感，坚决支持纳赛尔政府争取国家完全独立，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会谈一结束，纳赛尔就派遣埃及代表团成员、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率团访华，这是来自非洲国家的第一个部长级访华代表团；同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率贸易代表团访华，和中国签订了中非国家间首个贸易协定。1956年1月，双方互派留学生和教师，同年1—2月双方互建商务处；2月，中国文化艺术团访问埃及；3月，中国在开罗举办中国在非洲大陆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商展会。5月30日，埃及成为非洲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以后，毛泽东主席又多次代表中国人民支持埃及政府的正义斗争，而只要我们能力所及，就一定给予埃及政府所需的帮助。

回顾纳赛尔的一生，他领导了埃及的七月革命，使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亚非殖民地国家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为亚非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的反帝反殖斗争树立了敢于斗争、夺取胜利的光辉榜样。他坚定地奉行反

帝反殖、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对第三世界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此，毛主席称他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纳赛尔的实际行动证明他无愧于这个称号。

1970年10月15日，即我到埃及的三个月之后，埃及人民选举副总统萨达特继任纳赛尔的总统职务。萨达特任总统后，在对外关系方面面临两个紧迫问题：一个是怎样摆脱苏联的控制；一个是怎样洗刷1967年同以色列战争失败的屈辱。

1971年3月1日，萨达特访苏，请求苏联援助，未达目的。回国后，立即撤去了同苏联关系密切的阿里·萨布里的领导职务，并直截了当地通知苏联驻埃大使：你们今后不会再有一个“在开罗的人了”。为稳住埃及，5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在开罗与萨达特签订了为期十五年的埃苏友好合作条约。但苏联迟迟不给埃及所答应的武器，使萨达特宣布的在1971年用武力收复失地的计划破灭。萨达特在谈到同苏联交往的痛苦体会时说：苏联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他们已答应给埃及武器的协议达一年之久，是在他背上捅刀子。



柴泽民大使在向埃及副总统萨达特递交国书后，两人亲切交谈（1970年7月4日）。

1972年6月15日苏联在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宣称在中东实现“军事缓和”后，送给埃及一份关于美苏最高级会议的报告，激起了埃及人民的极大愤慨。萨达特愤怒地向苏联大使指出：“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3月骗了我、波德戈尔内在1971年5月骗了我，难道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要把戏吗？你们同美国人商定：中东无战事。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无权充当我们的监护人。”

接着，萨达特当着苏联驻埃及大使的面，宣布结束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埃及的使命，从7月17日起的十天内离开埃及。

为了收复失地、重振埃及，萨达特和埃及政府决定加紧备战，并深入地进行全民动员，争取真正对他们友好的国家的支持和援助。那时，萨达特也尽力搞好同我国的联系。

1973年3月底，埃及政府下令全国各城市人民军事抵抗指挥部，开办训练营、开展训练活动，加紧渡河的秘密准备，尽量选择同实战条件相似的地点进行渡河演习。

为了反击以色列的侵略，阿拉伯各国加强了团结合作。8月，埃叙两国就向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侵略军同时发动反击的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10—12日，萨达特、阿萨德和萨达姆·侯赛因在开罗举行埃、叙、伊三国首脑会议，一致确定了收复失地的共同战斗目标。与此同时，埃及为争取中东产油国的支持，相继邀请阿尔及利亚首脑布迈丁等访问开罗，萨达特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同沙特阿拉伯国王和卡塔尔元首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在未来的阿以战争中如何利用石油武器的问题，埃及还从沙特和卡塔尔获得13亿美元的援助款项。

这时，由于美国给了以色列许多先进武器，苏联为了加强同美国的争霸地位，同时也向埃及运去了一批射程180英里、可携带核弹头的“飞毛腿式”地对地导弹。

10月3日，埃及征得叙利亚的同意，选定在10月6日，即伊斯兰教斋月

开始之日和犹太教的赎罪日发动反击。这一次他们吸取上次战败的教训，保密工作搞得特别的好。

那时候，我们和驻埃及的各使馆一样，一点都没听到要发动战争的信息。只知道埃及部队来回调动和换防，埃及空军似乎无法抵挡以色列的空袭。

10月6日上午，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以色列军队阵地异样的沉静。士兵们仍按犹太教的教规，在赎罪日从日出到日落，不进食、喝水、抽烟。他们中有

陪同由郭沫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埃及时在开罗留影。前左三为郭沫若，前右一为何英，前左二为柴泽民（1971年10月）。

有的在祈祷，有的在沐浴、洗衣，等待天黑。

下午2时，苏伊士运河东岸以色列防御工事的沙垒中，埃及士兵预先在水下悄悄埋入的两个炸药包突然爆炸，炸开了两个缺口。同时隐蔽在河西沙丘后的二千门大炮猛烈向东射击。到炮弹铺天盖地地飞到以军阵地时，以色列士兵才匆匆奔向战位。此时，他们口中还不停地念叨经文，而根本没料到，第四次中东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按照埃及总参谋部事先制定的周密计划，埃及空军二百架超音速飞机呼啸着越过运河，袭击了以军阵地。二十分钟之内，埃及飞机就摧毁了以色列在西奈的指挥部、空军指挥部、防空和雷达干扰中心、导弹营、炮台等，使他们的通讯联络也中断了。同时埃军强渡苏伊士运河，一举突破以军的“巴列夫防线”。

这时，在开罗的作战指挥大厅里，满怀喜悦的萨达特和他的军事指挥官们接到报告，说埃及部队飞越了运河，向西奈半岛深入。埃及的旗帜又一次飘扬在东岸了。

埃及正在欢天喜地地庆贺打过东岸的时候，美国突然以新式武器援助以色列。以军



从埃及军队的结合部打击埃军的后方，突过运河，向开罗方向推进。此时埃及部队大部分过到运河东岸，后防空虚。一日数惊，埃及外交部连夜召集各国驻开罗大使，要他们各自向自己的政府转达，要求联合国提出迫使以色列从埃及领土上撤退。同时呼吁中东各产油国家使用石油武器，打击以美国为首的支持以色列侵略行径的西方国家。通过各方面斗争和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终于达成停火协议。10月24日，十月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后，埃及外交部组织各国大使到运河东岸的以色列阵地参观，四十多位大使坐一辆大巴士，以便听介绍。车快到运河附近时，下了一点小雨，路有些滑，结果汽车翻入路旁2米深的沟里，头朝下、尾朝上。我的腰撞在行李架子上，阿尔巴尼亚大使压在我身上，我的气也出不来了。回到大使馆时下不了车，被几个人抬下来。我没有去医院检查，喝了一瓶云南白药，一面静养、一面工作，两个月后才基本痊愈。回国后，经医院检查，发现是腰部骨裂，不过已经愈合。

在国内休养一段时间后回到使馆，不久突然两膀不能动，解手、穿衣都很困难，我国驻苏丹大使杨守正派我国在苏丹的医疗队的外科医生来治疗，经过半年多也不见效。以后直到1974年8月任满回国后，由北京医院和积水潭医院的医生按摩才逐渐痊愈。

从埃及回国后，因我已经当过三任大使，外交部决定我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担任会长。

难忘的曼谷岁月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中美发表了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上海公报》。国际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但泰国方面对泰中建交还抱着“等着瞧”或“半推半就”的态度。

小球推动大球

1972年9月，中国举办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周恩来总理借此机会，以小球推动大球，利用乒乓球比赛，展开外交活动，促进有利形势的发展。当亚洲乒乓球联盟向泰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发出邀请后，泰国总理他依也正想了解中国在建交问题上的态度，于是就派遣以泰国全国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和工业署副主任，有“泰国的基辛格”之称的巴实（许敦茂）先生为顾问的泰国乒乓球代表团来北京参赛。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二十三年来泰国第一次派出的公开的、并有政府高级官员随团的访华团。亚乒赛期间，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巴实先生，双方就贸易、文化、体育、医疗等方面开始交流及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同年10月，泰国商界应邀参加了中国“广交会”，巴实先生率团再次来华。1973年6月，以庄则栋为首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问泰国，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第一次派出的公开的访泰代表团。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轰动了泰国。当时，成千上万的曼谷市民拥挤在体育馆周围，场内座无虚席。有的想看看从“红色中国”来的人的面貌是否像某些人描绘的那样狰狞、可怕；有的想看看号称“世界乒坛霸主”的中国运动员的精湛球艺等。中国运动员在曼谷参观、访问、表演期间，以他们的热情、谦虚和精湛的球艺，给五百万曼谷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形势朝着有利于中泰两国正式建交的方向发展。

1973年10月，泰国政局发生变化，他依政府被推翻，国王任命汕耶成立新政府。新政府面临石油奇缺难题，泰国政府派代表团来中国洽谈购买中国石油事宜。为此，1974年12月，泰国政府废除了禁止中国商品入泰的第53号法令，这既为进口中国石油开了绿灯，也为今后两国贸易排除了障碍。

1975年3月，克里·巴莫政府执政。克里·巴莫总理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大国平衡政策，表示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年6月底，克里·巴莫总理

率领政府代表团访华，进行中泰建交谈判。

其实新中国成立后，中泰建交的努力并不始于1972年，而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去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期间。当时，周总理与泰国外长就两国建交问题交换了意见。此后，泰国当时的总理銮披汶把有关建交的事务交给了他的头号智囊人物汕·帕他努泰先生。1955年12月，泰总理披汶访问缅甸期间，委托汕·帕他努泰先生与受周总理委托的中国驻缅大使姚仲明秘密商谈两国建交事宜，签署了会谈纪要，同意双方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邦交。但鉴于当时美国对泰国的压力，两国还不能正式建交，先以相互访问、进行文化交流等来逐步促进两国民间友谊的发展；接着，泰国公开或秘密的团体频繁访华。如1956—1957年，泰国来访的团体就有中泰友好促进团，以及烟草、篮球、工人、艺术家、律师、青年代表团等。这些代表团都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最后，泰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南和外长差猜先后正式访华进行外交谈判。

1975年7月1日，中泰终于建交。这是中泰两国和两国人民二十六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当时周总理重病在身，但他仍抱病在医院里主持建交签字仪式，这也是周总理一生中最后一次主持建交签字的仪式。签字的这天，就作为中泰关系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而载入史册了。

出任首任驻泰国大使

中泰建交后，外交部长乔冠华就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同意到泰国任大使。我立即回答：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组织让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于是，1976年1月底，我作为驻泰国首任大使到曼谷上任。一下飞机，就受到泰国外交部、中华总商会、华人养老院以及各界华人华侨数百人的热烈欢迎。大家向我同李友锋的脖子上套的花环几乎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曼谷各

报纸的记者们的采访应接不暇。我一到使馆，就有华人华侨前来看望，问长问短，真是十分感人！

递交国书前，我先拜会了泰国外交部长差猜，向他递交了国书副本和颂词副本，并商定递交国书的有关事宜和程序。泰外交部长对我出任驻泰大使表示礼节性的欢迎，并说将尽快安排向泰国国王递交国书。同时，外长还盛赞了泰中友谊，并说泰中关系历史悠久。外长特别提及泰中建交后，在泰国经济发展中，中国援泰方面要起很重要的作用。我感谢外长的会见，并对他答应尽快安排递交国书事宜表示感谢。

很快，泰外交部通知我，递交国书定在3月22日。在我递交国书之前，我驻泰使馆负责礼宾的官员先拜会了泰外交部礼宾司长，请他详细讲解了在泰国递交国书的仪式程序，做到心中有数，因为泰国的国家元首是国王，同我之



柴泽民
大使向泰国
国王普密蓬
递交国书
(1976年3
月22日)。

前任过大使的国家不同，尤其是在礼仪上有专门的讲究，即使某些细节也应当避免可能的疏漏。礼宾司长为人热情诚恳，风趣幽默，通过这次拜会，我驻泰使馆负责礼宾的官员以及我本人对泰国有了初步的了解。

泰国方面规定，大使呈递国书，使馆只能去主要馆员。当时国王因在外地，只能由外长差猜陪同大使一人乘坐飞机前往。

递交国书时，泰国礼宾司长率车队先到大使临时官邸，再次给我讲解递交国书的仪式程序以后，车队随即出发。最前边有警车开道，在礼宾司长陪同我乘坐的黄色汽车前面，有三辆摩托车护卫。抵达国王住处后，卫队致敬，其中一队穿英式服装，一队穿泰式服装。王室典礼官身穿大礼服，佩着勋章，在殿门内迎接，并领我至候客厅。这时，国王的侍卫长前来行礼作陪。接着，大厅门打开了，国王身穿白色礼服，站在御座前正中。泰国外交部长差猜站在国王左下侧，我则在典礼官陪同下，按礼仪规定鞠躬三次后走到国王前方，用中文说：“尊敬的国王普密蓬·阿杜德阁下，我荣幸地向您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柴泽民
大使到职后
去总理府拜
会泰国总理
克立·巴莫
(1976年3
月24日)。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阁下任命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然后，国王用泰语作答。接着馆员将国书和颂词中文正本和英文译本递给我，我又向前走1米左右，再鞠一躬，呈上国书。国王接受国书后交给他的秘书长，随即同我谈话，表示欢迎。我同翻译一同走到国王跟前，同他交谈片刻，国王同我握手，示意告辞。递交国书仪式完毕后，面向国王后退，到门口后转过身来，再面向前走出来。

回到候客厅，泰国外交部长前来祝贺。宾主到门前石阶上合影留念后，礼宾司长用原车队把我送回大使临时官邸。次日，外长差猜陪同我乘飞机返回曼谷。

随后，我就开始了正式的外交活动。

我首先拜会了泰国内阁克立·巴莫总理，由于克立·巴莫总理到中国受到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他对中国已有很好的印象，为此，他对我的接待也特别的热情、亲切。随后是拜会各部长、副部长等，然后我又拜会了其他官员和驻泰国各使领馆的主要外交官员以及华界有名人士。

这一期间，我从早忙到晚，虽感到有些劳累，但心里十分高兴。初到泰国，泰方特别是克立·巴莫总理、差猜外长对我的盛情接待和华界有名人士的亲切之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中泰关系曾经的艰难

我刚到泰国时，因泰国与中国谈判建交并签字的克立总理对中国印象很好，中泰关系不错。但不久，1976年4月泰国大选，克立·巴莫下台，由克立的哥哥、民主党领袖社尼·巴莫就职总理，对我们的态度就有些冷淡。社尼·巴莫上台不久，党派之间发生矛盾，政府不稳。此年10月，以沙鄂·差罗如为首的军人团发动“军事政变”，亲台湾的极右翼新政府上台，到处捕捉进步党派人士，中泰关系开始恶化。同时，还封了八家中文报纸中的七家。在这种形势下，传出谣言说：中国驻泰国大使逃跑了。当地的华人、华侨都担心

我的安危，认为我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经常有人打电话到驻泰使馆问柴大使还在吗？当听到回答说“柴大使一直在大使馆，就没有离开过”，他们说：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并让我在使馆内千万要注意安全，不能大意。

我从这些电话里揣摩出泰国华侨、华裔和友好人士都非常关心两国关系的前景和使馆人员的安危。于是，我就坐着使馆插着中国国旗的小汽车，在曼谷最热闹的大街上来回走动，“招摇过市”，尤其是到华人最集中的地方“耀华里”，让大家都知道中泰关系没有破裂，大使没有走，让大家放心。

当汽车驶入耀华里，我干脆弃车步行，逛商店、问货价，同侨胞、华裔打招呼问好。此一番“现身说法”非常灵，在大街上目睹了中国大使举止、在商店里同中国大使聊过天的人，把中国大使活动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问“大使在不在”的电话随之逐渐消失。我又通过泰国奥委会主席他威上将、警察总监蒙猜上将等，分别邀请中国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羽毛球队访泰，还请中国的文化艺术访问团到泰国表演。这样一来，泰国各大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中泰两国运动员友好比赛的消息，中国访问团成员在曼谷的街上到处走走逛逛，到曼谷各旅游点去参观游览等等。于是，一些担心泰中关系破裂的人顾虑慢慢消失了。

走近王太后

新政府上台后，给中泰关系造成很大困难。新政府一面叫嚷着要同台湾发展关系，一面冷落我们，不同我们接触，虽然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形势有所好转，但仍没有根本变化。因此我们还必须要做工作，尤其是王室工作很重要。于是，千方百计找关系，寻求机会与王室来往。在一个偶然的機會，一个华人讲到，他夫人与王太后诗纳卡琳有亲戚关系，经常有来往，可试探一下，估计问题不大。

王太后十分关心社会福利工作，她经常同国王和王后去各地巡视、探访民

众，济助贫民百姓，并参与王室赞助的一些慈善机构的活动。她在泰国颇受人民敬重。

王太后非常关心泰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当她知道我要拜会她时，特别高兴，拿出很多各式各样王宫的小点心，让我品尝。拜会后，我问她是否想观赏我国一个文化艺术访问团的表演。王太后高兴地说：太好了，就在我王宫内表演。

翌日，王太后在家宴请访问团。席间，王太后有一段精彩生动的讲话：多少世纪前，中国潮州人到南洋做生意，每年秋冬北风季节，他们乘木船（又叫“红头船”），带着瓷器、手工艺品、丝绸等南下泰国，换取药材、香料、象牙、玉石等；每年春夏南风季节，他们又乘船北归。年复一年，就生下了我们这些人，留在泰国了。所以中泰之间有血缘之情，是真正的一家人。

在我团为王室演出时，王太后请了许多大臣、王室成员、华人领袖及在泰的华人大企业家共一百多人观看。演出后还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第二天，泰国各家报纸大加宣传。这样一来，过去王室、政府中一些对中国怀有疑虑的人，也逐步有了转变，中泰关系也有了发展。

我们夫妇与王太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王太后出于友谊，多次送给我们泰式美食和水果。我也曾送给王太后一对景泰蓝花瓶，以示感谢。

我离任时，王太后请我们夫妇到王

柴泽民
大使在王官
拜会泰国王
太后诗纳卡
琳（1977年
3月3日）。



宫共进午餐，为我们饯行。在交往中，王太后文雅的素养和待人的亲切随和，都给我们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江萨家作客

有一次，在日本驻泰使馆武官的招待会上，《曼谷邮报》总编问我愿不愿见见泰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江萨？我说：当然愿意，可是我不认识。总编说，我可以给你介绍。于是就在这位总编的引见下见到了江萨。

江萨一见到我就问：你们为什么要援助泰国共产党的游击队？

我回答：我们都是共产党，当然我们同泰国共产党有很好的关系。但我们绝不干涉你们的内政。这一点，在我们建交谈判时就说得很清楚。泰国共产党的游击队是你们的内政问题，我们绝不会支援他们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他听后很高兴。

接着他又问：你们对越南怎样看？

我答：越南离你们很近，越南的情况你们很清楚，我们是反对任何侵略和扩张的，我们一贯坚持我国总理周恩来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和应用。我们自己更要坚决执行。

他又问：那你对苏联怎样看？

我回答说：苏联是有名的霸权主义国家，它四面扩张，支持越南实行大印度支那政策，难道那只是为了越南吗？

江萨听了我的回答特别满意、高兴。此外我们还讨论了有关中泰和东南亚以及苏联间的一些问题，谈得很投机。约半个多小时的谈话，受到了记者们的特别关注，有的照相、有的记笔记，我们的谈话成了当天招待会大家瞩目的中心。第二天曼谷各家报纸都用主要版面发表了我与江萨谈话的报道和

照片，一时轰动了曼谷。从此，沉默很久的有关中泰关系的报道日渐多起来了。

我同江萨谈话结束时，他又问我：我想邀请您到我家作客，你愿意吗？

我说：只要您邀请，我很高兴到府上拜会您。

没过几天，我就被邀请到江萨的家里作客。同时被请去的还有泰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三人。这时，江萨让我把那天和他的对话再同他们复述一遍，他自己则到厨房去做饭了。当我和三个部长谈完，江萨已做好饭，请大家一起边吃边谈，气氛特别融洽。此后，每隔半月，江萨就请我聚餐一次，或者我到他家拜访一次，有时他老婆孩子一起参加，我们的关系发展得越来越好。

1977年11月江萨出任泰国总理后泰国的形势发生变化，我可以经常出入总理府，和各部部长、三军司令等的关系也加强了。



柴泽民
大使到总理
府拜会泰国
总理江萨
(1978年2
月7日)。

告 别 泰 国

中泰关系进入高潮后，我想趁热打铁，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所以建议国内邀请泰国总理江萨及全家访华。对此，江萨非常高兴，不仅带领全家，而且还有全部的政府内阁部长。1978年3月29日江萨一行到京后，受到我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在姬鹏飞、韩念龙的陪同下，参观了北京的旅游景点，还到了桂林。事后，泰方提出要求购买中国的石油，我方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江萨总理高兴极了。

正当中泰关系越来越热、中国大使在泰国也成了热门话题的时候，国内却通知我接替黄镇到美国去当联络处主任。说实话，我当时还真不想去。其一，因为美国是个霸权主义国家，到那里，工作肯定不好做。其二，我在泰国已把中泰关系搞得由冷变热，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可是，国内已作决定，也只有服从。

在离开泰国前夕，为我送行的人接连不断，一天三顿饭都有人请。送行者都认为泰中关系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睦相处的典范，两国人民的交往已进入水乳难分的境地。大家都祝愿泰中友谊万古长青！

1978年5月10日，我和李友锋到王宫辞行拜会了泰国国王普密蓬。13日，江萨总理为我饯行。两天后我们告别泰国，回到北京。

柴大使说到这里十分动情。难忘的曼谷岁月，是柴泽民外交生涯中重要的一段日子。刚到那里时，中泰关系颇有些冷淡，尤其是亲台湾的右翼政府当权时，两国关系更加微妙。但柴泽民积极想方设法同泰国社会各界交往，注意与高层领导逐渐沟通，终于使中泰关系迅速升温。他为发展中泰友好关系竭尽全力，使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